符号学译丛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用学，即重点转向符号使用者的表意研究，
在符号学的发展中，符用学越来越重要。
但是符用学应当讨论哪些问题始终不太清楚。
这本书说：疆界辽阔，理论种子已经撒下，
许多新的课题，新的可能性，在此绽放，等待收获。

Étude Pragmatique

符用学研究

〔法〕丹尼斯·韦尔南／著　曲辰／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符号学译丛

2014—2015年出版目录：

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
托多罗夫著，方芳译：《奇幻文学导论》
克里斯蒂娃著，张颖译：《诗性语言的革命》
佩特丽莉著，周劲松译：《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库尔、麦格纳斯编，彭佳译：《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研究进路》
艾赫拉特著，文一茗译：《电影艺术与符号学》
埃诺、贝雅埃编，怀宇译：《视觉艺术符号学》
宇波彰著，李璐茜译：《影像化的现代—— 语言与影像的符号学》
韦尔南著，曲辰译：《符用学研究》
莫利涅著，刘吉平译：《符号文体学》
贝尔金著，魏全凤译：《送礼的社会符号学》
谢赫特著，余红兵译：《符号学与艺术理论：在自足论和语境论之间》
文内尔著，魏伟译：《坠落的体育明星、媒介和名流文化》
艾赫拉特著，宋文译：《丑闻的力量：大众传播中的符号学与实用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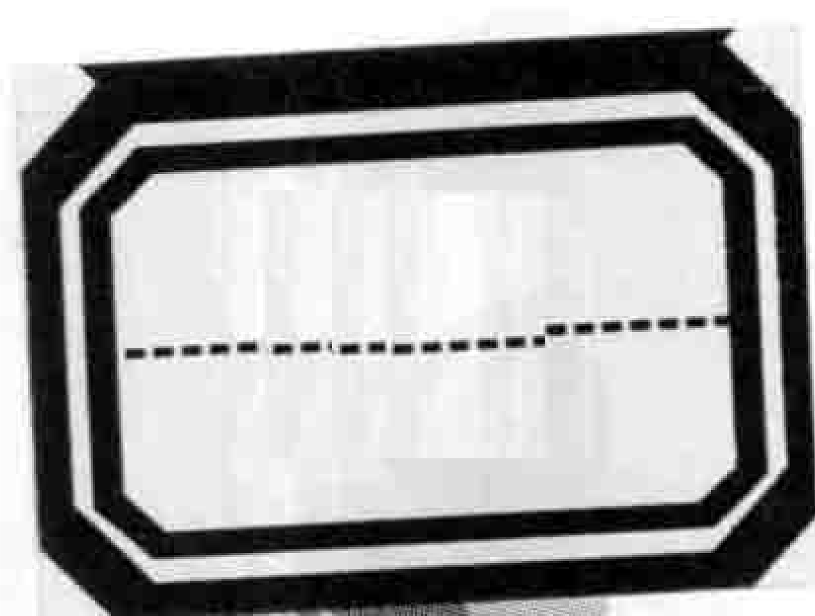
2016—2018年出版目录（略）


ISBN 978-7-5614-7560-7
9 787561 475607 >

定价：32.00元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符号学译丛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用学，即重点转向符号使用者的表意研究，
在符号学的发展中，符用学越来越重要。
但是符用学应当讨论哪些问题始终不太清楚。
这本书说：疆界辽阔，理论种子已经撒下，
许多新的课题，新的可能性，在此绽放，等待收获。

Étude Pragmatique

符用学研究

〔法〕丹尼斯·韦尔南／著 曲辰／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平
责任校对：李金兰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用学研究 /〔法〕韦尔南（Vernant，D.）著；曲辰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3
（符号学译丛 / 赵毅衡，唐小林主编）
ISBN 978-7-5614-7560-7

Ⅰ.①符…　Ⅱ.①韦…　②曲…　Ⅲ.①话语语言学-符号学-研究　Ⅳ.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3116 号

法文原著 Du discours l'action by Denis VERNANT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4-88 号

书名　**符用学研究**
FUYONGXUE YANJIU

著　　者	〔法〕丹尼斯·韦尔南
译　　者	曲　辰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560-7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1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丹尼斯·韦尔南的其他作品

1.《逻辑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收入丛书《哲学和言语活动》(*Philosophie et langage*)，布鲁塞尔，马尔达伽出版社（Mardaga)，1986年。

2.《罗素的数学哲学》(*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B. Russell*)，巴黎，弗林出版社（Vrin)，1992年。

3. 与珀佩拉尔（Marie-Dominique Popelard）合著《科学哲学的主要流派》(*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收入丛书《备忘录》(*Mémo*)，巴黎，瑟依出版社（Seuil)，1997年。

4. 主编《对话》(*Du dialogue*)，《关于哲学和言语活动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第14期，巴黎，弗林出版社（Vrin)，1992年。

5. 与米耶维尔（Denis Miéville）合编《斯坦尼斯瓦夫·莱希涅夫斯基在现今的意义》(*Stanislaw Lesniewski aujourd'hui*)，《关于哲学和言语活动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第16期，巴黎，弗林出版社（Vrin)，1995年。

6. 与纳夫（Frédéric Nef）合著《受质疑的形式主义：30年代的转折》(*Le formalisme en question : le tournant des années trente*)，巴黎，弗林出版社（Vrin)，1997年。

感　谢

我首先要感谢埃诺（Anne Hénault），她爽快地在她主编的这套丛书中接纳了本书；还要感谢马纳一盖洛（Marie-Caterina Manes-Gallo），我和她一起很好地研究了"断定"，也就是本书第四章的来源；也要感谢珀佩拉尔（Marie-Dominique Pepelard）和莫努瓦耶（Jean-Maurice Monnoyer），他们仔细阅读了原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最近的五年中，我和比斯雷特（André Bisseret）、布拉萨克（Christian Brassac）、达斯卡（Mario Dascal）、J. 卡兰和 G. 卡兰（Jean et Geneviève Caelen）、雅克（Francis Jacques）、拉德努瓦（Bertrand Lardennois）、特罗尼翁（Alain Trognon）、范德维克（Daniel Vanderveken）经常进行激烈而友好的讨论，他们的评注、评论和批评使我受益良多。

在此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序　言

直到1938年，莫里斯（Morris）通过分析皮尔斯（Peirce）定义的符号活动（semiosis）的进程[①]，提出了在对言语活动的句法和词义的研究之外，还通过符号来解释的表达方式进行了语用研究。他所开创的研究思路在20世纪逐渐被人们所接受[②]。然而这种接受并非轻而易举。长久以来，特别是在语言学界，语义学借助其统治地位一直试图把语用学降格到从属学科的行列，人们把所有那些不得不面对的现象都胡乱地堆积在了这个学科中（总的来说，这涉及在文本中添加语境）。当今，语用学已经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和合法的地位，但还需在它的定义上达成共识。就我们来看，我们绝没有把语用学看作一个从属的、多少有些次要的延伸学科，相反，我们把语用学设想为一个总框架，在这个总框架中，对于言语活动的传统分析需要被重新阐释。我们通过分析言语互动和交流的最终目的来定义语用学，并再次重温"后期"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深邃直觉。我们在语用学中找到了最利于研究纷繁复杂的话语现象和沟通现象的方式。

我们认为，语用学可以成为当今一个研究言语活动、话语、对话、人际关系和行为的各学科汇合、合作、发展的交叉学科，这些学科有语言哲学、沟通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互动社会学和人工智能。

本书所提出的八个语用学研究内容依据三种方法串联了起来：

1. 从历史到当代。研究一（第一章）针对的是言语活动在现代知识型（épistémè）中的地位，以及话语行为研究方法在知识型中的地位。研究二回顾了逻辑学上形成断定这个关键概念的每个步骤。研究三对塞尔所做的话语行为分类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法。从研究四开始，重新对断定进

---

① 和传统的表语性研究方法不同，皮尔斯将意义理解为一个关系进程，这个进程在符号－再现中加入了解释（另一种定义性符号），这个解释授权了对事物的指称，cf. *Collected Papers*，2. 228.

② Cf.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 如果要了解语用学研究的全景，cf. F. Armengaud，*La pragmatique*.

行语用学定义，原有理论的目标和新的问题架构进一步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兼顾了对它们的历史根源的分析。

2. 从简单到复杂。本书理论的起始点是对话语行为分类的研究（研究三）和对断定定义的研究（研究四），接下来的扩展是将对话体（dialogique）定义为对话双方共建客观现实的开放过程和共同组成对话双方的开放过程（研究五），最后描述了联合活动性对话的行为特点，联合活动是具有社会合作性的（研究八）。

3. 从人类到机器。在研究了人际沟通的不同方面之后，从人际间出发，我们的研究六和研究七以应用的名义研究了对信息资料库提问所构成的寻求信息的基本对话，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图灵所提出的机器智能测试，测试机器的对话体能力。

我们的八个研究内容之间相对独立，读者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路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例如，读者可以把研究二和研究四结合在一起，它们分别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研究了断定；可以把研究六和研究七结合在一起，它们研究了"人机对话"的问题；或者还可以把研究一和研究八结合在一起，它们互相呼应，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从话语符号学到符用学的过程，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言语互动和超言语交流的关系。

我们从没有声称解决了这个领域中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因其复杂性而著称，我们只是希望能证明针对言语现象和沟通现象使用坚定的语用研究方法——也就是说行为研究方法——是必要的、有生命力的。

章节的来源

第一章，《从话语到行为》(*Du discours à l'action*)，发表于《哲学教育》(*L'enseignement philosophique*)，1—2 月，1994 年，第 28～38 页。

第二章，《逻辑和语用学：断定概念的形成》(*Logique et pragmatique : la genèse du concept d'assertion*)，收录在米耶维尔（D. Miéville）和韦尔南（D. Vernant）主编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希涅夫斯基在现今的意义》(*Stanislaw Lesniewski aujourd'hui*）中，《关于哲学和言语活动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第 16 期，巴黎，弗林出版社（Vrin)，1995 年。

第三章对《话语行为的分类和沟通互动》(*Classification of Speech Acts an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s*）的法文译本作了修改（未发表），原文收录在范德维克（D. Vanderveken）和库柏（S. Kubo）主编的《话语行为理论论文集》(*Essays in Speech Acts Theory*）中，阿姆斯特丹，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即将出版。

第四章是和马纳一盖洛（Marie-Caterina Manes-Gallo）合作撰写的《对断定的重新语用评估》(*Pour une réévaluation pragmatique de l'assertion*)，收录在《互动和认知》（*Interaction & Cognitions*）中，南希大学出版社，1997 年。

第五章，《辩证法、对话式样和对话体式样》(*Dialectique, forme dialogale et dialogique*)，收录在《对话体，关于对话的哲学形式、文学形式、语言学形式和认知形式》(*Le dialogique, sur les forme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linguistiques et cognitives du dialogue*）中，丛书《沟通科学》(*Sciences pour la communication*)，伯尔尼和朗（Peter Lang）主编，1997 年。

第六章，《行为研究方法和信息性对话的投射模式》(*Approche actionnelle et* modèle *projectif du dialogue informatif*)，收录在韦尔南（D. Vernant）主编的《对话》(*Du dialogue*）中，《关于哲学和言语活动的研究》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第 14 期，巴黎，弗林出版社 (Vrin)，1992 年。

第七章，《机器智能和其对话体能力》(*L'intelligence de la machine et sa capacité dialogique*)，收录在费赛特 (D. Fisette) 和海勒 (V. Rialle) 主编的《头脑思考：从认知科学到认知哲学》(*Penser l'esprit : des sciences de la cognition à une philosophie cognitive*) 中，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96 年。

第八章，未发表。

目　　录

第一章 从话语到行为

"符号是开端"
——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公理化思想》（*Axiomatisches Denken*）

对逻各斯（logos）的思考构成了古希腊的思想，这是我们传统哲学的出发点。自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Cratyle*）之后，赋予言语活动的性质和功能就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假说是，在20世纪末，构成我们思想模式的言语活动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描述这种震荡，那么我们会说，借助于针对言语实践的行为研究方法，终结了对话语的再现感知。在这一演变路线上有三个清晰的决裂点：

1. 将再现性话语看作是对言语活动的忽略；
2. 开始将言语活动作为知（savoir）的工具和客体；
3. 将话语实践看作是独特的活动。

除了赋予言语活动的地位之外，调节整个知识型领域并控制哲学实践的预设也介入了其中。

一、将再现性话语看作是对言语活动的忽略

福柯（Michel Faucault）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①] 一书中所作的精彩分析将古典时期的特点描述为再现知识型（épistémè de représentation）[②]。然而，由笛卡尔（Descartes）开创的哲学研究模式在20世纪初并没有一下子消亡，它表现为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发展，它们作为主体的哲学，将使得笛卡尔式的沉思永远继续下去。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当今确实也有很多其他的思想，它们在很多方面已经远

---

① Cf. chap. Ⅲ, p. 60－91.

② 译者注：représentation亦可译为"表征"。本书中均译为"再现"这个更为形象的提法。

离了笛卡尔主义，但仍然保留了从古典知识型那里继承来的一些预设内容。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再现主义的论题归纳为 4 个预设：

（1）首先是思想优先的预设。根据笛卡尔二元论的观点，世界是由两种类型的实体构成的：以广延为属性的独立物质实体和以思维为属性的独立精神实体，也就是身体和灵魂。他还强调精神实体可以思考其自身并借助于它的理念（idée）来思考世界。理念，即所有认识的手段，通过其自身并不能将任何内容归结于身体，也不能归结于言语活动，言语活动只是一种精妙的身体表现。

（2）第二个是关于认识的主体基础的预设。作为理念的真实性，认识可以在原始经验中找到它的来源，思想将实践变成原始经验：对存在的即时、确实的我思（cogito）反射到自身。作为精神视觉的纯粹直觉（intuitumentis），无论是即时的，即对明白的、清晰的简单理念的感知，还是间接的，即对理念有次序的、推论式的串联，它都具有所有的真实性。因此，一切“再现”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表现”（présentation）基础之上的：直接找到认识的来源。

（3）第三个是关于理念的再现功能的预设。当理念的真实性是由真实的上帝而不是欺骗者来保证时，理念就能够再现世界上的事物。和被定义为第一本体论的传统形而上学不同，古典哲学主要是作为认识理论展开的，它负责构建一切真实性。

（4）从那时起，在这样一个知识型的组织结构中，言语活动就沦为了第二位的角色、次要的角色。说它是第二位的角色是因为它被证明只是理念再现的一种简单模式，它仅仅只是直接地再现客观现实。它是理念的表达，表象的再现。说言语活动是次要的角色是因为言语活动通过“本质的制度”从属于身体，它是思想不可或缺的身体媒介。正如科德穆瓦（Géraud Cordemoy）开玩笑似地说，只有天使才掌握着一种不需要借助于任何话语媒介来传达他们思想的特权①。话语是极其显而易见而又缺乏自有认知能力的，它只是理念的简单载体。话语的地位被贬低了，成为身体的俘虏。言语活动的交际功能因此完全附属于了再现的功能。

① Cf. *Discours physique de la parole*, p. 60－61, 75－77 ：“两个精神体为了相互沟通思想，只要想沟通就可以了。”

这种对言语活动的忽略是笛卡尔主义的一种巨大错误①。至此我们明白了，"我思"强调了采用言语活动用法中语用规则的必要性。"我思"在自己思想中的存在只是说话人在其自己说（dire）中存在的映射。"我思故我在"可以翻版为"我说话，所以我是说话的那个人"。同样，笛卡尔哲学唯我论的悖谬源于对他人的否认，即对话者，他实际上是另一个我（alter ego）。"我说"总是"我对你说"，甚至更精确些就是"我对你说，我说给你听，我通过你说"。事实上，在笛卡尔的理论中，也没有把纯粹的思想变成孤立的、难以表达的经验，实际上他在和自己、和上帝、和恶灵、和读者，在和所有这些话语向异性的必然形象对话②。

然而这还不是唯一明显的错误。要消除所有的错误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再现主义前提，彻底改变言语活动的地位。这个消除计划只是到了最近才得以实现。但是，和过去理论的头一次决裂就动摇了古典知识型。总的来说，这次决裂出现在 20 世纪初。在这里我们只指出作为主要标志的两个变革，将言语活动作为知（savoir）的客体和工具，对于它的新感知来源于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双重变革。

二、开始将言语活动作为知的工具和客体

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对言语活动的忽略同时又是对经院哲学的否定，经院哲学被看作是贫乏无用的，笛卡尔哲学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方法，譬如发现的艺术（ars inveniendi）和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在当时，事实上是将话语实践数学化了，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最终导致了对亚里士多德学说遗产的全部接受③。相反，在 20 世纪初，先是弗雷格（Frege）后是罗素（Russell），都建成了一种实际上考虑了话语推理运用的逻辑学④。概念文字（Begriff）或者是命题函数 $F(x)$、$R(x, y)$ 提供了分析所有命题的方案，不管这个命题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总体来说，新的逻辑学被形式化公理化

---

① 同样的忽略也存在于康德（Kant）的理论，cf. Georg Hamann，*Metakritik über den Purismus der Vernunft*，为了反对康德，他提出了言语活动在逻辑学的范畴内，特别是在美学范畴中构成了理性的研究法（organon）。我们发现，在 20 世纪，皮尔斯这位"美国哲学的康德"，从被看作符号学的一般逻辑的角度出发再次对康德的理论提出了批判，cf. K. O. Apel，*De Kant à Peirce : la transformation sémiotique de la logique transcendantale*.

② Cf. Denis Vernant，*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Chap. 6：《Le cogito：vérité pragmatique》，p. 176-188.

③ Cf. Kant，*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p. 15.

④ 分别为 *Begriffsschrift*，1879 和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1903.

了，它不再是对数字或者是几何图形进行演算（calcul），而是对再现了概念的符号进行演算。虽然这种在逻辑上希望将所有数学形式简化成《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① 所提出的新逻辑学的企图最终失败了，但是它产生了逻辑学新工具的生命力：它有能力使最抽象的推理形式化②。这样一种革新的哲学成果是很巨大的，最重要的也许是最终实现了莱布尼兹（Leibniz）对智力活动进行演算控制和符号控制的梦想。通过它们固有的组合，符号表现为一种现实的认知能力。盲区（aveugle）、缺失自身的思想将继续存在于符号的演算游戏中并通过符号的演算游戏而存在③。直觉作为理念的反射控制，在逻辑符号的算法使用和规则使用面前就不复存在了。简而言之，作为逻辑言语活动的人工语言，是有效而有生命力的认识工具。

同时，在符号的自然形式之下，它们自身表现为科学的客体。索绪尔的语言学就将语言看作新颖的客体。符号绝不是思想显而易见的表达，它的价值在于系统内部语言构成的相对关系。语言结构成了涵义的来源和一切概念划分的条件。接下来，乔姆斯基（Chomsky）运用逻辑学的形式主义和循环能力，阐明了转换程序，这种转换决定了句子无限生成的可能。

作为知的工具和客体，言语活动因此获得了新的实证性（positivité）。在对笛卡尔主义的第四个预设质疑的同时我们又加上了对第一个的否定：否定纯粹思想的优先性和自主性。理念只是符号的概念层次，思想在言语活动中并通过言语活动而建立。同样唯一的结构划分将词和概念、能指和所指链接了起来④。符号的科学，在欧洲大陆以索绪尔的符号学面貌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以皮尔斯的符号学面貌出现，它即使不充当最重要的科学，至少也充当了所

---

① 译者注：罗素曾发表过两本名为《数学原理》的书，一本为1903年发表的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PoM*），另一本为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于1910—1913年的 *Principia Mathematica*（共3卷）。

② Cf.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③ “但是通常，特别是在稍长一点的分析中，我们不会一下子录入思想的客体，相反必然，我们会使用符号，并且通过省略习惯性地跳过：在我们存在的意识中明确其明示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或相信，我们有能力拥有它……这种思想，我习惯性地叫它盲区或者符号体系。我们在代数和算术上都会使用它，同样几乎在所有事情上也都可以用它。”（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IV, p. 423.）

④ Cf.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tie Ⅱ, chap. IV, p. 155：“没有预先建立的理念，在语言出现之前，没有什么是清晰的。” C. S. Peirce, *Ecrits sur le signe*, p. 121：“简单地认为好的言语活动对于思考是必需的，这是错误的。因为言语活动就是思想的本质。”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参考资料：例如布尔（Boole），他认为新生的形式逻辑表达了思想的法则，cf.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例如福多（J. A. Fodor），他承认了思想的普遍言语活动，cf.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有科学的方法论。

这种关于思想和言语活动之间关系的新观点产生了哲学实践的深刻转变。不论采用哪种方式，哲学实践都被设计为对言语活动、对符号体系的研究［例如可以参看卡西尔（Cassirer）对于新康德主义传统的论述］。更明确地说，所谓“语言学拐点”① 就是指用新的语言逻辑方法来分析、解决、化解哲学的传统问题。要想展现一个范式（paradigmatique）例子，我们需要回忆一下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中所提的观点。哲学不再是教义上的练习，而是治疗型的（thérapeutique）实践。哲学具有了新逻辑学强大的分析方法，它用于诊断言语活动的错误使用，并明确说的模态，因而也可以描述可说的界限：“4.112—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哲学的成果不是要产生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对命题的澄清。可以说，没有哲学，命题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命题清晰，并且为命题划定明确的界限。”“4.115—哲学将通过清楚地表达可说的东西来指谓（signifier）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传统形而上学以无谓地追求那些只能自我表现或自我体验的东西而著称，此时它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可信度。用卡尔纳普（Carnap）的话来说，形而上学成了“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②。

在知的范畴内，赋予了言语活动一种新的实证性，它可以延伸到所有使用符号的行为表现（comportement）中，不论是个人的还是人类社会的，它都开创了一种新的知识型轮廓：“人类科学”知识型③。在符号实践的多样性和模糊性中被感知的人替代了能够意识到思想、作为客观现实再现源泉的主体。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法揭示了大部分的人类举止（conduite），譬如梦或者神经官能症，都是具有征兆价值的，它们可以从潜意识的基本原理中找到解释④。精神分析疗法以使心理冲突的根源在言语活动中（谈话疗法）体现出来为目的。通过言语，主体可以重新控制自己：“它在哪里，我便将在哪里。”（Wo es War，soll Ich werden.）从“潜意识就像言语活动一样结构严密”这个假设出发，拉康（Jacques Lacan）开拓了语言学的知识，以便阐明人类使用符

① Richard Rorty (éd),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② *Le dépassement de la métaphysique par l'analyse logique du langage*.

③ Cf. 福柯从更广泛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科学的出现不仅依赖于语言学，而且依赖于生物学和经济学，*op. cit.*, chap. X, p. 355—398.

④ Cf. *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

号和心理冲动的机能[1]。同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目标则是，用人种学来分离出支配着亲属关系、社会实践和神话观的结构法则[2]。更宽泛地说，所有日常的、文化的实践都作为使用符号的结构成了研究的客体。例如，巴特（Roland Barthes）就描述了支配我们消费神话的编码[3]。

几十年后，在和信息技术的飞跃[4]挂钩以后，肯定思想的话语特点又颠覆了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之间的新对立，勾画出了全新的跨领域研究空间——认知科学。从那时候起，思想的推理活动就表现出对符号演算的依赖，这种演算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而实现，机器"智能"成了新问题。通过质疑笛卡尔的二元论，机器被赋予了"灵魂"，也就是说，机器具有了认知能力。科技镜像，即信息"模拟"（stimulation），涉及对人类认知能力的研究，并开创了逐步将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生理学、生物学融入逻辑学和语言学、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新领域。

我们相信"人类科学"的出现以及其后"认知科学"的来临，都是和哲学实践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最终完成了和古典知识型的决裂。然而，尽管如此，笛卡尔主义的第二和第三个预设还是留存了下来。

事实上，由第三个预设带来的再现研究方法还是坚持了下来。当然，它不再强调理念通过自身提供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从此以后，符号以命题链接的方式拥有了描述客观现实的权力。因此，罗素在《哲学问题》中说，对真实性的判断是由直接、立即获得客体和事实（另外，逻辑的一般事实，也就是显而易见的逻辑原则，也参与其中）的可能性——熟识（acquaintance）——来保证的："当我相信查理一世死在断头台上时，之所以我相信是真的，并不是因为其固有品质（我通过对相信内容的简单测试而发现的固有品质），而是因为这是 250 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5]进一步说，话语的再现不仅假设了理念的表现，还有客观现实的表现。同样，维特根斯坦的描述理论认为：成熟的逻辑命题构成了事实的准确形象。自此，符号运用的基本最终目的就是描述对于构成客观现实的事实的认识："2.1－我们自己将事实变成像（Bilder）。""2.1514－再现关系存在于像的要素和事物之间的相符。"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将

---

① Cf. *Écrits*.

② Cf.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③ Cf. *Système de la mode*.

④ 关于人工智能的起源，我们可以参考霍吉（Andrew Hodges）所写的很有启发性的传记：*Alain Turing ou l'énigme de l'intelligence*。

⑤ Cf. chap. XⅡ, p. 145.

再现关系（abbildende Beziehung）设想为命题和事实之间的同构关系，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真实性相符定义的传统①。同样，在认知科学领域，最初的计算机计算模型可以说是“认知主义的”，坚持了再现观点，条件是“智能”不仅要求句法演算，而且特别要求一个从符号体系指称到客观现实的涵义指定过程②。

笛卡尔主义的第二个预设也还继续存在。虽然自尼采（Nietzsche）和弗洛伊德以来，主体明确地失去了它们在涵义和认识来源上的地位③，尽管如此，由笛卡尔创立、康德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架构（problématique fondationnelle）还是延续了下来。通过广延的论题（thèse），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摒弃了所有关于主体的陈述，不论它是心理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④。思想不再定义为对会思考主体的指称，而是直接被定义为“具备涵义的命题”⑤。然而，维特根斯坦仍然将先验功能，即确定再现的先验条件、所有话语性和涵义的先验条件，赋予了普遍的、绝对的逻辑学意义。接下来，用黑格尔（Ricoeur）的话来说，人类科学在结构主义的版本下，发展为“无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⑥。因此，所有计算机计算的可能性条件、逻辑句法规则（譬如维特根斯坦）或者是结构游戏规则（譬如列维—斯特劳斯）都保证了形式的先验地位，保证了真实性和完整意义的基础。

自此，与再现知识型的彻底决裂还差最后一步，这一步就是对言语活动的语用感知。

三、将话语实践看作是独特的活动

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在弗雷格⑦所写的最新几本《逻辑研究》

---

① 即使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客体和事实也都还是形式，cf. *Tractatus*，2.0231：“世界的实体只能规定一种形式，而不能规定任何物质的属性。”

② 为了在哲学上批判维特根斯坦最初所采纳的这一立场，cf. Hilary Putnam，*Représentation et réalité*.

③ Cf. Nietzsche，*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17：“思想产生于‘思想’想要产生时，而不是‘我’想要思想产生时，这导致了对主体‘我’决定了动词‘思考’这个说法的篡改。”

④ Cf. “5－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实性函项。（基本命题是自身的真实性函项。）”，“5.542－但是很清楚，‘A 相信 p’‘A 思考 p’‘A 说 p’都是‘p 说 p’的形式：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事实和一个对象的相关，而是借助于其对象相关的诸事实的相关。”也可以参看 5.631－2 和 5.641。

⑤ Cf. *Tractatus*，4.

⑥ Cf. 列维－斯特劳斯给黑格尔的答复，in *Esprit*，novembre 1963，p. 634.

⑦ 我们也可以追溯到皮尔斯，他根据行为——担保着说话人关于真实性的责任——对断定进行语用分析，他的分析预兆了话语行为理论的发展，cf. Jarrett E. Brock，*An Introduction to Peirce's Theory of Speech Acts*.

(*Recherche logique*) 中发现研究言语活动的新方法，他引入了断定力（force assertive）这个专业语用概念，用以解释判断（jugement）的特征性[1]。他认为，传统的逻辑学命题仅仅考虑了判断的认知内容。但是完整的判断作为对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断定行为（acte d'assertion），这个行为在命题真实性方面加入了说话人的担保（engagement）。我们可以区分下面两者：对“苏格拉底（Socrate）已死”这个思想的简单录入（saisie），和通过断定表达的真实判断“苏格拉底已死”。从此以后，重要的不仅仅是陈述，还有陈述过程；不仅仅是单独的内容，还有承载内容的话语行为（cf. *infra*，chap. II，§ 1）。

弗雷格作品的英文翻译者、牛津学派哲学家奥斯汀（John L. Austin）发展了这种革新性观点。他通过揭露描述性幻觉（descriptive fallacy）——当时仍然支配着对言语活动的感知——给予了再现预设以致命一击[2]。现代逻辑学的研究方法替代了古典时期的再现预设，但仍然把描述客观现实这个基本认知功能赋予了言语活动。问题仍旧在于话语的真实性被设想为从说到事实的相符。而奥斯汀除了坚持言语活动的纯陈述句（constatif）用法外，例如“天空是蓝色的”，更坚持施为句（performatif）的用法，它在于通过话语来产生行为。这几个陈述过程如“我给这艘船命名为‘弗朗思’”“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我宣布开幕”“我宣战”等，都通过言语活动实现了行为：“说即是做。”[3]

奥斯汀认为根本没有居于第二位的，甚至说没有处于附属地位的言语活动的用法，他颠覆了这种关系，他认为所有言语活动的运用都具有真正的话语行为（speech act）的价值。纯再现、纯描述性用法不再作为准则，它只是话语行为中的一种形式，和其他形式一样服从于成功条件（conditions de succès）。肯定的真实性也只是话语行为成功的可能形式之一（cf. *infra*，chap. IV，§ 1）。所有的说都是做。奥斯汀建议根据三个范畴来分析每一个话语行为：

——言内行为（acte de dire）强调了由指称行为和述谓行为（prédiction）构成的意义内容。

——言外行为［il（in）-locutio：说话人在说话时所完成的行为］特别指出了相关行为的力：F（*p*）。

——言后行为［per-locution：由说这个事实引起的听话人的行为］明确

---

① Cf. *La négation*.

② Cf. *Quand dire*, *c'est faire*, p. 39.

③ Cf. *op. cit.*, p. 13.

了预期的目标或未预料到的结果，行为作用于听话人身上所产生的效果。

举例来说，如果说“天空是蓝色的”，在言内层次中就意味着人们把蓝色这个颜色赋予了一部分限定空间：天空。这个陈述过程还具有断定的言外之力，它表达了说话人是相信这种客观现实状态的。最后，它的言后目标是将说话人认为真实的内容告知听话人。

同样，在警察出现的场景中，凶狠的陈述过程——“当心，我要开枪了”就有了：

——作为言内意义，它提供了一个信息：“我和他说，我要开枪打他了”。

——作为言外之力，这是一个明确的威胁：“当我说我要开枪打他时，我是在威胁他”。

——作为言后目的，是让听话人害怕：“通过说我要开枪打他这个陈述，我使他害怕了”[①]。

塞尔（John Searle）深化了这一理论过程。他根据话语行为的“适从方向”（direction d'ajustement），也就是它们担保话语与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方式，将话语行为分为 5 种类型[②]：

——断言类（assertif），由于它可以表达说话人对事物状态描述的真实性的相信，因此它就有了从话语到客观现实的适从方向。例如，由肯定、总结、夸耀等动词引入的话语行为都是这种类型。

——指令类（directif），由于它可以表达让听话人做某事的愿望、让客观现实符合话语的愿望，由此它就有了从客观现实到话语的适从方向。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指令都是这种类型：要求、询问、建议、请求、邀请、命令、指令等等。

——承诺类（promissif），它的适从方向和指令类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所表达的意图是说话人自身即将做出的行为。各种承诺和担保都是这种类型。

——宣告类（déclaration），因为陈述过程能够自己生成它所描述的行为，所以它有着从客观现实到话语和从话语到客观现实的双重适从方向。在一个确定的制度范围内享有权力的人所做的一切宣告都是这种类型。

——表达类（expressif），由于它的唯一目的是表达说话人对于事物状态的心理态度，因此它没有适从方向，例如感谢、祝贺、抱歉、惋惜、祝愿等。

我们在这里先不讨论这个分类和建立它的标准（cf. *infra*，chap. Ⅲ）。

---

① Cf. *Quand dire*，*c'est faire*，p. 130.

② Cf. *Taxinomie des actes illocutoires*，in *Sens et expression*，chap. 1.

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如果说断言类和表达类还完全符合传统上的话语再现功能和表达功能，那么指令类和承诺类则不再表示为言语活动的认知范畴和告知信息的范畴，它们表示为一种固有的意志力范畴，即指令类和承诺类担保了说话人的意愿、意图、愿望。这种意愿、意图、愿望不是描述，而是通过说话人的行为或通过他人的行为来改造客观现实。话语不仅仅是再现，更是意志。至于宣告类，由于话语行为事实上直接产生了对于客观现实的行为，它就最为清楚地表示为言语活动的行为层次。通过这种"言语魔力"①，说就成了做。譬如，我们可以想一下，在19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Gorbatchev）宣布"鉴于目前的情形，我中止我苏联总统的职权"时所产生的话语行为。②

针对言语活动的行为研究方法最终否定了话语只有再现和表达用法的特性，也就是否定了笛卡尔主义第三个预设的现代变体。除此以外，类似的再现理念，譬如古典时期被主题化的再现观点，也都轰然倒塌了。弗雷格的《逻辑研究》第一辑用绝妙的一页进一步批判了相符主义论题，这并非偶然。相符是以"相同性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但如果我们试图把这种关系放到再现和客观现实之间，我们就会发现这不可行："除非事物本身也是再现，用再现来复原事物才有可能。然而，这正是我们将真实性定义为再现与真实事物一致时所不想发生的事情。真实的客体和再现是不一样的。基于这点考虑，没有完全的一致，也没有完全的真实性。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是绝对真实的，这是因为半真并不是真实。"③

弗雷格竟然能在《逻辑哲学论》盛行的时代写下这么几行字！20年后，维特根斯坦摒弃了自己命题集中的理论，并将每一种话语活动的类型描述为一种属于独特"生活形式"（forme de vie）的言语游戏（un jeu de langage）④，从而与过去的知识型作了决裂。全貌再现（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代替了被设想为相符（Abbildung）的再现。为了识别言语游戏复杂的网络和网状系统，全貌再现不仅引入了相近性，而且引入了差异性⑤，言语游戏本身从属

---

① Cf. J. Searle, *L'intentionalité*, p. 212.

② 根据话语行为（指令和宣告）再次阐释权力理论，cf. P. Amselek, *Le locutoire et l'illocutoire dans les énonciations relatives aux normes juridiques*.

③ Cf. *La pensée*, p. 172－173.

④ Cf.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23, p. 125："'言语游戏'（Sprachspiel）这个词在这里应该是为了突显出言语活动的说是活动（activité）或生活形式（forme de vie）的组成部分。""言语游戏"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 *le Cahier bleu*, 1933—1934年的课堂笔记, p. 67.

⑤ "更确切地说，言语游戏表现为对比客体（objets de comparaisons），对比客体是用来根据相似性和差异性阐明言语活动条件的。" Cf.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130, p. 169.

于生活形式，即在社会性上确定了的行为表现模式。因此，整体化和社会化的感知就代替了意义的原子概念和抽象概念。

接下来，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美学领域中采取了强有力的举动，他和贡布里希（Gombrich）一起揭露了纯真眼睛（oeil innocent）和艺术现实主义的理念谬误。艺术作品构成了受惯例规范的符号生成，它们拥有认知功能，能产生各种客观现实的版本，并可以根据它们自身的标准，而并非通过最终指称，即指称到所谓限定的实在客观现实，来对它们进行评估："客观现实不再是千真万确的，伴随它的是绝对主义可笑的同质……如果客观现实并不存在，那么我们又生活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在某个客观现实中'，或者进而说'在很多客观现实中'。"[①] "实在的"客观现实既不是被表现的，也不是被再现的，而是被构成的。

这一次的颠覆是非常彻底的，它直指笛卡尔主义第二个预设的变化形式：对基础架构支撑的颠覆导致了对涵义的先验条件的研究。事实上，自从言语活动的运用展开为多样的活动类型后，就轮到这最后一种变化形式轰然倒塌了。譬如说[②]，"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就认为，标准逻辑完全丧失了支配所有话语实践的可能。它自身从此表现为一个特别的活动类型。另外，哲学也是如此，哲学构成了由自身习惯、自身编码所支配的活动。每一种言语活动类型都从属于独一无二的规则，任何一种行为类型都不能企求任何的霸权。哲学本身也就丧失了所有的基本目的："不论是何种方式，哲学都不应该损害言语活动的实在运用，哲学只能描述它。因为，哲学不能够创建言语活动的实在运用，它只是让所有的事物在那个状态上。"[③]即使假如我们能够在行为领域的区域特色之外识别出属于普遍行为逻辑的特点，我们也只有忽略话语实践不可逆的历史性，才能把这些特点升格为先验条件[④]。如果说哲学作为评论和反思的活动类型是长久的，那么它的概念生成则是会过期的。先验作为土壤——不可更动的基础，对它的寻求构成了再现主义的最终幻觉——它在于相信真实性通过自身而存在，为了抓住绝对和永恒的确实性只需要发现真实性并观察它，这就是思辨。真实性应该成为无可挽回的、暂时的、附带条件的成果，它既是互动实践又是交流实践的效果。与其追求在不断变化的先验之上建立话语实践，不如为

---

① Cf. Nelson Goodman, Catherine Elgin, *Esthétique et connaissance*, p. 51.

② 有关皮尔斯对于基础、即时认识以及第一直觉的研究的评论，cf. Cl. Tiercelin, *La pensée-signe*, chap. Ⅱ.

③ Cf.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124, p. 167.

④ 第七章会提供一个新的言语游戏的范例。

不同的话语实践建立谱系，方法是：考虑到普通涵义的客观现实，把话语实践和它们的谱系来源联系在一起；考虑到科学和艺术的生成，把话语实践和它们的文化历史联系在一起。

终于完成了与过去的决裂，但充分评估其所有后果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似乎已经能够看到其中的一个结果了：通过反作用，修正了同等看待思想和言语活动这个基本预设的涵义。在20世纪初，言语活动被定义为关于符号的演算游戏或组合游戏，因此思想被局限于再现范畴和计算范畴中。将话语看作一种活动，一个特别的、他律的行为样式，会将思想领域和认知领域扩展到其他不再从属于概念符号体系使用的活动样式中。皮亚杰（Piaget）[①] 强调过，人类智能首先来源于行为根源的感觉运动性（sensori-moteurs）剪辑[②]。更宽泛地说，认知适用于"认识"和"学习"亚符号本质（nature subsymbolique）的进程，这些进程出现在人类社会、动物世界甚至是含在媒介交流的一切组织形式中。根据制订交流进程和制订亚符号的行为方案来阐释认知，这取代了将反身思想看作言语活动和符号游戏的观点。虽然说将思想和言语活动联合起来的预设，其积极意义很大，但其负面的知识型功能仍然存在：不接受纯粹的、自主的、不受所有符号体系和（或）运算体系约束的思想。

这种修正表现出了值得注意的技术上的后果：出现了新的信息模式，这种信息模式不再根据计算，而是根据构成网络的非符号要素的动态互动中显露出的效果联结（connexionniste d'effet）来感知认知[③]。这种革新很重要，但还

---

① 译者注：皮亚杰将儿童思维的发展划分为四个大的年龄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一、感知运动阶段（从出生到两岁左右）。这一阶段是思维的萌芽期，是以后发展的基础。二、前运算阶段（两岁左右到六七岁）。这一阶段又称前逻辑阶段，这时儿童开始以符号作为中介来描述外部世界，表现在儿童的延缓模仿、想象或游戏之中。三、具体运算阶段（从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在这个阶段，儿童已有了一般的逻辑结构。四、形式运算阶段（十一二岁到十四五岁）。此时儿童的智慧发展趋于成熟，思维能力已超出事物的具体内容或感知的事物，思维具有更大灵活性。

② Cf. *Biologie et connaissance*.

③ 关于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对立，cf. Paul Smolensky, *IA connectioniste*, *IA symbolique et cerveau*. 同样，在开始计算研究时，我们也曾经坚持认为，神经元的活动符合标准逻辑的推断规则，cf. McCulloch, Pitts, *A Logical Calculu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 现在，我们认为，神经元被组织成了联结网络！

不能够标志新范式的出现[1]。首先是因为承认作为新事物的次符号(infrasymbolique)认知现象不能够使符号现象失效，符号现象直到现在仍然是计算研究方法的特性。其次，是因为新的联结主义研究方法[2]构成了在更深层上与过去决裂的知识型效果：抛弃了再现预设和基本预设，重新阐释了言语活动和思想的关系。这种根本的决裂开启了用联结主义方法研究新的认知现象的可能性，先前有关概念思想的运用、作为符号游戏的言语活动的运用的分析成果再次得到了使用。

如果我们坚持对言语沟通的过程进行研究，似乎我们就必须继续先前由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普通语言哲学家们所开创的研究了，语用学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研究言语活动的有效运用，而是把语用学定义为言语和非言语范畴中的真正的行为理论。适合于将话语实践和行为实践形式化的不同科学和学科都促成了这一点：逻辑学、语言学、普通符号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信息科学等等。本质上他律的言语活动被定义成了在一系列非言语交流中的互动一刻。

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我们能够重新思考笛卡尔主义关于主体的问题。这里需要指出所有的主体性决非是既定的，而是来源于由语言和对话体约束所确定的主体间进程；同时还应构建作为互动进程施动者的对话双方，其沟通层面只是其中一个范畴（cf. *Infra*，chap. Ⅷ）。这需要考虑到人类行为的习惯条件、制度约束和社会限定：言语游戏应该指称到赋予它们涵义的生活形式。因此，要开展语用学的调查研究就需要借助于一般人类学（anthropologie），对逻各斯的询问就需要对文化（polis）——所有互动的社会条件——进行思考[3]。

---

① 撇开现在对范式（paradigme）这个词的大量使用不谈，这个词在库恩（Thom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La structure des révolutions scientifiques*) 中得到了（相对）准确的定义。一个范式涵盖了心照不宣的所有认识，即它们不能够根据封闭定义的肯定来明确解释（在这里，库恩明确参考了维特根斯坦关于家族相似性的概念）。范式不能够通过理论教学，而是通过“学习（教材练习和行为）”获得的，cf. chap. IV. p. 63-65. 因此，我们不能够混淆两个层次：对分析模式、分析策略的明确选择，对客观现实的预设和概念化的采纳，后者是基本层次，从范式上定义了整个研究的框架。

② 译者注：这是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中的一个课题，用大脑功能的计算机模型帮助我们理解大脑是如何操作的。这一理论将大脑看作一个神经单元的网络。这些单元相互作用直至达到一个对外部输入做出反应的稳定状态。这一信息加工是并行的和分布的，也就是说许多信息被同时加工，并且每一联结又对许多内容起作用。联结主义因此又被称为“并行分布加工”或“神经网络模型”。联结主义的哲学涵义在于认为，人类智力可以被理解为产生于大脑神经系统的整体结构。这样一个哲学方法有时被称为“神经哲学”。

③ Cf. H. Parret (dir.), *La communauté en paroles*, *communications*, *consensus*, *ruptures*，概述了对“所有可能的互动含义的基本”集合的分析。我们将在第八章中阐述集体意向性、联合活动、交流制度化和互动约定化的作用。

第二章 断定概念的形成

乌龟用沉思的口吻重复了这个句子：如果 A、B 和 C 都是真的，那 Z 必然为真。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新的假设句，那么这个假设句是不是真的呢？虽然我没能够看到这个假设句的真实性，但是我仍然可以选择承认 A、B 和 C 的真实性，但不承认 Z 的。

——卡罗尔（Lewis Carroll）

莱希涅夫斯基（Stanislaw Lesniewski）以及武卡谢维奇（Jan Lukasiewicz）是华沙逻辑学派的奠基人。莱希涅夫斯基的主要著作《数学基础》（*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mathématique*）最近由卡林诺斯基（M. Georges Kalinowski）翻译成了法语[①]。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莱希涅夫斯基表达了他在给罗素和怀特海所写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中的符号言语活动赋予涵义时所遇到的初始困难。他特别强调“运用”的本质二重性（ambiguïté），这是由断定符号产生的。我们觉得他的批判非常恰当，对概念的解释质疑了逻辑论证性的地位，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自然言语活动的话语行为进行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很明显，断定的概念将语用的问题架构引入了现代逻辑学的内部核心之中。

为了充分说明莱希涅夫斯基所提出的二重性的意义，我们通过下面几点简单地回顾一下断定概念在逻辑学中的产生过程：

1. 弗雷格最初的主题化。
2. 罗素所做的开拓。
3. 莱希涅夫斯基所做的批判，以及他在标准逻辑中的剔除。
4. 在新近的言外逻辑学中对断定的语用定义。

---

① Cf. D. Miéville & D. Vernant (dir.),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mathématique de S. Lesniewski*, and *Stanislaw Lesniewski aujourd'hui*.

一、弗雷格所说的断定力

1879年，弗雷格在里程碑式的小册子——《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①]中第一次引入了断定符号。然而弗雷格的相符概念也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在他1919年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中确定了下来，这本书是描述"否定"的[②]。对他后期概念化的快速研究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构建断定概念的形成，特别是可以更好地揭示出先前更为技术性的公式表达（formulation）[③]，以及弗雷格赋予了它怎样的深层意义。

弗雷格先将科学的特征描绘为问题的有序运用，然后把对于问题的理解定义为"思想的录入"（la saisie d'une pensée）[④]。例如，问题"苏格拉底是否死了?"就支配着思想录入，根据这个思想录入，苏格拉底已经死了。在逻辑学上，如果关于问题的思想用符号"p"来代表，那么录入则用符号"$-p$"来标记，水平线指出了"对于涵义内容的简单推理"（considération），也就是说，对于思想的推理。由于"相反的思想"（pensée opposée）和所有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否定的公式来表达初始问题。但是，这种再一次的公式表达只包含了简单的思想录入，并不会包含其他的内容，确切地说只是"相反思想的录入"，根据这种思想录入苏格拉底没有死。在逻辑学上，相反思想的录入用符号"$\top p$"来代表，在水平线下的小垂直线代表了否定。当然，思想和相反的思想在逻辑上相互矛盾："对于所有的思想，都存在着另一种相矛盾的思想，以便于当相矛盾的思想被说成是真时，另一个思想被说成是假。陈述相反思想的命题是在最初的思想表达上加否定词后构成的。"[⑤] 事实上否定也是真实性函项（fonction de vérité），当论元（argument）为真时它可以承认假的值，反之亦然，不会有歧义。就简单的思想录入$-p$而言也是一样，它也可以用真实性函项这个逻辑学字眼来表达："如果论元为真，那么函项的值就是真，而假就存在于其他的所有情况中……因此当论元是真值时，这个函项就将论元本身作为值。"[⑥] 因此在逻辑学和哲学上，这两个最初的运算

---

① Cf. § 2, p. 11—12.

② *La négation*, p. 195—213.

③ Cf. *Sur le but de l'idéographie*, p. 74—75; *Fonction et concept*, p. 94—05; *Sens et dénotation*, p. 110，在这一页中出现了"断定力"这个词，但还没有主题化。

④ *La négation*, p. 197.

⑤ *Ibid.*, p. 209.

⑥ *Fonction et concept*, p. 94. 我们注意到"其他的所有情况中"混合了如下情况：论元是一个假的陈述，论元不是一个陈述。因此，弗雷格坚持了一个总体的概述，p可以不是一个命题。

(opération)——思想录入"$-p$"和相反思想的录入"$\top p$"有着完全相同的地位。事实上二者只是被相对地定义为真和假，这使得我们不再认为它们担保了真实性并提供认识。问题并不是一个回答："思想的存在并不依赖于它真值的存在（wahrsein）。"[①]

只有在第二阶段认识和回答才会一起显现出来，回答是由一个拥有"断言力"（behauptende kraft）并表达判断的句子所陈述的。判断使我们跳过了简单的思想录入，而去考虑其真实性的价值，判断独自担保了对于真实性的认可[②]。从逻辑上说，这可以准确地翻译为断定符号（字面上说就是判断的符号：Urteilstrich），垂直线加在内容的水平线的左边。回答说"苏格拉底死了"用符号表示就是"$\vdash p$"，相反的回答"苏格拉底没有死"则是"$\vdash\top p$"。"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affirmation），这是需要建立在判断之上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个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回答。"[③]

特别是在判断否定所处地位方面，弗雷格的分析是所有现代逻辑学的基础[④]。但是就像莱希涅夫斯基所提醒的那样，所有的问题还只是停留在阐释所导入的逻辑符号上。《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⑤] 的作者们指出"$\vdash p$"可以被读作"我们肯定 p"，他们没有背叛弗雷格，弗雷格是明确表示过"通过例如'$\vdash 2+3=5$'这样的公式，人们可以肯定 2+3 就是等于 5"[⑥]。

莱希涅夫斯基却认为，这样的阐释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表达'p'是一个命题，那么相应的表达'$\vdash p$'也是一个命题；命题'$\vdash p$'和命题'人们肯定 p'有相同的涵义，但是和命题'p'的涵义不同；我们可以把'$\vdash p$'类型的所有表达看作是怀特海（MM. Whitehead）和罗素体系中的公理和定理。"[⑦] 在这个阐释中，断定本身属于被表达的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将《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和卢梭

---

① *La négation*, p. 197.

② *Ibid.*, p. 201; *Sens et dénotation*, p. 110, n. 2："我坚持认为判断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录入，而是对它真实性价值的认可。"

③ *La négation*, p. 195.

④ 对于其传承关系可以参看布尔查诺（Bolzano）所做的分析，cf. J. -L. Gardies, *Esquisse d'une grammaire pure*, p. 230—231.

⑤ *Principia Mathematica* (*PM*), introd., chap. 1, p. 8.

⑥ 德语原文为：So daB wir $_{L}$. B. mit "$\vdash 2+3=5$" behaupten: 2+3 ist gleich 5, in *Funktion und Begriff*, *Kleine Schriften*, p. 136. 安贝尔（Cl. Imbert）根据情况将"behaupten"翻译成了无人称的公式"人们可以肯定"，cf. *Écrits Philosophiques*, p. 94.

⑦ Cf.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mathématique de S. lesniewski*, p. 37—38.

(J. J. Rousseau）的《忏悔录》混为一谈："相关问题的公理和定理仅仅意味着既定理论的创造者肯定这个或那个内容，因此，相关问题的公理和定理就是专门谈论理论创造者的命题，由多个这样的命题所组成的系统并不一定是逻辑的系统，人们更有可能把它看作是相关理论创造者自成一格的推断性忏悔(sui generis confession déductive)。"①

换句话说，判断的断定能否归纳为个人简单观点的表达呢？弗雷格在1892年引入了"思想"（Gedanke）和"主观再现"（Vorstellungen）之间的判别，思想作为一个句子的客观涵义拥有对于心智世界的自主实在性，而主观再现总是伴随着它②，这种判别消除了二重性，判断并不是个人的再现表达，而是对思想的真实存在的无人称认可："做判断的人在认可真实性时，并不创造一个思想，就如同一个登山者不会通过登山而创造一座大山一样。"③ 因此，断定不是主观相信的表达，而是对公理——"真实存在的法则"——真实性的客观认可，其次是对所有定理——通过推论原则机械地、匿名地推断出的内容——真实性的客观认可，例如对于"取式推理"（modus ponens）的真实性的客观认可。

莱希涅夫斯基的过分小心是否已经误入了歧途，这是否会导致我们过分担心有人将断定阐释为个人主体的肯定行为？我们知道弗雷格构建了"概念文字"，从所有指示成分（专有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动词时态等等）中纯化出概念文字，以便于使自然语言固有的"对话状态中性化"④。但这是否意味着逻辑话语就发展成了一个完全的非语用主义？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怎样解释在一个成熟文本中，弗雷格明确把他对于逻辑否定的解释插入到明显的语用学问题架构之中，这种架构将科学步骤的特点描述为一个提问的实际进程？弗雷格用"肯定力"这个词来定义断定这个概念，他是第一个认可断定概念的语用学范畴的。他也因此而强调逻辑话语中最大限度的、基础性的语用要

---

① Cf. *ibid.*, p. 39，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

② Cf. *Sens et dénotation*, p. 105－106，108，n，1："我是通过思想来理解，这个思想不是'想'这个主观行为，而是客观的内容，客观的内容可以是多个主体共同的所有物。"

③ *La négation*, p. 205－206. 在研究初期，弗雷格明确排除了对"诗歌的"考虑，p. 195，也就是说话语的趣味用法——在其中只有再现的明确介入，指称问题让位于了对指称前提的简单要求，cf. *Sens et dénotation*, p. 108－109，115－117；Denis Vernant,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 § 33，p. 227－233.

④ Cf. Francis Jacques, *L'espace logique de L'interlocution*, chap. V：《Un langage libéré des contraintes de L'interlocution：L'idéographie frégéenne》, p. 229. 雅克（F. Jacques）坚持认为：相反，弗雷格概述了研究自然语言运用的语用方法，p. 226.

素，确切地说，这是为了勾勒出逻辑学领域的特征性，以及定义判断这个逻辑学的固有客体[①]。由于这些判断独自担保真实性和认识，因此它们用拥有断定力的宣告性陈述（Behauptungssätze）来表达，这和那些简单的问题、命令、愿望等一切非断定的陈述截然相反。从此以后，逻辑学就必须被定义为断言类话语。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有过，斯多葛学派（Stoïciens）定义辩证法为"真、假和既不真也不假的科学"[②]，明确指出判断的特征性是"肯定我们所指出的内容为真或假"[③]。但是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看，弗雷格是第一个明确用话语所实现的行为来描述判断特点的："如果我们用判断来指判断行为，就像用跳高来指跳高行为一样，那么我们就完全遵循了这种用法。"[④] 从此以后，在行为视角内，必须包括对说话人的指称和对运用语境的指称："如果判断是行为，那么它产生于限定的时刻，然后就从属于过去。一个行为包含一个行为者，如果行为者不可知的话，那么行为不完全是可知的。"[⑤]

这样的话，莱希涅夫斯基所指出的本质二重性就完全有了涵义。一方面，逻辑学在事实上并不是个人的推断性忏悔，它恰恰否认所有对于任意主观性的指称；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学又不能完全放弃其客体——判断——的断定范畴。既然断定符号的初次逻辑学主题化承认判断属于话语行为的范畴，然而却又不能够承认这个行为依赖于它的主体，那么这次主题化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折中性[⑥]。罗素提出的概念化检验将会证实这种二重性。

二、罗素所说的断定/推理

自 1903 年起，罗素在《数学原理》中就将被断定的命题（例如"A 比 B

---

① 我们注意到，在 1915 年弗雷格将真实性归纳为断定力，据此他在这里看到了逻辑学的本质："断定力以最清晰的方式包含有向你们揭露出逻辑学本质的指示，思想和断定力一起被表达了出来。"（*Nachgelassene Schriften*, p. 272.）

② Cf. *Vies, doctrines et sentences des philosophes illustres*, Diogene Laërce, vol. Ⅱ, Ⅶ, p. 65.

③ *Op. cit.*, p. 73. 判断区别于诸如"天亮了吗"这样的问题，区别于诸如"他住在哪里"这样的询问，也区别于命令、誓言、恳求、假设、呼语等。顺便说一下，我们觉得，这个语用范畴——被评论者所忽略——特别适合于对斯多葛逻辑学特别是麦加拉逻辑学所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富有生命力的再次解释［可以看一下关于"犄角"的论元，以及菲洛（Philon）和第欧多鲁（Diedore）之间关于蕴涵的辩论］, cf. *infra*, chap. V.

④ *La négation*, p. 205, n. 1.

⑤ *Ibid*.

⑥ 换句话说，作为逻辑运算，判断要求真实性这个问题架构，但是作为主体的行为，判断属于认识论的问题架构，它考虑的是可能的错误，也就是说，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就这一点来看，弗雷格所做分析具有的二重性是有程序科学价值的。cf. *infra*, § 4.

大”）和只是被推理的（considéré）命题概念（例如“如果 A 比 B 大”）区分了开来。为了分析蕴涵（implication）和推论（inférence）之间的差异，这种判别在逻辑上显得很必要。事实上，“蕴涵‘p 蕴涵了 q’断定了一个蕴涵，尽管它既不断定 p 也不断定 q”[①]。假设关系是被有效断定的，但是命题的要素 p 和 q 仅仅是被推理的。相反，取式推理的推论过程则以被断定的命题们为对象：“当我们说‘所以’时，我们就建立了一种只可以连接被断定了的命题们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同于蕴涵的。当‘所以’出现时，假设被消除，结论自身被断定。”[②] 由于推论断定了蕴涵和它的前件（antécédent），所以推论授权了对后件（conséquent）的断定，即脱离规则（le détachement）。我们因此避免了无限回归，当阿基利斯（Achille）[③] 想迫使乌龟断定蕴涵结论时，他会陷入无限回归[④]。

罗素的主题化表示为：既然对蕴涵的阐明，以及取式推理的推论运用需要判别话语行为的两种类型，所以断定概念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勾勒出宣告性陈述的领域，而且是为了在演算自身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因此，在基础逻辑运算的核心中去除语用学范畴就不那么容易了。既然我们不能够放弃断定的行为范畴，那么就还需要知道怎样避免心理主义的偏差，这种偏差导致将逻辑学特有的活动归纳为“推断性忏悔”。罗素通过对迈侬（Alexius Meinong）的批判，就这一点明确做出了回答。1902 年，在《论假定》（*Über Annahmen*）这本书中，迈侬这位奥地利格拉茨的哲学家明确区分了“断定”和简单“假定”（assomption），但是在他的优先现象学（préphénoménologique）中，他是凭借“主体的精神状态”来区分它们的。罗素曾提醒人们，用主观性来阐明断定是危险的：“是和不的主观对立，就是相信（belief）或者是不相信（disbelief）的主观对立：我们可以相信或者否认 p 或 $-p$，也就是真或假。”[⑤] 为了避免这样一个偏差[⑥]，罗素提出了对于断定的严格逻辑学定义，将其定义为只对真实

---

① *Principles* (*PoM*), chap. Ⅲ, § 38, p. 35.

② *Ibid*.

③ 译者注：芝诺悖论中最广为讨论的一个。奥林匹克赛跑冠军阿基利斯永远追不上慢慢移动的乌龟，如果让后者先走一小段路的话。因为阿基利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到达乌龟开始的地方；但当他达到那个地方时，乌龟又往前移了一段；同样，当阿基利斯又向前移动，乌龟也已经向前了，这一过程不断继续。阿基利斯和乌龟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但总是存在。故如果乌龟在不断地往前爬，阿基利斯就不可能超越它。

④ 罗素的分析明确解答了卡罗尔的谜题，*Ce que se dirent Archille et la tortue*.

⑤ *Meinong's Theory of Complexes and Assomptions*, p. 351.

⑥ 罗素甚至怀疑弗雷格的理论，弗雷格承认真实性可以成为一个仅仅被推理的命题的内容. cf. *PoM*, App. A, § 478, p. 503-504.

命题的肯定："当命题正巧为真时，除了和假命题共有的品质外，该命题还有额外的品质，我通过断定表明的就是这个额外品质，它是逻辑涵义上的，而不是心理涵义上的。"① 通过排除对于（陈述了判断的）主体的所有指称，罗素将断定归纳为对命题内在真实性的肯定。通过采纳命题的实在概念化（conception réaliste des propositions）从而规避了所有的心理主义，实在概念化将命题变成了实体（entité），实体的真实性是"终极据点"（ultimate datum）："一些命题是真的，而另一些是假的，就像一些玫瑰花是红色的，而另一些是白色的。"② 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讨论命题的真实性这个概念——罗素如往常那样清晰地承认将这个概念变成了"非常模糊的用法"③。我们只需要着重指出，在罗素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中，以及弗雷格的理论中，断定的逻辑概念仍然是双重的。它保留了断定力和对真实性的认可，但是同时它又不能表达被限定在某个特殊话语情形中的主体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中，一个关于思想存在——命题和其客观真实性——的实在担保避免了断定的整体语用概念化所带来的心理主义偏差。

《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作者们认可了罗素于 1903 年所做的在被断定的命题和只是被推理的命题之间的判别；他们采纳了罗素自 1906 年起所做的选择，重新使用了弗雷格的断定符号，并以基本观念的名义引入它；同时他们还接受了弗雷格的量化理论，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即将《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中对于语法来源所做的分析形式化④。

但是，只要命题的地位发生改变，那么问题架构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表达命题的句子，如同被定义的描述一样，会成为简单的"不完整的符号"。它们自身会失去整个实体的统一性，进而被分割成多个成分，实际上是"判断行为保证了将多个成分统一起来"。当判断表现为："在我们判断'*a* 是在 R 到 *b* 的关系中'（*a* est dans la relation R *à b*）时，如果存在一个复杂的项'*a*－在－关系－R－到－*b* 中'（*a*-dans-la-relation-R-*à*-*b*），那么我们就判断为真，

① *PoM*, chap. IV, § 52, p. 49.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

② *Meinong's Theory of Complexes and Assomptions*, p. 523. 罗素在这里吸取了摩尔（Moore）的想法。cf. Denis Vernant,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 chap. 2, p. 57.

③ *PoM*, chap. Ⅶ, p. 88. 在 1903 年所建的公理体系中，真实性是一种基本的观念，它可以定义断定。关于罗素所提的真实性的概念所具有的技术上的二重性，cf.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 7, p. 43－51；*Le statut de la vérité dans le calcul implicationnel de Russell en* 1903.

④ Cf. *The Theory of Implication*; *PM*, introd., chap. I, p. 8－9.

当不存在这个复杂的项时，我们就判断为假。"[1] 在这时，命题的成分们就组成了"客体复杂的项（complexe）"，它拥有实在性（réalité）。《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几乎不再谈及这个问题，这使得我们无法分析断定的严格逻辑特点。我们只能看到，当罗素和怀特海再次将命题阐明为判断要素的同时，事实上，也再次引入了直到那时才和"判断主体"分离开的指称："当'我'判断'苏格拉底是个人'时，（句子的）意义是由判断行为完成的，我们不再拥有不完整的符号。"[2]怎样才能再次排除莱希涅夫斯基提出的有关"推断性忏悔"的反对意见呢？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再次借助实在论的最终落脚点。

自1912年起，罗素就明确指出，命题的本体论（ontologique）资格的取消不会招致概念（品质和关系）的取消。概念是真实的一般概念（universel），是存在实体，我们拥有对它们的熟识（acquaintance）[3]。从那时起，由这种一般概念独自组成的逻辑命题就成了无人称的认识。逻辑原则就是明显的真实性。因为推论原则也是如此，所以对于推论原则的应用可以把一定的明显度保留在推断定理中[4]。先验性（a priori）特点和逻辑知（savoir）的必要性因此得到了拯救，所有心理主义的偏差再一次地被赶走了。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既然是主体在断定，那么只有断定像其他所有的判断一样拥有命题态度的值，断定的语用范畴才会得到加强。简而言之，主体是一般逻辑知的匿名的无人称主体。

三、莱希涅夫斯基对于断定的分析

断定在逻辑处理中产生的二重性只会不断扩大，只有实在担保（engagement réaliste）才能避免断定的语用主题化产生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可以理解莱希涅夫斯基作为坚决的唯名论者，是不能够接受这类解决方案的。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接受弗雷格或罗素所提的实在担保，这些实在担保将导致用心理学的词来阐明断定，事实上就是把逻辑理论和任意的"推断性忏悔"混淆

---

① *PM*, introd., chap. Ⅱ, § Ⅲ, p. 43;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 55, p. 370—380.

② *PM*, p. 44，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

③ *Problèmes de philosophie*, chap. 10, p. 133.

④ *Ibid.*, chap. 7, p. 94 & chap. 13, p. 162—163. 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发展罗素的明显性（évidence）学说，这个学说的难点，甚至是它的不连贯都证明了它不能够摆脱逻辑的绝对主义概念化的束缚，cf.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B. Russell*, § 32, p. 442—448.

在了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莱希涅夫斯基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在阐明断定符号时产生的二重性，只需要从逻辑学的符号体系中彻底地废除掉断定符号。当莱希涅夫斯基讨论《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中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时，也就是在讨论言语活动——物和元言语活动（métalangage）之间的层次混淆时，他也只是顺带提及了下面这句话："不要忽略断定符号。"[①]

然而，对这种废止的可能性提出疑问是很正常的。那让我们来看看在莱希涅夫斯基式演算中处于第一位的是什么。"广义命题演算"（Protothétique）：通过命题变量（variable propositionnelle）和函子变量（variable fonctorielle）的量化而扩展的命题演算[②]，这种演算授权了两个命题恒量（constante）的定义，即真和假：

（1）真（Verum）： $V \equiv [p][(p \equiv p)]$

（2）假（Falsum）： $F \equiv [p][p]$[③]

接下来授权了含1个论元（argument）的命题的4个构成函子（foncteurs formateurs）的定义，在它们中有：

（3）肯定（Assertium） $[p][\approx (p) \equiv p]$

（4）否定（Negatio） $[p][\sim (p) \equiv (p \equiv [q][q])]$[④]

以及授权了含2个论元的命题的16个构成函子的定义，它们中有：

（5）重言式（Tautologie） $[pq][V(pq) \equiv V(p \equiv q)]$[⑤]

（6）前后矛盾（Antilogie） $[pq][F(pq)] \equiv \sim V(p \equiv q)]$.

通过推理——在标准逻辑中，这些推理从属于元言语活动——纳入到演算自身内部，这些定义就此拥有了不可否认的分析力量。

在定义（3）中莱希涅夫斯基所称的肯定（assertium）并不属于弗雷格所

---

① Cf.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mathématique de S. lesniewski*, p. 45.

② 这样的演算承认"逻辑等价"（le biconditionnel）为唯一的原始算子（opérateur），这使得我们可以引入"等价定义"作为真正的论题。关于广义命题演算，cf. Lesniewski, *Grundzüge eines neuen Systems der Mathematik*; E. C. Luscher, *The Logical Systems of Lesniewski*; Denis Miéville, *Un développement des systèmes logiques de Stanislaw Lesniewski, protothétique, ontologie, méréologie*.

③ 命题变量在整个｛V, F｝中和一般量化中获得值，一般量化可以被阐释为在值的领域中的合取（conjonction），定义（1）被阐释为（V≡V）.（F≡F），定义（2）被阐释为（V. F）。

④ Cf. 罗素的定义：$\neg p =_{Df} [p \supset (q) q]$，罗素在1903年发表的《数学原理》§ 19, p. 18中以非正式的方式提出。

⑤ 我们注意到，同样的符号"V"被用在了定义（1）和定义（5）中，详细说明了相关语义种类的语境可以消除这种二重性。

提的断定（assertion），但却从属于命题的肯定（affirmation）逻辑函项。根据这个定义，对于命题的简单登录（inscription）等同于肯定：$p \equiv \approx p$。因此，莱希涅夫斯基所提的肯定算子仅仅使得肯定函项（fonction d'affirmation）——从本质上说一般是保持暗含的——变得清晰了。这和弗雷格所说的正面的、肯定的思想录入（la saisie d'une pensée）相符。当命题为真时，函项反映出真值；当命题为假时，函项就反映出假值。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否定的准确对应物，它支配着所有接纳了"双重否定表肯定"（duplex negatio affirma）法则的双重演算[①]。作为真实性函项，肯定（affirmation）引入了真实性，但却不提出任何关于真实性的担保。这样的话，区分肯定和断定就很方便了。但是，弗雷格通过认可判断真实性的方式所构想出的断定又是什么呢？定义（5）和对立的定义（6）似乎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它们在符号系统中引入了针对由原子命题（proposition atomique）p 和 q 组成的复杂命题的有效性认可。我们该不该把莱希涅夫斯基所使用的符号"V（p，q）"和弗雷格的符号"$\vdash$A"（在这里 A 是一个由 p 和 q 构成的复杂命题）进行类比呢？事实上，是不应该的。如果说弗雷格的断定符号象征着一个判断行为，这个判断行为以外在的方式加入到命题推理中，那么莱希涅夫斯基的符号系统则构成了对于拥有 2 个论元的命题的 16 个构成函子中的第一个函子的定义性解释。换句话说，"V（p，q）"再现了真实性函项，这个真实性函项内在地依附于仅对命题"p，q"的了解以及它们的逻辑联系。"真"是它自己的试金石（Verum index sui.），复杂命题的有效性是自身提出来的，不借助于任何主体的判断。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我们说 V（p，q）仅依据它的内部结构明确了重言式，也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效性公式。断定符号的同义叠用的特点在于徒然地从外部重复了由自身提出的评定："弗雷格的'判断符号'（Urteilstrich）'$\vdash$'缺乏逻辑意义；在弗雷格（以及罗素）的理论中，判断符号仅仅说明行为人把指明的命题作为真。因此，如果说命题编号不属于命题结构，那么'$\vdash$'就更不属于命题结构。命题自己不可能说它是真的。"[②] 维特根斯坦就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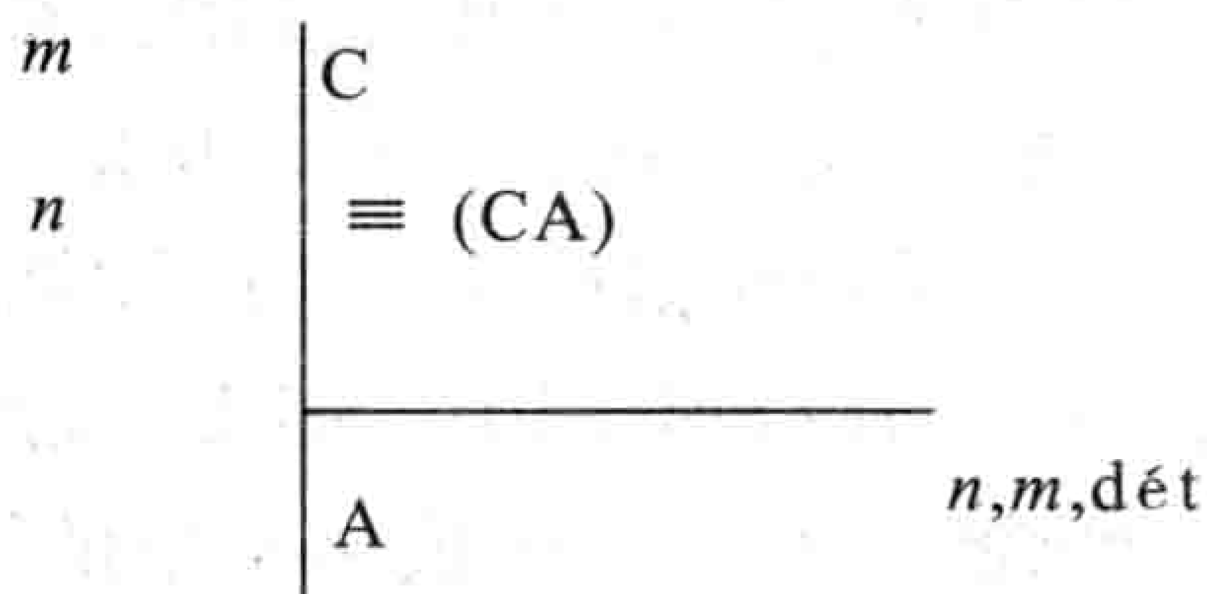
①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表肯定的符号"≈"被读作双重否定。

② Cf.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4. 442.；维特根斯坦后来又重提了这种排斥，cf.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22，p. 124.

样肯定了莱希涅夫斯基对弗雷格的断定符号的抛弃[①]。肯定和重言式的逻辑功能只是定义了“真”的固有逻辑关系，并取消了所有对于主体判断行为的语用感知。

分析、批判了弗雷格苦心构建但不够完善的最后理论之后，我们原本可以建立起形式逻辑的非语用主义。赌注也许是押在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采纳的绝对的语义视角。我们在这里不再讨论这一点。我们来考虑一下，是什么在广义命题演算中维持了公理表达。这个演算至少包含了一个公理和定义的指令、替换的指令、脱离的指令、量词分配的指令、外延的指令。例如脱离指令（dét），米耶维尔（Denise Miéville）认为，在算子预先确定的表达中，脱离指令表达为：

假设有系统中预先登录的两个论题 B 和 C，如果 B 拥有一般形式 ≡(CA)，那么作为系统的新论题引入 A 是可以的[②]：



类似于经典的取式推理，这条规则在于当我们承认了等价和第一个项时，便授权了第二个等价项的脱离。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情况：命题 p 和 $p\equiv q$。我们可以把 q 脱离出来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行。因为从简单的登录 p 和 $p\equiv q$ 中，通过定义（3）的应用我们只能得出：命题被肯定了，也就是说 $\approx p$ 和 $\approx(p\equiv q)$。然而，相对于命题的简单肯定，脱离指令要求的更多。脱离指令是在“论题”身份的系统中，也就是说在初始公理或定理身份的系统中，提出了它们的许可。我们再来看一次卡罗尔的谜题：如果初始命题不被采纳，那么任何脱离都是不可能的。罗素所提的断定的功能之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他这样描述取式推理：“因为 $\vdash(p\supset q)$ 和 $\vdash p$，所以 $\vdash q$。”在脱离规则

① 但是，从更深层次的涵义来看，断定还是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的核心中。罗素曾指出，变位动词（和动名词相反）作为命题的“活”单位，其断定功能在分析中被忽略了：“ϕ 在 ϕ_x 中不是一个被分割的、可区分的实体，它存在于（it lives）ϕ_x 形式的命题中，在分析中不能幸免。”*PoM*，§ 85，p. 88；cf. Denis Vernant，*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7，p. 41—54. 维特根斯坦把它变成了“说”（dire）与“指出”（montrer）之间初始对立的来源；命题是一幅“生动的画”（lebendes Bild），cf. *Tractatus* 4. 0311.

② Cf. *Op. cit.*，p. 129.

的元公式中明确表示了：“假设有系统中预先登录的两个论题 B 和 C。”论题的位置运算（opération de position）也仍然暗含在推论的图式表达中。必须考虑到，只有登录公式才能将公式接纳和位置运算作为系统的论题。作为证明，从反面来看，在假设条件下的验算法（preuves sous hypothèse）中，位置由于明确了登录它的假设地位（公式的右边）而变得很弱。例如，替换法则的验算法①：

$[pqf]\ [(p \equiv q \cdot f(p)) \rightarrow f(q)]$

1		pqf	$p=q \cdot f(p)$	hyp.
2			$p=q$	1, ^ e
3			$f(p)$	1, ^ e
4			$[pqf]\ [p=q \rightarrow (f)(p)=f(q))]$	th 1
5			$f(q)$	4, [ ] e,2,3,=e
6			$[(p=q) \cdot f(p) \rightarrow f(q)]$	1-5,→i
7	th.			1-6, [ ] i

在这个验算法中，我们可以将假设 1 和其他所有的公式区分开。其他的公式都是论题，要么是来源于对推断规则的运用，如 2、3、5、6、7；要么是来源于对先前所证明过的定理的引入，如定理 1 被引入了 4 这个外延定理的表达：$[pqf][(p \equiv q) \rightarrow (f(p) \equiv f(q))]$。因此，验算法图表右方的指令（命题编号和/或定理编号，以及所使用规则的名字）掩盖了明示的断定符号的缺失——断定符号是用来在有着假设的验算过程的等价演算中区分论题（thèse）和假设（hypothèse）的。在弗雷格和罗素的演算中，假设的范畴是由断定的缺失表现出来的。因此，“神奇后果”（consequentia mirabilis）就成了这个演算的定理：$\vdash [(\neg p \supset p) \supset p]$；所以，作为蕴涵的相连前件，$\neg p$ 和（$\neg p \supset p$）都没有被接纳为论题。因此，我们就不会惊讶于克莱尼（Kleene）的行为，他虽然认可对弗雷格和罗素断定用法的抛弃，但却为了用符号明确表示公式的论题价值而借助于“十字转门”（turnstile）“$\vdash$”，也就是说，它的句法具有可推断性：“公式 B_1 的完整（情况）清单……如果清单中的任何一个公式要么是 A_1…… A_m 中的一个，要么是公理中的一条，又或者是根据规则来源于→在清单中位于前面的两个公式，那么 B_1 就是从 A_1……A_m 得出的一种（形式）推断（B_1）。如果存在从 A_1……A_m 得出的既定公式 B 的推

① Cf. *ibid.*, p. 179. 1916 年莱希涅夫斯基第一个使用了“自然推断”模式，其后亚希科夫斯基（Stanislaw Jaskowski）系统化了这个模式。cf. *On the Rules of Supposition in Formal Logic*; Gerhard Gentzen,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logische Schließen*.

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B 是可以从 $A_1 \cdots\cdots A_m$ 推断出来的。用符号表示就是：$A_1 \cdots\cdots A_m$，$\vdash B$。符号‘$\vdash$’可以读为‘推断’（déduit）。”① 因为当 $m=0$ 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简单的论证，所以论证的公式可以简单地写成：$\vdash B$②。

毫无疑问，通过在验算的过程中区别公式的位置（定理）和假设条件下公式的简单假定，可导出符号保留了弗雷格和罗素的断定概念中的某些内容。存在这样的担保：公式 $\vdash A$ 作为系统的定理储备（stock）的一部分而被接纳、接受③。

然而，这样的担保却避开了莱希涅夫斯基对于推断性忏悔的反对——不采用来自任何主体的判断形式。它来自于验算的机械过程，这个过程只取决于所采纳的系统，也就是说，取决于公理和推论规则的储备，更确切地说就是转换规则的储备，推论原则提供了系统中所有定理的形成手段。作为句法过程，可导出性构成了相关系统的内在范畴。当我们将系统的名字编入“十字转门”时，这种相对性用符号表示为：$\vdash_L A$，它表示 A 是系统 L 的论题。对于论题的担保完全不取决于裁定，裁定来源于系统使用者的特应性（idiosyncrasie），甚至是系统创造者的特应性。

这样，最终，断定最初的主题化所产生的二重性似乎就消失了，这得益于在肯定、重言式和可导出性之间所做的判别。然而，我们需要指出，这三个逻辑学概念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莱希涅夫斯基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功绩在于，明确了肯定和我们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所称的重言式拥有无可争论的地位，即是含一个或两个论元的命题的函子。这样的话，它们就能够接受句法定义，这里可参看定义（3）和（5）。相反，可导出性没有真实性函项的值。莱希涅夫斯基认为可导出性属于脱离规则，克莱尼认为符号“$\vdash$”不属于言语活动，而是属于元言语活动。这证明了可导出性绝不是系统的算子，而是构成了对演算进行运算的结果，构成了验算过程的结果。

在过程范畴内，弗雷格和罗素所提的断定的语用价值最终被规避开了。逻

---

① *Logique mathématique*, chap. 1, § 9, p. 44. 规则→符合取式推理。这种策略可以追溯到 1934 年，cf. *Proof by Cases in Formal Logic*.

② 从中可以看出，推断的元定理的公式为：$A \vdash B \equiv \vdash (A \rightarrow B)$，可以轻松地将条件 $A \rightarrow B$ 和蕴涵 $\vdash (A \rightarrow B)$ 区分开来，将双重条件 $A \equiv B$ 和等式 $\vdash (A \equiv B)$ 区分开来。

③ A. Church, *Comparison of RussellL's Resolution of the Semantical Antinomies with that of Tarski*, n. 6, p. 749：“在单独一行上写下一个成熟公式（formule bien formée, FBF）”，这就给予了它断定的地位。“对一个成熟公式（句子或命题形式）的断定并不一定和主体对它的断定一样，根据对它的断定，它可以是定理，或者是某个成熟公式表格中的可论证后果。”

辑话语行为的范畴降级到了边缘位置，它和可导出符号借助于缩写“Th.”“hyp.”以及规则的名字明确出现，并暗含地写入了验算的图表设计中。就像弗雷格在《逻辑研究》中认为的那样，逻辑学作为推论的科学和练习，不能够完全摆脱所有的语用特点。逻辑学否定了由个人主体承担的话语行为的所有地位，发展成了一个匿名的系统，这个系统在句法范畴和语义范畴中展开，而它们的元逻辑则缝合了它们。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系统规则所引起的介入（行为），这个系统就不能够有效地运转。在规则的元语言表达的过程层次中，不可或缺的语用范畴躲了起来，可导出性的句法符号构成了语用范畴的基本要素之一。

弗雷格对断定的主题化让我们可以猜想，标准逻辑学的非语用主义的惰性论题是有其局限性的[①]。弗雷格的主题化也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启发了对普通言语活动的最初的非形式分析。弗雷格的断定力概念使得奥斯汀坚持这样的主张：所有的话语运用，无论是否是纯粹的宣告类，都有行为价值。既然力求对普通言语活动的各方面进行形式化的言外逻辑（logique illocutoire）来源于坚决的语用分析，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相比之下，言外逻辑所提出的断定概念化是否为了强调标准逻辑的形式研究方法而抛弃了弗雷格所预感的某些东西?

四、断定行为和言外逻辑

奥斯汀从弗雷格创立的话语行动研究方法中系统地得出结论，他区分了言内意义（signification locutoire）和言外之力（force illocutoire），并用 F(p)[②] 来表示。根据涵义、指称，以及指称过程和谓称过程（procédures prédicatives）之间的链接（articulation）来分析言内意义，言内意义是与简单的思想录入相符的[③]。言外之力的观念则是弗雷格所提的断定力概念的普遍化[④]：不同的力可以对应同一个言内意义。例如，“门关了”（La porte est fermée）拥有一个断定力，而“关门”（Fermez la porte）则拥有一个命令的

---

① Cf. R. Carnap, *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 46, p. 168. 人们可以了解去语用化后会发生什么，cf. *On some Concepts of Pragmatics*, p. 248－250，卡尔纳普尝试了对断定的语用学定义；R. Montague, *Pramatics and Intensional Logic*.

② Cf. John Austin, *Quand dire, c'est faire*, 8e conf.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奥斯汀是弗雷格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的英文译者。

③ Cf. *ibid*. p. 108，在这里奥斯汀明确地接受了弗雷格的理论遗产。

④ 在这方面，遗憾的是译者自以为正确地将“力（force）”翻成了“值（valeur）”，cf. p. 175, n° 32.

指令力等等。自此，整个陈述过程都被解释为一个在合乎规定语境中确定了的说话人所产生的话语行为（speech act）。支配着命题内容的真实性条件绝不会被抽象感知，而是从属于控制着整个话语行为的成功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①]。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断定具有话语行为的价值，假设了对于一个在合乎规定的陈述语境中的确定了的说话人的担保。作为先驱者，摩尔（G. E. Moore）注意到[②]，断定“母猫在席子上，但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La chatte est sur la natte mais je ne le crois pas）在语用上是悖论的。如果要肯定“母猫在席子上”[③]，那么说话人对所陈述内容的相信就是它的条件。因此，在句子的后半部分，悖论的陈述涵义抵触了前半部分的断定力在语用上所含有的内容。自此，根据塞尔和范德维克（Daniel Vanderveken）所提出的正式定义，断定被定义为言外之力，其言外目的（but illocutoire）的特点是从词到物的适从方向——“现实再现事物的状态”，其命题内容受支配于一个准备条件（condition préparatoire），即预设“说话人有理由相信命题内容的真实性”，准备条件还依赖于真诚条件（condition de sincérité）——“说话人相信命题内容”[④]。

就这样，将断定和范德维克所命名的“宣告”（déclaration）区分开来。譬如，“我宣布开战”“我给你命名”，这些宣告表现的是言语活动的施为（performatif）范畴。宣告的目的是“只通过一个陈述过程来完成一个行为，宣告被看作为完成行为”，其关于命题内容的条件（condition sur le contenu propositionnel）为“命题内容再现了说话人现在的行为”，其准备条件为“说话人在他陈述的时候有能力也有理由完成这个行为”，最后，其成功条件

---

① 关于初次的理论化，cf. John Searle，*Les actes de langage*.

② Cf. *A Reply to my Critics*，p. 542－543；René Daval，*Moore e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chap. 7，p. 91－97.

③ 这是阿尔蒙格朗（Françoise Aremengrand）对原文的翻译，*La pragmatique*，p. 73.

④ D. Vanderveken，*Les actes de discours*，p. 127.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言外之力还是由三个方面来定义：目的的完成模式、关于命题内容的条件、力度。因为在看断定的初始力（force primitive）时这三个要素是中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提及这三个要素。

(condition de succès) 为“说话人相信、愿意、希望完成这个行为”[1]。

断定和宣告都是初始的言外之力，除此以外还有指令力（例如命令……）、承诺力（例如承诺……）和表达力（例如感谢……），这些都可以循环地定义(définir récursivement) 其他所有类型的语力。通过调动现代形式语义学的资源，塞尔和范德维克构建了对各种言外之力的定义，并且通过作为各种可能的客观现实的说话人、听话人、时间、地点和语境这五个要素来描述陈述的客观现实的特点，从而概述了真正的言外逻辑（logique illocutoire)，提出了对言外逻辑的公理化[2]。

我们在这里并不进行形式化，只是简单地来看一下范德维克用来分析法语动词“affirmer”（肯定）和“nier”（否定）的方法：“在法语中，动词‘affirmer’命名了断定这个初始的言外之力。‘affirmer’有的时候有‘正面’的涵义，和‘nier’相反；在这种情况中，affirmer 就是做正面的断定。在法语中，动词‘断定’(asserter) 不被用到或是很少被用到，这和它的名词以及形容词‘assertorique’的情况正好相反。”[3] 这是一个事实，在法语中不存在动词“asserter”，这就导致需要借助动词“affirmer”[4] 来表达断定行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分析会不会导致将命题的断定力和肯定的特点（也就是说“非否定”）混淆起来，助长了语言学上的二重性呢？在《语用逻辑基础》(*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ary Logic*) 中，塞尔和范德维克对英语“assertif”的解释表明并不是这样的：断定的初始语力用动词“to assert”来表达，“affirming”是从属于断定的：对普通言语活动的肯定（affirming）通常相反于否定（denying)。“肯定包含做正面断定的概念，相反于负面的断定。”[5] 就

---

① *ibid.*, p. 109, 128. 宣告的言外目的有着双重的适从方向——“为了让客观现实符合命题内容而做，同时为了让命题内容符合客观现实而说”，p. 110. 既然这里涉及的是初始力，那么宣告的目的完成模式，以及力度在这里仍然是中性的。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提问拥有指令价值，就像对它的定义一样，cf. p. 182, 198. 弗雷格是第一个引入定义符号的：｜├ (A ≡B)。它的意思是“A 和 B 应该有同样的内容”，cf. *Begriffsschrift*, § 24, trad. anglaise p. 55。对标准逻辑的语用方面的完整分析应该将定义的过程纳入其中。

② Cf. *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ary Logic*, chap. 3, p. 60; D. Vandeveken,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vol. 1, 2.

③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168.

④ 然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动词“affirmer”（肯定）在被用作直陈式现在时第一人称的时候，拥有施为价值。范德维克认为，虽然“下雪了”(Il neige) 是一个断定，但“我肯定下雪了”(J'affirme qu'il neige) 则是一个宣告，*ibid.*, p. 159. 我们则把它看作元话语，cf. *infra*, chap. Ⅲ.

⑤ p. 183.

这样，弗雷格区分断定和肯定的忠告虽然在法语中是混乱的[①]，但在英语中是行得通的[②]。另外，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断定也出现在了拉丁语中，拉丁语接纳了词语“assertium”，它是从司法概念“adserer”中派生出来的，其意思是为了肯定或否定（adsertionem denegare alicui）某人的自由状态而把某人带来（manu）审判。

断定和肯定之间的判别伴随着对肯定和否定的逻辑功能角色的承认。肯定断定和否定断定是相对的。就像范德维克明确指出的那样：“否定一个命题，简单来说就是肯定（affirmer）对它的否定。”[③] 普通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牢记了弗雷格的第二个忠告：否定是言内范畴的一部分，并不构成和断定相反的言外之力。否定是对否定命题的断定：“天气不晴朗”构成了一个对命题“天气晴朗”的否定断定。这是可以推广的，例如“不建议某人做某事，简单来说就是建议他不做某事”[④]。因为断定在语用上表达为相信，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没有固有的不相信（in-croyance），只是相信的内容和被接纳的相信内容相反。相信作为断定，没有对立物：我们只可以暂缓相信，就像我们只推理一个命题而暂缓对它的断定。

虽然断定逻辑遵守了弗雷格的分析依据，但是作为普通话语行为的言外之力，断定逻辑仍然根据自身要求而发展。当所有的成功条件都被满足时，当且仅当命题 p 表现为有效时，由一个在合乎规定的语境中的确定了的说话人所发出的对命题的断定行为就是令人满意的（satisfait）[⑤]。这里就有对命题真实性的担保，但是这种担保建立在对原子命题（proposition atomique）的事实真实性的承认之上。在标准逻辑学中，最小担保提出将可推断命题接纳为新论

---

① 这有利于在技术类语言中引入新词“asserter”。

② 译者注：范德维克在这里所称的肯定（affirmation）和莱希涅夫斯基所称的肯定（assertium/affirmation）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正面断定”，后者是“正面的思想录入”，并不担保任何真实性。

③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168. 动词“affirmer”的意思是“asserter”!

④ Cf. D. Vanderveken, *La théorie des actes de discours et L'analyse de la conversation*, p. 14。我们可以相信，言外逻辑只接受对肯定命题的断定“$\vdash p$”和对否定命题的断定“$\vdash \neg p$”。然而，自 *Les actes de langage* 起，塞尔引入了言外否定“$\neg \vdash p$”，作为对断定的言外之力的否定，cf. § 2.4, p. 71—72. 另外，在 *Foundations de la mathématique de S. lesniewski* 中，主要为了表明假设演绎体系中的完备性，塞尔和范德维克运用言外否认（illocutionary denegation）作为对完成任意一个言外行为的拒绝——$\neg F(p)$，cf. chap. 7, p. 152—155.

⑤ 当成功条件建立在行为自身上时，例如，一个断定假设说话人相信他所说的，满意条件就和客观现实相关：如果命题描述的是事物的状态，当且仅当命题为真时，这个断定才是满意的。因此，行为可以是成功的但同时是不满意的，例如成功的断定可以是错误的（不满意的），cf.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33—34, 130—135.

题，但我们决不同意这种最小担保。这个命题只能是一个复杂的逻辑结构，而绝非是事实上的（factuellement）真实，它是有效的（valide）（根据假设演绎体系中的完备性的元定理：$\vdash A \rightarrow \ \mid = A$）。事实上，我们知道，用波斯特（Post）的话来说，将类似原子命题“$\vdash p$”作为定理接纳的逻辑系统可能是不可靠的①。

另外，从严格的外延观点来看，被断定的命题 p 不能够被看作一个简单的真值载体。因为，命题是命题态度的客体，而命题态度使确定了的说话人的精神状态介入了进来，使确定了的说话人的相信显现了出来。这里就出现了言外逻辑的内在性范畴（dimension intensionnelle），它要求在考虑命题真值之外，考虑到命题的概念结构，它感知了“意义的认知方面”②。除了控制着真实性价值的逻辑算符（connecteurs logiques）之外，还要求使用更有约束性的算子（opérateurs），这些算子感知了命题的概念范畴。两个言外行为 F_1（p_1）和 F_2（p_2）之间的同一性（identité），除了命题 p_1 和 p_2 的成功条件和真实性条件的同一性之外，同样要求它们命题内容的同一性③。另一方面，将说话人看作断定行为的创造者会限制命题推论游戏：说话人并不承担其断定带来的所有逻辑结果，其断定整体在逻辑上不一定是可靠的。言外逻辑展开为一个实用推论（inférences pratiques）的系统，它只要求一个最小的一致性④。

五、暂时的结论

言外逻辑的自身要求非常有力地表明，是什么将对断定进行的分析和对断定进行的感知区分开来。对断定进行的分析根据的是可推论运算，对断定进行的感知在事实上是将断定设想为肯定行为，确保在合乎规定的语境中的个体说话人相信。

通过回溯历史，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莱希涅夫斯基所揭露出的断定概念的二重性。弗雷格和罗素所做的主题化提出，断定的问题架构要求将两个区分交

---

① Emil L. Post, *Introduction à une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propositions élémentaires*, p. 29—53.

② Cf.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96. 例如，断定“西塞罗（Cicéron）是西塞罗”和“西塞罗是图留斯（Tullius）”，尽管命题都是真的，但并不相同，因此并不等同。对意向性方面的考虑促使范德维克摒弃了直接指称理论，促使他引入了专有名词的概念涵义：“对于语境中的说话人来说，在语境中专有名词的涵义是名词的载体涵义。因此，有着同一个载体的不同名词在说话人不知道他命名了同一个个体的陈述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p. 100. 在这里，灵感明显还是来自于弗雷格的理论。

③ Cf. *ibid.*, p. 136.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同一性强于最严格的等同，和卡尔纳普（Carnap）所提的意向同构性（isomorphisme）是一样的。

④ Cf. D. Vanderveken, *La théorie des actes de discours et L'analyse de la conversation*, p. 33.

叉起来：肯定/否定、断定/推理。我们已经指出，这个成果既构成了传统逻辑分析的共同财富，也构成了普通言语活动的非形式研究方法的共同财富。这个方案的功绩在于很前卫地开创了语用调查。但是，它的缺陷在于没有标明其关联局限。莱希涅夫斯基摒弃了实在担保，他相信通过抛弃对断定符号的使用就可以避免心理主义的偏差。我们已经指出，类似的立场最终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标准逻辑作为个体话语的实践是不能够避开语用担保的，即使它把语用担保降级为推论过程。

但是，莱希涅夫斯基的反对意见也是有其价值的，虽然逻辑是一个话语，但逻辑仍旧构成了对话语性（discursivité）的纯理性运用。脱离规则所要求的断定担保是一个行为，但这个行为在习惯上、算法上确定的游戏中，确保的并不是个人的特应性相信——其理性是有限的——而是知识型上的、匿名的、一般主体的知（savoir），这个知最终可还原为所有的演算规则。

弗雷格在《逻辑研究》中所开创的分析拥有引人瞩目的丰富内容，他的分析概述了对所有话语的语用条件的观察，但是这些分析仍然是二重性的，它们不能够明确地区分理性话语的严格逻辑用法与日常话语的用法逻辑。

如果说，作为行为，断定根据相关话语的类型控制着整个话语，那么它就应有不同的形式。因此标准逻辑话语就不能够再是非语用的了，但它的语用特点不能够是普通话语的特点。当代，对言语活动的形式分析和非形式分析之间的趋同性越来越强，弗雷格的主题化所带来的初始二重性就完全有了涵义，并获得了语用价值①。自此，为了分析普通言语活动的实际运用，需要在语用范畴内对断定进行严格的概念化。我们将会指出，这需要我们摆脱逻辑形式化最初带来的语义限制和再现限制（cf. *infra*, chap. IV）。

---

① Cf. D. Vanderveken,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71-72.

第三章　话语行为的分类和言语互动

自1962年起，奥斯汀感受到了对话语行为进行分类的必要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尝试仍然是初步的①。1969年塞尔（Searle）②提出了一种分类可以用来描绘言外逻辑的初始语力（forces primitives）的特点，这种初始语力是塞尔和范德维克（Vanderveken）共同制定的③。相对于话语的某些概念，这种分类拥有它的合理性。我们想要说明，自从人们不再赞同一贯的概念，即对言语活动的语义感知和再现感知，人们就开始建立另一种概念，即更偏向于用纯粹语用学的方法来研究沟通。

接下来的内容是为了：

1. 着重指出塞尔所建分类学（taxinomie）的主要缺陷；
2. 指出研究话语行为的语用学方法的主要轮廓；
3. 概述话语行为的新分类；
4. 强调它的探索价值，同时也强调它的局限性。

一、塞尔所建分类学的主要缺陷

作为整个分类，塞尔的分类学建立在一定数量的明确的准则上：言外目的、适从方向、心理状态，以及强加给所有话语活动的3个条件，即命题内容、准备条件、真诚条件④。然而，言外目的事实上构成了行为的简单定义。另外，心理状态和3个条件只能用来描述相关的行为，而只有适从方向才拥有区分价值，并且能提供分类的界限原则。

有四个可能的方向：从话语到客观现实、从客观现实到话语、无适从方向、从客观现实到话语和从话语到客观现实的双重适从方向。关于适从方向有

---

① Cf. *Quand dire, c'est faire*, p. 151－164.

② Cf. *Sens et expression*, chap. 1, p. 39－70.

③ Cf. *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nary Logic*.

④ Cf. Vanderveken,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vol. 1 : *Principles of Language Use*, p. 103－124.

两个问题：(1) 我们能不能抽象地预见到其他可能的情况，例如自反的情形，从话语到话语或者从客观现实到客观现实？(2) 在哲学上，也就是说，从话语行为的一般观点出发，怎样解释可能的情况，怎样研究它们，怎样将它们区分开来？另外无适从方向在哲学上是否有涵义？适从方向一般来说确定了行为的满意条件 (conditions de satisfaction) ——例如依据真实性的断定，也就是说，从说到做、从话语到客观现实的相符——但是对无适从方向的表达类的接纳却使得人们不能够定义它们的满意条件①。

如果我们就像塞尔所定义的那样，承认适从方向提供了区分标准和分类的界限原则，那么我们就顺理成章地预计到话语只有 4 种基本类型。然而，我们知道 (Cf. *supra*, chap. I, § 3) 塞尔却采用了 5 种类型，这是因为从客观现实到话语的适从方向同时适用于指令类和承诺类。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在指令类的情况中，对于客观现实的预期行为是听话人的行为，而在承诺类的情况中，所承诺的行为是说话人的行为。显然，这种判别是必要的。但是怎样引入这种判别呢？从言外目的来看，这种判别很合适，但作为明示的分类标准却不行。因此，这种判别自一开始出现就只是用来将依据适从方向所进行的初步分类以完全恰当的方式进行再一次细分 (subdivision)。由于需要不断地考虑不同的分类标准，因此出现了等级划分的缺失 (absence de hiérarchisation)。

除了形式上固有的缺陷，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判别的悄悄介入只是为了指令类和承诺类，这一事实揭示了哲学上更深层的局限性：奥斯汀所开创的话语行为分析具有独白体 (monologique) 特点。我们在下文中将要指出：话语行为的分类在哪些方面应该将听话人的推理作为明示标准引入，就像引入说话人的推理一样；话语行为的分类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引入适用于所有行为类型的内容。另外，我们强调有必要超越简单的话语分析，这将有利于推理沟通进程中的对话体 (dialogique) 特点。

二、研究话语行为的语用学方法

整个分类应该是逻辑严密的。但是这种逻辑严密性自身并不存在。它从属于对初始理论的选择。有时候，话语行为分类学依赖于对所有话语行为的初始定义。在提出一个系统的话语行为分类之前，我先概述一下赋予话语行为分类以涵义并证明其合法性的哲学问题。

我的研究方法是语用学，取其词源上的涵义：它从属于一般行为理论。就

---

① Cf. Vanderveken, *La théorie des actes de discours et L'analyse de la convention*, p. 16.

像奥斯汀模模糊糊觉察到的那样，话语行为首先是一个行为。因此，它享有所有人类行为的共通特点：都是由拥有相信和认识、愿望和意愿、价值观和禁忌①、感情和情绪的施动者所实施的行为。从实用观点以及知识型观点来看，施动者至少要是理性的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施动者只是被定义为由合作原则和竞争原则所规范的游戏中的演员之一。行为是即时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因此要注意，话语行为的一些特点，首先是从属于一般人类行为理论的（cf. *infra*，chap. Ⅷ）。

话语行为其他的一些特点则从属于它的特征性：这些行为毕竟是话语的行为。这里需要指出一个意愿的特征，正是这个意愿引出了话语行为：沟通的意愿③。它首要的目标是使他人认识、承认、分享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意愿和价值观。我们要区分以下的心理状态：固有的心理状态，例如相信“我相信会下雨”；叠加的心理状态，“我知道你相信会下雨”；相互的心理状态，“我们都相信会下雨”。

从语用学的角度，我建议根据双重范畴来进一步分析话语行为：互动性（interaction）和交流性（transaction）。

我所命名的“互动分析”，考虑的是固有的言语互动④。作用于他人的行为是以沟通信息为目的的，实施这个行为首先就是修改他人的心理状态。因此，断定的第一个功能就不会是再现功能，即陈述一个描述或反面描述客观现实中某个事实的命题，而应该是沟通功能，即让听话人了解说话人对于客观现

---

① 这些不同的“精神状态”是根据行为来定义的，cf. Philip. R. Cohen & Hector J. Levesque, *Intention is Choice with Commitment*.

② 关于实用方面，cf. Christopher Cherniack：“如果 A 拥有特别的相信和欲望。那么 A 就可以执行恰当的某些行为，不一定是所有的恰当行为。”（*Minimal Rationality*, p. 12；关于知识型方面，cf. Daniel Vanderveken, *Principles of Speech Act Theory*, p. 39－43.）

③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塞尔试图将意向性语言学（“涵义的意图”）简化为初始的生物学形式。他从“说话人的意图”出发，将沟通（事实上，他将沟通简化为奥斯汀所提的“uptake”）附属于再现。cf. *L'intentionalité*, chap. 6, p. 195, 200, 203. 我们认为，这表现出了再现和独白体的双重幻觉。言语互动是一种行为形式，因此它拥有生物学根源。但是，从特征性上来看，言语互动的特点是它的沟通范畴。当言语互动将施动者设置为对话双方时，沟通就引起了分享和互惠（mutualisation）对话双方的意图以及他们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因此，再现是来自于互动进程的。

④ 为了简单些，我们在这里将沟通行为限制在言语行为上，但是奥斯汀曾经提醒过，简单的示意行为（actions gestuelles）也可以是涵义的沟通意向的载体：“人们可以用嘲讽手势（“faire un pied de nez”，译者注：具体的行为为手指分开，然后将拇指放在鼻子上）或是扔西红柿来表达抗议。”（*Quand dire, c'est faire*, p. 126.）也可以参看斯拉法（Sraffa）为了反对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再现概念化而提出的那不勒斯人的示意行为。在轮流发言的谈判中很重要的带有目光的言语活动、身体的言语活动等。言语活动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将符号学也纳入了其中。

实中某个事实的确信，并反过来获得听话人的认知反应[1]。关键在于首先应该是相信（croyance），而不是判别真实性（vérité）。在这里有一个摩尔的语用学悖论：我只能断定天是蓝的，但不相信天是蓝的。

然而，沟通这个词不应该诱使我们犯错误：问题不在于将拥有涵义和真实性绝对支配权的说话人发出的信息传递给听话人。自雅克（Francis Jacques）以来，人们对于这种模式的批评就没有停止过，我们认为应该将互动设想为对话双方之间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将说话人和听话人设置为一个对话体进程中的共同施动者[2]。即使人际间的交流经常是竞争性的，也只存在合作性的话语互动[3]。就像格赖斯指出的那样，话语互动受到特别地规定，这些规定就是要使话语行为服从高级秩序的约束（contraintes d'ordre supérieur），而这些约束特别依赖于相关对话的最终目的。根据最终目的的类型，对话的投射模式（cf. *infra*, chap. VI）提供了一个范围来操纵对话体策略的选择、调节话语行为的对话体功能。就这点而言，奥斯汀和塞尔的研究还完全停留在独白体的层次上。

再来谈谈"交流"（transaction）的范畴。我们用"交流"这个词指明了一个复杂关系，这个关系将作为言语活动实践的话语行为和它所处的非言语活动连接了起来。沟通互动一般来说本身没有最终目的。而交流是"他律的"（hétéronome）：言语合作最终是以非言语的合作为目的的，让他人或和他人一起改造客观现实。大喊"船沉了"的船长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事实，而是想引起全体船员和乘客有效的非言语反应：从船上撤离。言语互动是一系列非言语交流中的一环：人们和诊所联系是为了和医生约定一个时间，为了获得一个诊断，为了进行一个治疗，为了被治愈[4]。

作为基本的活动，言语活动可以用来分析事实、思考目的性、检验策略、

---

① 巴利（Charles Bally）通过三个部分准确分析了断定"地球在转"：（1）沟通行为：我让你知道……；（2）推理：我确信……；（3）陈述：地球在转，cf.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t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p. 50. 塞尔坚持认为，断定没有言后效果："肯定（断定）和许诺不能被定义为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言后效果的企图。"（*Sens et expresseion*, p. 41.）这就否认了交流的最终目的性。关于断定，皮尔斯坚持说话人面对听话人时的责任，即关于说话人对客观现实中的某个事实的相信。听话人只有在说话人可以证明其相信的情况下才会接纳这个相信，cf. *Christiane Chauviré*, *Peirce*, *le langage et L'action*。关于对断定的重新语用定义，cf. *infra*, chap. IV.

② Cf. *Dialogiques*, *Recherches logiques sur le dialogue* ; *infra*, chap. V.

③ 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用来结束冲突的谈判。即使交流的目的明显不一致，但显然可以存在一个必须以话语合作为前提的谈判，用来克服利益的冲突。

④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行为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可以将"言后"方面——奥斯汀将其看作非约定的"效果"也就是不可预见的"效果"——纳进来。

决定行为。正因为如此，言语活动就有了言语迂回的价值，这个言语迂回从属于非言语的关键（enjeux）和最终目的。因为所有的话语行为总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以改造客观现实为目的，因此它的全部意义都取决于其交流的最终目的。就像维特根斯坦提醒的那样："我们所说的是从我们的行为中获得剩余涵义的。"[①]因此，话语互动的目的、对话双方的地位和角色、他们所受的策略约束都属于对交流的分析。这种分析建立在非语言学的、特有的语用学资料之上，这些资料是由情境推理、施动者所规划的策略、共享的知识背景所特别提供的。

然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关于交流的一部分信息是由话语行为的言内内容来承载的，也就是说，"通过陈述（dictum）"来说。例如，"船沉了"描述了一个非语言学的行为，其主体不是话语行为的施动者。在所有的话语行为中，我们应该区分：

（1）说的施动者，言语行为本身的施动者，即对话者，一般来说都是暗含的，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指船长。

（2）所说的主体，所描述的非言语行为的主体，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正在下沉的船。

提出这个框架后，我们就有了足够的内容来重新评价话语行为的分类。

三、对于话语行为的重新分类

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分类（如表 3-1 所示）以符合我们研究话语行为的语用学方法，我们通过明确引入四条标准逐步构建这个新分类。

① Cf. *De la certitude*, § 229, p. 70.

表 3-1 话语行为的分类

互动 交流	非宣告类 ≠											宣告类 =
关系 互动 （话语） 交流 （客观现实）	元话语 话语=>话语			断言类 话语=>客观现实				担保类 话语<=客观现实				话语= 客观现实
关系 施动者 主体	引用类 ≠		阐述类 =	表述类 ≠		描述类 =		指令类 ≠		承诺类 =		≠
交流内容 状态/动作	“办公室的门”是一个描述 状态	你没有明确…… 动作	我总结为 动作	门是开着的 状态类 状态	船开了 变格类 动作	我挺伤心 表达类 状态	我开了门 行为类 动作	您当心些 状态	您去开门 动作	我会当心的 状态	我来开门 动作	开庭了 动作
交流的时间	现在	过去 现在 将来	过去 现在 将来	过去 现在 将来	过去 现在 将来	过去 现在 将来	过去 现在	将来	将来	将来	将来	现在

（1）既然所有话语行为的最终交流目的都是改造客观现实[①]，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判别就是区分：为了“间接”获得对客观现实的改造而建立起话语媒介的行为、自身“立刻”操作改造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又重新找到了最初由奥斯汀赋予施为句（performatif）的优先性，对于它们来说，说就是做。我们首先区分非宣告类（non-déclaration）和宣告类（déclaration），我们发现只有宣告类才借助超语言制度规定[②]来保证互动和交流的相互影响。所说的行为由说本身来实现，这个互动直接产生了交流：对于客观现实的实际改造。例如，我们可以来想一下，一位市长用惯用语宣布了一件事情，它所产生的交流：“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妇。”（Je vous déclare unis par les liens du mariage.）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了言语活动的神奇范畴：施动者是权力的受托人；这种惯用语应该是仪式性的。然而产生的行为不再造成对自然现象的改造，而是对社会产品的改造。这种社会性魔力建立在群体贷记给施动者的委托权力之上[③]。

（2）第二条标准明确了互动和交流之间的关系模式。为了简化一点，我们把互动简化为“话语”（mots），把交流简化为“客观现实”（monde），在这里我们重新看到了塞尔所提的适从方向。对于宣告类来说，双重方向仍然保持不变：互动在实践上有着交流价值，即行为由宣告本身产生。断言类（assertif）也依然有从话语到客观现实的适从方向：断定表达了说话人自己相信这个客观现实的责任。至于从客观现实到话语的适从方向则定义了我们所命名的担保类（engageant）[④]。这个担保类集合了由说话人对未来的交流所做的担保（承诺

---

① 通过在这个语境中使用“客观现实”（monde）这个词，我们重提了塞尔有关“到客观现实的适从方向”的问题架构。然而，塞尔只接纳这么一个客观现实——既定的假设的实在性，但是我们的分析将引领我们：（1）通过区分共同的外部客观现实、说话人的内在客观现实（cf. 表达类）、听话人的内在客观现实（cf. 状态类：“Jean 很伤心”）来增加客观现实的数量；（2）从根本上摒弃塞尔和范德维克的再现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借助于逻辑语义来归纳：不同的客观现实应各自构成互动和交流的特征性进程的结果。

② 就像塞尔指出的那样，制度特点不参加“和语言自身相关的宣告，例如当人们说‘我定义’、‘我省略’、‘我命名’、‘我称呼’或‘我的意思是’时”，cf. *Sens et expression*, p. 58. 我们认为，这就表明这些“宣告”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元话语（更确切地说，就是阐述类）。标准逻辑上对它们的定义却拥有宣告的范畴，它假设了对逻辑人的团体所接纳的约定的遵守。但是，就像弗雷格所强调的，它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涵义等同：“不肯定关于客观现实的主体的任何内容”，也更不能引起和外部客观现实的交流。cf. 1920 年 4 月 3 日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因此，这应该是元话语，和所有元逻辑的陈述一样。

③ Cf. Pierre Bourdieu,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chap. Ⅱ, 1:《Le langage autorisé :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efficacité du discours rituel》, p. 103－119.

④ 范德维克也使用过“担保类”这个说法，他将担保类相似看待为塞尔所提的承诺类，我们在这里所提的担保类是更宽泛涵义上的，cf. *Les actes de discours*, chap. Ⅵ, 2, p. 175.

类，promissif）或听话人对未来的交流所做的担保（指令类，directif）一起构成的所有互动[①]。

然而，无适从方向因为没有直接的语用关系，所以在这里被摒弃了。如果话语和客观现实没有关系，话语行为就丧失了它所有的涵义、所有的最终目的。在我们的行为研究方法中，我们不能够设想一个不以交流为目的的互动。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表达类（expressif）并没有被取消资格，而是构成了断言类的子类。

相反，我们将赋予非从客观现实到客观现实这种可能的自反逻辑以语用学含义。因为从客观现实到客观现实，这种自反逻辑不能够从属于话语沟通，但从话语到话语可以。作为互动，话语行为能够将行为本身作为交流目的。对于实际对话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去除模糊性我们经常会定义一些我们所使用的词语，例如，“关于这个词‘……’，我想说的是……”，又或者，为了使我们的句子明晰或是为了减轻回忆的努力，我们经常会评论自己的话语互动：“我刚才指出的是……”[②] 自此，元话语（métadiscursif）行为就有了重要的地位，它调整了互动[③]。元话语的能力以及对话体功能都是人类言语活动特有的基本特点[④]。

因此，在六种逻辑上可能的适从方向（双向的、从话语到客观现实、从客观现实到话语、从话语到话语、从客观现实到客观现实、无适从方向）中，我

---

① 塞尔指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指令类和承诺类）属于同一个类别，那么分类可以变得更简明。”（*Sens et expression*, p. 54.）为此，我们只要将分类标准区分开，通过以纯粹恰当的方法不让交流的主体是听话人或说话人这个事情介入到适从标准中，就可以建立起同一个类别。

② 达斯卡（Marcelo Dascal）和卡却（Tamar Katriel）定位了“正确的（corrective）或清晰的（clarificatory）话语行为”，将“元语言的或元会话的功能”赋予它们，cf. *Digressions : A Study in Conversational Coherence*.

③ 塞尔提及过“这些表达是用来使陈述过程和其他的陈述过程、周边的语境发生关系”，但是塞尔把它们作为了断定类的一个子分类，cf. *Sens et expressions*, p. 44, 50, 52. 让人奇怪的是，他正确地强调了它们句法的特征性，但是又总结为：“但是，这个实在的句法不同并不能就此标记语义的不同，而语义的不同对于证明不同类别的构成相当重要。”op. *cit.*, p. 66. 我们的行为研究方法表明了与句法甚至是语义（既然明显有对指称关系的修改）直接相关的这种区分在语用上的必要性。

④ Cf. Ė. Benveniste, *Communication animale et langage humain*, in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 61. 塞尔忽略了元话语范畴，这来源于塔斯基（Tarski）主义对于反对“语义上封闭的”言语活动的怀疑。反身性在逻辑言语活动中自罗素起就被禁止，cf.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 41—43, p. 271—305，但却构成了自然言语活动的交谈运用中的宝贵王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hap. XI, p. 217—218 中，雅各布逊（R. Jakobson）给了元言语功能一席之地。同样，哈里斯（Z. Harris）给予了“我说”“我问”“我希望”这类的元算子（métaopérateur）重要的地位，他研究了它们的简化句法过程，但是并没有涉及它们的语用功能，cf. *A Grammar of English 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们只排除了最后两种，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语用关系。

如果我们根据“行为力”（puissance actionnelle）来给话语行为排序，也就是说根据它们在改造外部客观现实中的牵连度来给话语行为排序，元话语的度就为零，行为自反地化为话语；而宣告类则标志着最高点，话语神奇地变成了行为。断言类和担保类占据了居中的位置。我们最后可以注意到，在这里互动范畴和交流范畴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基础上为分类提供了划定界限的标准：因为只有四种情况在语用学上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只能承认话语行为的四种主要类型。

（3）第三条标准将通过引入说的施动者和所说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新的细分。

在宣告类的情况中，说的施动者总是说话人。这一点可以在这个鲜活的形式中得到明确的表达：“我开庭了”（J'ouvre la séance）；或是通过这样的表达来阐明：“我宣布开庭了”（Je déclare la séance ouverte）[①]。一般情况下，说话人和通过被动态来表达的所说的主体是不同的，如“开庭”（La séance est ouverte）[②]。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中，当施动者放弃委托给他的权力时，例如“我辞职了”“我弃权”，施动者和所说的主体才能是一个人。

关于担保类。第三条标准解释了塞尔专门提出的指令类和承诺类之间的判别。指令类中，所说的主体是听话人，而不是说话人这个说的施动者，例如“您去开门”；而承诺类中，所说的主体就是说话人这个说的施动者，例如“我去开门”。

同样的标准也可以区分断言类中的表述类（constatif）和描述类（descriptif）。表述类描写了客观现实的一个事实，它可以包含听话人或第三者，在表述类中说的施动者不是所说的主体，例如“门是开着的”“他开了门”；而在描述类中，断定的是说话人自己的行为，施动者和主体混在了一起：

---

①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法语中动词“déclarer”（宣布）授权了双重用法：（1）是元话语的强调形式，例如：“我宣布，民主是最差的统治形式，但除了所有其他的。”（“Je declare que la démocratie est la pire forme de gouvernement *à* L'exception de tous les autres.”译者注：此为丘吉尔的名言，实际上丘吉尔是为了说明民主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政体，虽然还有其缺陷。）坚决主张，即表态，是设置在话语互动之上的，其客体是通过补语从句来表达的一个事实。（2）是宣告类的强调形式，例如“我宣布开战”（“Je déclare la guerre”）。表达力在这里也设置在言语互动之上，它显示出交流的社会性特点和委托给说话人的权力，但是，它的客体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实，而是言语互动“在制度上”所产生的非言语交流。

② 在这里必须要进一步地分析，“主体”事实上有着互动的客体地位：法庭不能够自己开庭。这里就显示出了宣告类的独特性。

“我打开了门”。

第三条标准还能在元话语中做出明确的区分：落在话语元素本身或听话人的介入内容上的元话语叫做引用类（citatif）；涉及说话人话语介入的元话语，这时交流的主体和互动的施动者是一致的。在第二种情形中，我们重新看到了最初由奥斯汀所定义的阐述类（expositif）：奥斯汀把它定义为“使话语的使用和指称变得清晰……使沟通变得清楚明白”[①]。

（4）第四条标准可以用来考虑一个新的判别。这次，这个判别是和交流内容相关的，所依据的是交流内容是动作还是状态。

这个标准对于宣告类来说是中性的，因为根据定义，宣告类是介入了一个正在做的动作，不存在任何的状态。

相反，有关交流方面的判别却将指令类一分为二：一部分指令类强加一个动作给他人，另一部分指令类要求一个精神状态的更改。这是和语用直接相关的，因为，为了从他人那里获得一个针对客观现实的动作，人们经常让他分享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分享意愿和价值观。对命令的服从必须要先经历对任意一个顺从形式的接受，这个形式通过话语互动明确地或暗含地质疑了相反的精神状态。我们可以来想一下，一位上了战场的士兵服从于这么一个命令——“进攻”。做了适当修正后，相似的一分为二也适用于承诺类——“我会注意的”，涉及的是一个态度、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动作。

同样的判别也存在于断言类的情况中，对表述类来说，对事物状态的陈述不同于对动作的陈述。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状态类（statif）（例如“门是开着的”）和变格类（factif）（例如“门被打开了”）。对于描述类来说，如果交流描述了一个动作，一般来说也就是说话人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就接触到了行为类（comportatif）：“我开了门。”[②] 相反，如果描述类涉及的是说话人的精神状态，我们就接触到了表达类（expressif）。我们顺便提一下在塞尔对于表达类的言外目的的定义中出现的精神状态所针对的客体：“在真诚的条件下对于命题内容中的特定事物的状态表达一个特定的心理状态。”[③] 其实这个客体是次要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事实证明这一点，一些表达类并不涉及特定的

---

① Cf. *Quand dire, c'est faire*, p. 162－163.

② 这里和奥斯汀所说的并不一样。我们将状态/动作对立起来，这相对于相关的“动作”类型来说仍然是中性的——对“体”的分析，例如，可以区分结果过程和非结果过程，cf. M. C. Gallo & J. Rounault, *Schémas d'action et types de procès*.

③ *Sens et expression*, chap. 1, p. 54.

外部客体，例如："我很伤心。"[①]

为了避免困难，我们可以依据语法直觉选择这样说：表达类有客体，就是主体的精神状态。因为说话人的精神状态包含了他的"内部世界"，可以肯定地说，作为断言类的子项，表达类不再构成例外，它拥有真实条件和满意条件，这个真实条件和满意条件是由说话人所提出的描述和说话人的实际状态之间的相符性来定义的。但是，这意味着说话人的"内部世界"构成了一个自主的实在性，它可以直接由对话双方分别来理解。由于我们否认了所有的再现研究方法，所以我们没有采纳真实性的标准，而是采纳了诚实性（véracité）的标准，这个标准可以根据面对听话人时说话人对行动担保的遵守来评价（cf. *infra*. chap. IV）[②]。

至于元话语，阐述类必须要介入说话人的话语互动，而引言类则可以描述一个话语的状态，例如"'办公室的门'是一个限定描述"，或是重新考虑听话人的互动，例如"你没有通过'限定描述'明确你听到了什么"。

根据我们对于所有行为的施动者的生成定义，我们可以考虑按照描述类所涉及的认知状态（相信或是认识）、意志状态（愿望和意愿）或是评价状态（欣赏或批评）甚至是情感状态（快乐或痛苦）[③]，来提炼出表达类的子项。我们还可以思忖一下，除了根据定义指的是纯话语状态的元话语之外，在前面谈过的其他子项中是不是也都含有这样的状态。例如，"我向你们推荐这部电影"这句话是一个评价指令类，"您应该知道这件事情"这句话是一个认知指令类，"为了赢得比赛，首先必须要有想赢的念头"这句话是一个意志指令类。

四、分类的探索价值和局限性

虽然说我们的分类在广度上是完整的，并且不再认同话语行为的四种基本类型，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我们的分类在深度上仍然是开放的。这种树状开放性

---

① 在这个情况中，状态并不是塞尔所说的"意向的"（intentionel），cf. *L'intentionalité*, chap. 1, p. 16，在书中塞尔给出了"担忧、沮丧、兴奋的传播形式"作为例子。在其他情况中，状态可以建立在物体之上——"我喜欢蓝颜色"，或者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我讨厌现在下雨"，或者建立在一个动作或一个精神状态之上——"我希望你成功"。

② 为了简单一些，我们在这里所称的说话人的"内部世界"（monde intérieur）不拥有固有的、"在肯定命题之前的"（antéprédicatif）实在性，它自反地来自于互动和交流的社会进程，cf. Wittgenstein,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256 sq., 580："一个'内部过程'需要外部的标准"；cf. Bouveresse, *La parole malheureuse*.

③ 塞尔在真诚性条件中顺便提及过"快乐"（le plaisir），*Sens et expression*, p. 43，或者"对于说话人和听话人来说好或坏的内容"，p. 49，但是塞尔没有开发这个价值论（axiologique）范畴，它在真正的行为研究方法中是很重要的。

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继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之后所有强调自然语言复杂性的观点。我们需要害怕这种组合型探索吗？不，因为深度上的扩展不是通过纯经验论方式完成的，而是根据指导建立分类的理论来完成的，换句话说就是根据我们的语用学研究方法来完成的。就像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分类只具有一个探索性价值：它可以将所有可能的话语行为理出头绪来。但是它既不能够成为分析的出发点，也不能够成为终点。它的标准明确考虑了所有话语行为具有的互动和交流的双重范畴，但在深度上仍然可以继续就每一个范畴进行分析。作为总结，我们简单地用几句话来指出怎样继续对这两个范畴进行分析。

（1）在交流的范畴中，所有的话语行为都是从属于一般行为理论的。一般行为理论详细说明了各种条件，所涉及的有行为的触发（déclenchement）、行为的实体（corps）、行为预期的效果，并在规划的一般策略中再次引入了交流。在这里，我们不讨论细节了，只是说明一下行为框架可以怎样重新解释塞尔和范德维克的分析。

塞尔提出的准备条件和真诚条件毫无疑问是触发条件的一部分。它们明确了交流主体的精神状态①和对行为的约束。例如，指令类要求说话人是希望完成一个交流的，并且相信听话人有能力完成这个交流。

塞尔提出的关于命题内容的条件，事实上从属于行为实体的条件，特别是互动发生时相对交流的“时间”。宣告类必须要即刻起效；担保类涉及的是未来的交流，而不是已实现的。当然，交流的时间不总是和动词的时态混在一起。因此用现在时命令式所陈述的指令类担保的是听话人未来的行为。也有用将来时的命令，例如“你不能杀人”。对于断言类来说，情况要更复杂一些：表述类和表达类可以用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而行为类则不能接受将来时。至于元话语，表动作的阐述类和引用类接受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而表状态的引用类则只能用现在时，这个现在时就和数学“2 加 2 等于 4”中的现在时一样是一个永恒的现在时。

至于范德维克所提出的目的完成模式②，则从属于预期结果条件，预期结果条件明确指出了交流的模态和关于交流主体的约束。例如，说话人期待听话人满足他的要求，但又不强迫听话人。相反，则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服从他的命令。

---

① 在这里，力度（le degré de puissance）也介入了进来，塞尔和范德维克定义了它，“我请您关门”是不同于“关门”的，cf. *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ary Logic*, p. 98.

② 目的完成模式确定了其目的的完成方式，cf. Vandeverken, *Les actes de discours*, chap. IV, § ii, p. 113—115.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满意条件上。只有听话人根据命令有效地实现了所提出的交流，命令才被满足[1]。

我们在这里明白了科恩（Cohen）、阿伦（Allen）和佩劳特（Perrault）在哪些方面正确地强调了话语行为从属于一般行为逻辑这个事实。而奥斯汀的继承者们却大多忽略了一般行为逻辑[2]。但是，由于话语互动这个固有特征性，话语行为也不能完全简化为行为逻辑。

（2）再来谈谈互动范畴。成功条件（les conditions de succès）依赖于互动范畴。要服从一个命令，听话人首先要原样理解它、接受它。但是，就像塞尔所说的那样，成功条件完全不考虑这么一个关键的事实：话语行为是交谈策略，也就是对话体策略的要素[3]。高级秩序的对话体约束是必不可少的，而话语行为的分类却没有涉及这一点。作为交谈策略的要素，话语行为固有的对话体功能应该被提出来。因此，断定能不能根据相关对话类型，根据它在对话体进程中的位置，根据它是由对话双方中的哪一方说出的，从而行使不同的对话体功能？在基本的信息性对话中（cf. *infra*, chap. VI），由回答者发出的断定具有回答（réponse）问题的正值[4]，或是接话（réplique）的评论值[5]，甚至是质疑（mise en cause）的负值。例如，如果请求者通过问题“几点了”开启一段交谈，回答可以是“中午 12 点”，接话可以是“我不明白你在问什

---

① 在言外逻辑中，满意条件不只是真实性条件的延伸。真实性条件总是被设想为和客观现实的相符关系。因此，它们仍然是再现主义概念化的分支。真实性和满意应该根据语用而被重新定义。我们已经用表达类给出了一个例子，我们会在断定类上再回顾这一点，cf. *infra*, chap. IV.

② Cf. P. R. Cohen & C. R. Perrault, *Elements of a Plan-Based Theory of Speech Acts*.

③ “传统的言语行为理论主要是局限于单一的言语行为”，cf. *Conversation*, p. 7，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会话现象不可分析。我们赞同达斯卡（Marcelo Dascal）对此的反驳，他强调“会话结构的语用特点以及……对言语行为的类似说明的必要性”，cf. *The Pragmatic Structure of Conversation*, p. 49.

④ 弗雷格正确地看到了在语用上断定具有回答问题的值，cf. *La négation*, p. 195.

⑤ 译者注：接话应该是请求者发出的。

么"[①]，质疑可以是"管它几点"。自此，撇开对话体功能不谈的话语行为就只是分析时的一个抽象概念。所有的问题都在于在既定的互动和交流策略中确定话语行为的对话体功能。

这里所提出的分类肯定不是唯一的可能分类。所有的分类法都只是从现象中所获得的一种视角，只有在所采纳的观点下才具有价值。但是，摆脱了再现主义和独白体偏见的行为研究方法，似乎可以使话语行为分类变得更简单、更紧凑，同时，行为研究方法也赋予话语行为分类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分析言语互动，分析与他人的、针对客观现实的交流。

---

① 译者注："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这句话根据在对话体进程中所占位置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对话体功能。在这里我们提出两种解释：第一，如果这句话是由请求者发出的，那么它具有的对话体功能应该是对呈请的不理解或拒绝，即"疑问"（mises en question），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你在问什么?"，因此具有询问的言外价值。举个对话例子："——几点了？（请求者）；——你有什么事？（回答者）；——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请求者）"。第二，如果这句话是由回答者发出的，那么它具有的对话体功能应该是向请求者提问以获得确认、重复、更明确的表达，即"呈请"（requête），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你在问什么?"，因此也具有询问的言外价值。举个对话例子："——几点了？（请求者）；——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回答者）"。综上所述，原文中"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这句话事实上是不能被理解为接话的。我们在这里换一个接话的例子："——几点了？（请求者）；——你有什么事？（回答者）；——我饿了（请求者）"，最后这一句才是标准的接话。Cf. *infra*, chap. VI, § 2.

第四章　对断定的重新语用评估

“话说给人听都是为了掩盖其想法。”
——塔列兰（Talleyrand）
引自《红与黑》（司汤达）

传统上，逻辑学是以肯定类命题为基本研究客体的，这种命题是由可以为真或为假的宣告类陈述所表达的，例如“2+2=4”“下雨了”等等。弗雷格是第一个用断定力的观念来描述说话人对于判断真实性所做的担保的人（cf. *supra*，chap. Ⅱ）。从此，用话语行为理论在所有的断言中区分出命题内容 p 和相应断定的言外之力 $\vdash p$ 就成了通常的做法[①]。相对于其他的言外之力，如承诺类、指令类等等，断定力似乎是最简单的，因此，对断言的分析似乎是轻而易举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断定概念的逻辑学根源，那么我们仍将局限地对言语活动和话语运用进行非常狭隘地语义感知和逻辑感知。描述断定的特点就必须要定义真实性（vérité）和相信（croyance）。追随逻辑学的传统，不管愿意与否，都将导致我们重蹈言语活动的再现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断定是以描述客观现实为基本目标的，还将导致我们用“物对知的适合”（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这个相符主义观点来感知真实性[②]，并最终导致我们继续狭隘地独白体分析，在这个范围内，断定的基本目的就成了表达说话人的相信。

① Cf. John Searle，*Sens et expression*，chap. 1，p. 39，52.

② 真实性的相符主义定义是罗素在 *Les problèmes de philosophie*，chap. 12，p. 151－152/153 中再次明确使用的：“虽然奥赛罗错误地相信了苔丝狄蒙娜爱着凯西奥，但是人们不会找到复杂项的单位（unité complexe）‘苔丝狄蒙娜对凯西奥的爱’……只有‘事实符合相信’，这个复杂项的单位才会被说出。”再现主义的观点还被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中再次证实，证实的方式非常极端，因为所有从再现到再现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元语言都被排除了：真正的命题只能是客观现实中某个事实的“像”（image）。

我们认为，要超越过去所做的预设，就必须彻底地接受语用学视角，它能够提供一个总的研究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对词汇、句义和语义的分析才会有涵义和最终目的。为了提供这样一个框架，语用学应该被理解为一般行为理论①。我们也建议将互动层次和交流层次结合起来。互动，从言语活动来看，是一个拥有特征性的沟通过程，但它绝不是自主的：行为的最终目的直接依赖于非言语交流，非言语交流调节着对话双方的关系，对话双方作为施动者在心理上、社会性上被确定，在对于客观现实的行为策略（stratégie）中被担保。

再次审视断定将使我们能够以真实（véridicité）这个非相符主义观点来重新定义真实性（vérité），还可以使我们将相信（croyance）非独白体的感知为说话人面对听话人的诚实（véracité）。为了检验定义的恰当性，我们建议：

1. 将谎言描述为真实和诚实断言在语用学上的替代物（alternative）。

2. 以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为例来分析断言和谎言的不同式样，以及它们在不间断交互中的对话体功能。

据此，在真实和诚实的双重范畴中断定的复杂性，以及它的替代物谎言的复杂性，构成了进行语用研究的必要性，只有语用研究才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互动功能和交流的最终目的。

一、真实性、真实和客观现实的像

显然，断定和真实性相关。我们很想在断定中发现真实性的特征。如果说“门是关着的”担保了信息的真实性，那么“关上门”“门是关着的吗?”或者“我去关门”等命题则要求听话人或说话人有所动作。我们可以用断言类的言外目的来定义断定的言外之力——“说出这些事物是怎样的”②，明确指出断定的满意条件（condition de satisfaction）依赖于从话语到客观现实的适从方向：只要“它的命题内容正确再现了这些事物在客观现实中是怎样的”，那么这个断定行为就是令人满意的③。

如果只停留在这里，我们就会继续危险地局限于奥斯汀最终抛弃了的逻辑

---

① 关于“语用学”这个词的历史，cf. *Supplément au 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A. Lalande, p. 1269－1271。在 *La fondation de la métaphysique future*, 2e section 中，康德（Kant）区分了属于艺术的“技术命令”，属于舒适（bien-être）的“语用（pragmatique）命令”，和属于道德范畴的“实践或道德命令”（p. 91）。语用不涉及道德，“动作不是绝对受控的，它只是为了其他目的而采用的方式”，p. 90。在 *L'Anthropologie d'un point de vue pragmatique* 的前言中，康德将“认识客观现实”和“对客观现实的使用”对立了起来，p. 11。

② Cf. Daniel Vanderveken,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22.

③ Cf. *ibid.*, p. 134.

简化中。事实上，我们需要回忆一下，奥斯汀曾明确表示他最终放弃了表述句和施为句之间初始的、纯探索性质的分类，他强调表述句和其他行为一样，可以是令人满意的或是不满意的，反之亦然。施为句预设了与事实的关系，这使得真实性介入了进来①。塞尔和范德维克认为，满意条件适用于所有的行为类型，这解释了对于表述句和施为句之间最初二分法的超越。但是，当他们将满意条件定义为真实性条件的普遍化时，他们事实上是将最初保留给表述句的特点推及到了所有的话语行为。

然而，很明显，奥斯汀勾勒出的对待真实性的方式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奥斯汀将真实性定义为众多评估模式中的一种，类似支配其他所有话语类型的评估模式。就像我们可以用真值和假值来评估断言一样，我们也可以用真值和假值来评估对或错的判断、用有理由或无理由来评估表扬、用恰当或不恰当来评估提醒、用正确或不正确来评估论证等等："但是您立刻会自问：真值和假值的问题真的那么客观吗？我们要问：'这是一个理性的肯定吗？'；我们'肯定或说'和我们实施例如论证、提醒、判断等施动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否一样呢？……在日常生活中，和逻辑理论中所预期的状况正好相反，对于表述句是真是假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并不总是行得通的。"② 对于断定理性与否的疑问将使得我们摒弃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观点：这个逻辑观点不把真实性赋予行为，而是赋予命题本身，即命题的内容，也就是说它只考虑行为的言内方面。这就是表述类初始定义的错误之处："肯定的真值和假值不依赖于单纯的字面意义，而应是取决于具体的行为和执行这个行为时所处的具体环境。"③

自此，我们可以认为真实性是评估断定行为的言外方面的一种模式，其他模式也是如此。这将使我们抛弃与语用约束毫不相干的狭隘的语义学观点。断定"法国是六边形的""在一定的观点中，在一定的意愿中"是真的。"一个身居显位的将军可能会这么认为，但是一个地理学家就不会认为其是真的了。"

---

① Cf. *Quand dire, c'est faire*, XIe Conférence, p. 139—143. 和命令、承诺等一样，做出断定的说话人应该是处于做这个断定的位置："你不可以断定，现在有多少人在隔壁的房间内。"反之，警告"当心，公牛冲过来了"假设了公牛正要冲锋这个事实。

② *Ibid.*, p. 146.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

③ *Ibid.*, p. 148.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Cf. *La vérité*, in *Écrits philosophiques*, 奥斯汀曾经强调过，真实性建立在断定上（很小心地和句子区分开）——"断定是一个既定的人在既定的形势中所发出的"，cf. p. 95。然而，在 *Austin on Locutionary and Illocutionary Acts*, p. 77，塞尔却反对奥斯汀的观点——"这是他真实性理论中最严重的错误之一"，p. 423，他批评奥斯汀是将陈述行为和陈述客体混淆起来的受害者。奥斯汀所做分析的所有创新都被抛弃了！

除了说话人的地位，陈述的语境也很重要："看一个表述句'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赢得了阿尔马河（Alma）的战斗'，这个表述句会让你想起这是一个纯粹士兵之间的战斗（这很少见!），也会让你想起拉格伦勋爵的命令事实上在战斗中并没有传达到他的某些部下那里。在这些条件下，拉格伦勋爵是不是赢得了阿尔马河的战斗呢，是？还是不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也许在学校的教科书里，用一个肯定来回答当然是合情合理的。……这句话的夸大适合一定的语境，但不适合其他的语境；在这里纠结于它的真值或假值是毫无意义的。"①同样，断言"所有的白鹅都迁徙到了拉布拉多（Labrador)"② 自身并不能陈述一个真实性，它只是表达了对话双方所分享的部分认识："只要对话双方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分歧的，我们就不能只认为断定的真实性取决于事实本身。"③

问题不在于知道断定的命题内容是不是真的，自身是不是符合存在的事实，而是在于知道说话人鉴于交谈情形是否有理由实施断定行为："问题出在想知道您是否有理由肯定、提醒或建议；不是想知道说的内容是否恰当，而是想知道鉴于事实、您对事实的认识和您的说话目的是否合适说。"④行为本身的语用关联与此直接相关。

奥斯汀抛开了所有理论化和形式化的约束，从而避免了重蹈坚持维护关于真实性的纯语义学和逻辑学观点的覆辙，那种观点是"描述性幻觉"的最大化身。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认为语用学的真实性就是真实（véridicité)，它不是命题内容的评估标准，而是整个行为的评估标准，更确切地说，是互动行为的评估标准，也就是对拥有沟通互动功能和交流最终目的的行为的评估标准。因此，目标在于通过向听话人提供一种我们认为听话人所不拥有的相信(croyance）从而改变听话人的信念状态。塞尔曾顺带提过："p 对于 L（说话

---

① *Quand dire, c'est faire*, p. 147.

② 译者注：拉布拉多（Labrador)，加拿大东北部的一个沿海地区。

③ *Ibid*. 比照一下范德维克鲜明的实在论态度——"断定……可以是真的，和有没有人做出这个断定无关"，*On the Unif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and Formal Sematics*, p. 199.

④ *Ibid.*, p. 148. 我们强调这一点。在中国古老的逻辑学中，问题不在于知道一个命题是不是真的，而是要知道它是不是"可"，也就是说是不是恰当，在确定的语境中是否合适表达，cf. C. 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我们可以在奥斯汀 1950 年的文章 *La vérité* 中找到对于真实性及相符的批判性讨论，他首先讨论了"事实"这个概念（在重新评估相符概念之前)："'事实'只是用来说出'真值肯定'（dire 'affirmation vrai'）的一个其他表达；我们注意到，当一个侦探说：'我们来看看事实'，他并没有去趴在地上，而是开始陈述一系列的肯定；有人甚至讨论了'建立事实'。" p. 99.

人）或 A（听众）来说并不是太显而易见的。"[①]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扩展这句话，这相当于承认了：在针对问题的、共有的预设和知识的基础之上，对于相信的表达只有面对对方时才有价值。弗雷格已经强调过断定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明确指出，断定是一个命题，回答对话双方之间的相关问题。面对问题，面对对话双方所提出的实际问题[②]，说话人开启了一个可能被听话人接受或不接受的命题。认知的关键在于说话人总是在捍卫自己的观点，直至听话人同意其命题。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对话的，我们所彼此确信的，通过相关言语游戏的固有约束（例如，在争论中特有的辩论策略就介入其中）调节成一致，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真实的。

"真实"来源于对话双方在互动和交流进程中的一致性："人们'说'的是真是假是在言语活动中达成一致的，这里指的不是观点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formes de vie）的一致。"[③]

关于真实性的语用学观点使得所有相符主义（correspondantiste）的定义都失效了。怎样才能在话语范畴的内容和非话语的现实之间进行比较并建立相符呢？弗雷格在 1918 年就明确指出，相符性假设的是两种本质相同的项之间存在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假设相符性在再现和现实之间起作用，那么这种假设本身就不可能（cf. *supra*, chap. I §3）。话语不符合现实也不再现现实。现在是时候抛弃相符主义的预设了。

真实性决不存在于自身，同样实在性也不是直接、立刻就给出的，它存在于断定之后。客观现实只有作为被接纳的、互动和交流组成的真实性总和才是可知的。更准确些说，根据所涉及的互动类型，需要不同的所指称的客观现实。如果存在客观现实，那么客观现实一定是多样的，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构成了社会性互动和交流所产生的"结构"（constructions）。

结构可以是明示的，就像科学所建立的客观现实或哲学家的世界观那样。结构也可以保持为暗含，就像普通涵义上的客观现实那样，这种结构来源于缓慢的文明进程，语言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④]。因此断定的所说（le dit）拥有的真实不可能是相符，而是陈述行为和话语结构之间的一致，是以

---

① Cf. *Les actes de langage*, p. 201；*Sens et expression*, chap. 3 § II："所表达命题的真实性对于陈述语境中的说话人或者听话人来说都不是显而易见的。" p. 105.

② 关于信息性的问题，我们将讨论引导对话的"任务"，cf. *infra*, chap. VI.

③ Cf. Wittgenstein,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241, p. 210，翻译后有修改。

④ 人工智能的目标之一就是根据"朴素物理"、定性物理（相对于理论物理、数学物理、定量物理）明示普通涵义上的客观现实。

暂时的一致同意为目标的[①]。这种真实依赖于“确实性”(certitude)基础，而确实性的基础则组成了“客观现实的像”(image du monde)。维特根斯坦将客观现实的像定义为：“我所继承的是背景(arrière-plan)，在这个背景的基础上，我区分出真和假。”[②] 当对话双方在断定的真实上无法达成一致时，他们总是会借助于“第三方”(其他人、字典、百科全书等)，借助于一个权威，这个权威提供一种可以为他们做评判的确实性。

被接纳的确实性和客观现实的像绝不是来源于纯粹的言语活动的过程和纯粹的认知的过程，而是通过对行为模态(modalité d'action)的自发采纳而显现出来的，行为模态是根据“生活形式”有机构成的：“词，处于言语游戏中最底层的行为。”[③] 因此，可以根据基本确实性来衡量在沟通互动中产生的陈述行为的真实，而基本的确实性从属于最终由历史确定的交流过程。

自此，断定构成了一个对于问题的自认为真实的回答，这个问题是和一个客观现实状态相关联的，在这个客观现实状态中，对话双方应该共享和比较他们各自的期待、目标和行为策略。

我们首先重新定义了真实性，从此以后，我们就能够描述相信(croyance)在断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而研究话语行为的标准方式，即独白主义(monologisme)将更加受到质疑。

二、相信、诚实和行为

除了对打赌或婚姻仪式的论述之外[④]，奥斯汀所建立的分析仍然是独白体的，它建立在只指称到说话人的孤立行为之上。话语行为理论保留了这个最初的印记。断言的标准定义可以证明这一点，它的准备条件为“说话人有理由相信命题内容的真实性”，它的真诚条件(condition de sincérité)为“说话人相

---

① 拉丁语“veridicus”就真实而言有两个涵义：(1)说真话；(2)所说的为真。我们的阐释调和了这两种涵义：真实(véridicité)建立在说话人“所说”之上，从属于对话双方达成的一致——对话双方鉴于他们所分享的确实性背景而同意承认话语的内容。我们注意到，诚实(véracité)在拉丁语中被翻译为“veriloquium”或“veriverbium”，这里涉及说话人的“说”，也就是他对言语的运用(*loquor*=parler)，为的是表达(*verbium*=mot，expression)他的相信。

② *De la certitude*，§ 94，这里有塞尔所提“背景”的根源。塞尔认为，背景是“先于再现的”(préreprésentationnel)，以对立的方式在“网络上”(réseaux)展开，cf. *L'intentionalité*，chap. 5. 因为塞尔发展了关于涵义的严格再现的概念，我们就很难看到塞尔是怎样利用这个背景了。如果我们对涵义、相信等等采纳了行为概念，那么缺陷就会消失。关于塞尔所提背景(background)概念中的模糊性，cf. Barry Stroud，*The Background of Thought*.

③ *De la certitude*，§ 204.

④ Cf. *Quand dire，c'est faire*，Ⅲ^e Conférence，p. 65.

信命题内容”[1]，在这里我们只看到说话人介入其中。

最好反过来设想一下，断定决不仅仅是说话人独白体地表达相信，断定，就像所有的话语行为一样，主要通过沟通和互动的范畴来表现特征，就像皮尔斯指出的那样，断定是面对听话人的担保，是以分享相信为目的的[2]。

分享相信的努力，假设了一种说话人面对听话人的担保，听话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更一般地说，他还是一个人。关键之处不仅在于包含了信息表达和信息交换的互动，而且在于需要人际关系的交流。就像词源学证实的那样，“相信”（croyance）这个词是建立在“信任”（confiance）这个词之上的，就像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的那样，说服（persuasion）依赖于说话人的“精神特质”（éthos）、依赖于说话人通过话语使自己值得信赖的能力[3]。所有的断定行为都建立在“信用条约”（pacte fiduciaire）之上：说话人面对听话人时担保自己说的诚实，反过来，听话人给予说话人的“说”以相信（créance）和信赖（foi）[4]。

然而不能够认为这种条约只包含对话双方。条约还涉及一个物质上不出现但却扮演关键角色的第三方（tiers）：对话双方从属的团体。听话人给予说话人的说以信任是因为说话人的声誉（réputation），也就是说，说话人通过以往的诚实所积累的信任资本。反之亦然，说话人面对听话人所做的诚实担保也介入了说话人未来的形象、未来的声誉[5]。根据说话人过去的表现，听话人就未

---

① Cf. Daniel Vanderveken,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127.

② Cf. 皮尔斯强调断定中说话人对于听话人的责任，cf. Jarret E. Brock, *An introduction to Peirce's Theory of Speech Acts*.

③ Cf. *La rhétorique*, liv, I, chap. 2, 1356 a.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赛罗通过语言的魔力吸引了苔丝狄蒙娜——关于他战功的故事，cf. 第一幕第三场，伊阿古通过他的话语来向奥赛罗展示他的老实，而却在别处承认“我并不是我所说的那个我”，cf. 第一幕第一场。因此，精神特质（éthos）和实际的道德并不相关。就如勃拉班修所说：“话仅仅是话而已。”cf. 第一幕第三场。

④ 拉丁语“credere”的第一个意思是将某样东西托付、借给某人，第二个意思是信任某人，第三个意思是相信某人。同样，拉丁语“fide”的意思是信任和相信。奥赛罗唯一的错误就在于将信任给予了伊阿古：“人们怎样使轻信的人踏入陷阱。”cf. 第四幕第一场。在 *La vérité* 中，奥斯汀顺带指出过：“相信他人，接受他们的证明，这就是会话的基本意图，或者说是会话的主要意图之一。”p. 53, *ibid.*, p. 190. 我们发现，格雷马斯（Greimas）从符号学的视角分析了信用合同，cf. *Du sens* Ⅱ, Le contrat de véridiction, p. 103－113.

⑤ 所有的断定都包含了誓言的形式，它不建立在由所说表达出的未来行为之上，就如同承诺的情况，而是建立在“说”本身的诚实之上。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当皮尔斯将断定与具有担保效力、会追究签名人责任的书面证词、公证书进行比较的时候，他很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cf. Christiane Chauviré, *Peirce et la signification*, chap. 4, §《Pragmatique de L'assertion》, p. 142－152; Claudine Tiercelin, *La pensée-signe*, chap. 5, p. 280－306.

来打赌，他为说话人的说“增加了信用”，至于说话人，为了将来他会担保其以往的信任资本。可能取消说话人资格的社会惩罚就这样巩固了信用条约。

当然，这种条约根据对话双方在他们的言语团体内部所占位置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形式。因此，最强烈的信任意味着自下而上的垂直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听话人信任说话人的权威信用（社会的、科学的等等）①。

在解释了支配断定行为的信任条约之后，还需要确定听话人用来评估说话人真诚性的标准：评价说话人的良好信誉是否被窃取。

言外逻辑的真诚条件曾经尝试分析这个问题，然而最终没能解决。原因不仅在于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断定分析狭隘的独白体特点使得分析中缺少了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信用条约，原因还在于这种分析不能够提供任何关于说话人是否真诚的客观标准。假如真诚被定义为说话人对于断定命题内容的相信状态，但因为标准话语行为理论并不考虑对说话人精神状态的客观评估，认为表达类是缺少满意条件的，那么又怎样评估这种真诚性呢？假设说话人 L 断定了 p，如果他是真诚的，那么断言 p 可以表达为他对 p 的相信②。但是，在缺少任何可用来评估相信的表达方式的情况下，又怎样确保这个真诚性呢？

根据旧的观念，表达类是没有适从方向的，为了确定真诚性的评估标准我

---

① 拉丁语“in fidem alicujus venire”的意思是“处于某人的保护之下”。我们区分出，当对话双方拥有相等位置时的水平信任（confiance horizontale），当团体成员之间建立起任意的等级时所产生的自下而上的或自上而下的垂直信任（confiance verticale）。我们注意到，斯铂佰（Dan Sperber）在 *The Epidemiology of Beliefs* 中定义了两种类型的相信，即直觉相信（croyances intuitives）和自反相信（croyances réflexives）。直觉相信指对被感知的和/或被推论的事物状态的描述和/或再现。它们是自动的、无意识的或半意识的精神过程的产物。而自反相信则指对事物状态的再现的阐释。这种阐释由理性的论据出发，建立在通过我们承认其权威性的说话人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之上。因为我们不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个信息，所以自反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给予某个信息源以信任的产物。例如，一个孩子之所以相信明天天气好是因为老师和他这么说。因此，在尼日利亚和达荷美（贝宁）的约鲁巴部族（Yoruba）语言中，存在着“mo”和“gbagbo”这两个词的对立，前者用来表示属于个人经验的相信和认识，后者用来表示对道听途说的相信和认识，cf. B. Hallen et J. O. Sodipo, *Knowledge, Belief and Witchcraft*.

② Cf. D. Vanderveken,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157：“肯定一个命题的说话人表达了他对于这个命题的相信。”奥斯汀说得更切中要害：“断定就是让人听到相信。”*Quand dire, c'est faire*, p. 76.

们需要抛弃这种旧观念①。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表达类定义为断言类的子项，以对说话人精神状态的描述为客体（cf. supra，chap. Ⅲ）。按照语法直觉，我们可以主张表达类拥有一个叫作主体精神状态的客体。如果我们承认说话人的精神状态组成了他的“内部客观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表达类不再是个例外，它也拥有真实性条件、满意条件，并且根据提出的表达和说话人实际的相信状态之间的相符性来定义。但是这也假设了说话人的“内部客观现实”组成了一个自主的实在性，对话双方可以直接理解它！然而，事情远非如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担保“内部客观现实”存在着独特性（sui generis），内省的已知条件是靠不住的；另外，从一般规则来看，听话人不一定能理解说话人的“内部客观世界”（除非相信情感同化的认知功效）。

事实上，单纯从语用分析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人们一定指称到说话人固有的精神状态。就“承诺”这种重要情况奥斯汀曾提醒过：“但是我们经常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只有当话语作为内在行为和精神行为的外部可见符号（适当的符号）被说出时，话语才具有可靠性，其作用为保留行为痕迹或告知他人。因此，我们很快就可以进一步说，这将导致不知不觉地相信或假设：在很多情况下外部陈述是对内部事件真或假的描述。……/……不：明确和道德，这两者都站在说话人的立场上：我们的言语就是我们的担保。”②

奥斯汀的这个提醒适用于所有的行为类型，当然也适用于断言类，因此也适用于表达类这个子项。说“下雨了”不一定相信在下雨，因为谎言完全是可能的；说“我真的为您的遭遇感到难过”不一定表达了同情，说话人完全可以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担保是纯社会性的，它在话语中并通过话语产生，并导致了约定性地授予说话人一个精神状态③。规则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尽情使用所有规则！在这层涵义上，根据塞尔的意向主义解释，断定不是说话人“表达相信”，而是一种策略活动：一种企图让听话人相信我们能够或不能够实际

---

① Cf. D. Vanderveken, *Les actes de discours*, p. 135，在这一页上，他承认：“严格来说，这样的行为没有满意条件。”然而，被拘泥住的他却进一步补充说：“然而出于方便，我将继续将满意条件赋予所有形式为 F（p）的基本言外行为类型。当我说：一个表达类的言外行为 F（p）在一个陈述语境中是满意的，那么这只意味着它的命题内容 p 在这个语境中是真的。”p. 135－136. 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达类的命题内容和什么相符，例如“我很伤心”（Je suis triste）。然而塞尔认为这种命题并不是“意向的”，而是类似描述事物状态的命题“我为下雨感到伤心”（Je suis triste qu'il pleuve），不表达说话人的态度。

② *Quand dire, c'est faire*, Ire Conférence, p. 44.

③ Cf. *La vérité*，奥斯汀谈论了“一个语义约定（当然，是暗含的），有关我们使用情形中的词的方式”，p. 32.

相信的东西。

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说话人的“内部客观现实”本身就来源于互动和交流的社会进程，无论如何，它都不能够提供客观的评估标准。我们建议将说话人的行为表现（comportement）作为诚实标准。说话人在断定中的担保就建立在相信之上，相信只有被设想为说话人面对听话人时的行动处置（disposition à agir)，才会有其客观意义。说话人的语言和超语言、互动和交流的行为表现，是提供给听话人的（也可能是提供给说话人自身的）唯一客观的真诚标准。说话人所说的应该和他之前所支持的内容、和他之后所主张的内容保持话语一致（不应该“割裂”），也就是保持和先前行为及未来行为的语用稳定(pragmatiquement consistant)[1]。如同我们不能够在逻辑系统自身内部来评价其稳定性，我们只能借助于说话人的其他话语和超语言行为来评估话语的诚实。

对断定的这种分析最终给出了可操作的真诚标准，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它没有解释断定的最终目的。除非接受思辨（theoria）的幻觉准则——作为对真实性的纯粹沉思，我们不逼迫他人赞同我们的相信，我们只是愿意分享知识！这种分享是达到行为目标的手段。我们为了在改造客观现实的进程中获得他人的帮助、合作而寻求说服他人。所以我们在本节的末尾来谈谈他人的行为表现。伊阿古（Iago）通过罗德利果（Roderigo）通知勃拉班修（Brabantio)，他的女儿不在住所中，为了让这位被冒犯的父亲（勃拉班修）能反过来对付奥赛罗（Othello)。在互动的层面上，断定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只有在交流的层面上、在说话人的策略中断定才获得了涵义，说话人的策略包含了所期待的听话人的行为表现。语用分析再次引入了塞尔所忽略的范畴，语用分析赋予断定一个双重的言后目的：一个是分享相信，一个是最终在他人那里引入一个行为表现。这两个话语行为的言后目的，只有在行为逻辑的范围内才有涵义。

我们可以看到，抛弃独白体的预设将导致抛弃再现主义的假设。断定的关键是交流，它通过行为来表达：将说话人的行为表现作为真诚性标准，将听话人的行为表现看作互动的最终目的。就像所有其他的行为，断定针对的是交流、是行为表现。言语活动的目标不是描述客观现实，而是以对话体的形式组成一个作为对话双方交流场所的客观现实。

---

① 因此，在《奥赛罗》中，罗德利果之所以不信任伊阿古，是“因为你的话和你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相似性”，cf. 第四幕第二场。在话语的论证运用中，人身攻击不在于攻击提出的论题，而在于攻击提出者的说和先前行为的一致性。

三、谎言

罗素曾写过，一个关于真实性的好理论应该解释一下错误（erreur）[1]。同样，关于断定的一个好定义也应该解释一下谎言[2]。然而，只有对断定的语用学感知才能解释谎言的策略价值。

自然，谎言首先假设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信用条约被打破：说谎者的“说”不符合他的相信，说话人是不诚实的。同样，当谎言获得成功时，说话人的“所说”不符合他所知的客观现实状态：侵犯了对真实的要求——分享知识。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里，我们还是不能理解谎言的最终目的。

除了病理的情况外，人们不会为了撒谎而撒谎。撒谎是为了强加给他人以信念和相信，这些信念和相信如我们所愿会引导他人的行为。谎言是断定的对立表示，主要是和他人相关的。在特殊情况下，其他人也可以是说话人自己。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谎言都构成了互动策略，以操纵他人的或说话人自己的行为表现为目的。谎言的交流范畴是明显的：通过人际关系促使一个行为表现。真正的关键不是知道，而是能够。莎士比亚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他让伊阿古这样谈论奥赛罗：“他对我的评价很好，我因此才能对他施加影响。”[3]说话人的权力来自听话人的无知：操纵（manipulation）产生于听话人的无知。只有谎言试图操纵他人时，它才表现出应在精神上、社会上受指责的欺骗性[4]。说话人为了个人的目的，脱离了诚实和真实的契约，还试图单方面地、偷偷摸摸地强加他自己的目的和他个人的行为策略，这一切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断定行为的最终目的确定了其道德价值。

还需要明确断定和谎言之间的关系。先前对谎言的研究证实了对断定定义的必要性。断定结合了说话人面对听话人时所说的诚实和所说的真实。整体概述一下，有四种可能[5]：

---

① *Problèmes de philosophie*, chap. XII, p. 144.

② 当然，人们也能够通过非断定的行为来撒谎，例如，当人们不想信守承诺时，当真诚条件被侵犯时，承诺可以是骗人的。但是，在断定中，谎言的问题就如真实性的问题一样，自己就会出现。

③ 《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

④ 我们回想一下谎言在法律上的传统定义：对他人有害的虚假（mendacium est falsiloquium in praejudicium alterius）。

⑤ 自然，接下来的分析是形式上的，只考虑二元对立真实/非真实、诚实/非诚实。很明显，我们很有力地区分了真实的度（degrés de véridique）以及诚实的度（degrés de véracité），听话人方面由于怀疑，从信任到不信任的态度符合这些度。我们观察到，在我们二元对立的图表中，准确所拥有的两个值——说的值和所说的值——正好和谎言所拥有的相反，错误与谎言失败也是同样的情况。另外，分析是抽象的，它没有介入听话人的反应，它能够增加或减少对说话人行为的信赖。

(1) 当真实和诚实结合在一起时，断定不是错误的，也不是骗人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准确的（exactitude），它的意思就是真实和诚实的双重一致（当然是暂时的）。

(2) 如果说话人的说是诚实的，但他所说的是不真实的，那么说话人就是自己搞错了，他的断言就是错误的（erroné）。

(3) 相反，如果说话人是不诚实的，他所说的也是不真实的，那么说话人就是在向听话人撒谎，在欺骗听话人。

(4) 但是，如果说话人是完全不诚实的，他所说的是他所不相信的，但却是真实的东西，那么谎言就失败了。说话人自己搞错了，还以为在欺骗他人！这是谎言失败的情况[①]。

因此，为了成功地说谎，不仅需要说出和我们所相信的相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要相信真实的东西。成功地撒谎，就是在相信$\neg p$，并且$\neg p$是真实的情况下，我们断定p。

断定行为如表4—1所示。

表4—1 断定行为

说 \ 所说	真实（véridique）	不真实（non véridique）
诚实（vérace）	准确（exact）	错误（erroné）
不诚实（non vérace）	谎言失败（échec du mensonge）	谎言（mensonger）

我们在这里注意到，对谎言的思考不仅要求区分真实性条件（满意条件）和成功条件，而且还把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以往话语行为理论中的独白体研究有两个不足之处：

(1) 把谎言当作有缺陷的断定。结果就是，在对断定的技术分析中，不恰当地引入了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技术上说，谎言只是断定的相反。如果说断定结合了诚实和真实，那么谎言就要求不诚实和不真实。

言语互动一般建立在源自信用条约的真诚性预设之上。这里有格赖斯首推的行为准则："您不去肯定您所相信的，那是错误的。"但是，从语用学的观点

① "无知的人，虽然想要撒谎，但由于不想说事实或是碰巧缺乏认识，有时候说的却是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Platon, *Hippias mineur*, 366 d—367 b, in *Premiers dialogues*, p. 71.

出发，不撒谎绝不是一个绝对命令[①]。沟通游戏和社会游戏使谎言成为可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怎么看待一个总是自觉地、一如既往说真话的人呢？所有人都知道“真话不总是那么好说的”。在一定程度上，礼貌就是一种社会可接受的谎言策略，它的言后目的是使得对话双方的交流游戏变得容易：

一个小谎言就可以避免无谓地去冒犯他人。医生在一个得了重病的患者面前，可以故意选择向他撒谎[②]。心理疗法医生可以省略一部分他所知的患者的情况，这是为了让患者自己去发现它，治疗的有效性依赖于这种省略[③]。政治实践要求最少量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修辞说明了确信不总是和有效的推理一起获得，在私下的范围内，一定量的不诚实偶尔会帮助我们互相宽容[④]。另外，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关于真实性和说真话的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中国人的对话体实践就和我们的很不一样[⑤]。

如果说谎言在调整社会自身内部关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更不必说谎言在面对生人、对手时存在的必要性了：“谎言是一种武器。运用谎言

---

① 在 *D'un prétendu droit de mentir par humanité* 中，康德考虑了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反对意见：“主要的精神状态是‘说事实’是一种义务，如果用绝对的、孤立的方式来考虑精神状态的话，它会使整个社会成为不可能。”贡斯当恰当地将语用研究方法（考虑形势的要求）和康德的清规戒律（建立在实用理性的绝对命令之上）对立了起来。

② 在 *Les Secondes Objections aux Méditations de Descartes* 中，梅仙尼（R. P. Mersenne）坚持认为，上帝本身也能够撒谎：“上帝对待人类难道不能够像医生对病人那样、父亲对孩子那样吗？在这些关系中两者经常互相欺骗，但是这种欺骗总是谨慎而有益处的，因为，如果上帝向我们指出了赤裸裸的真实性，那么哪一只眼睛，更确切地说，哪一种精神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这种真实性？”cf. Descartes，*Œuvres et lettres*，p. 363.

③ Cf. N. Bertoni & A. Trognon，*Structures communicationnelles de la situation thérapeutique*. 这条规则叫做悬浮注意（attention flottante），也就是说为了听还没听到的内容（pour entendre ne pas entendre）。悬浮注意支配着心理医生倾听的举止，从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来看，它将心理医生禁锢在了悖论的位置。我们注意到，动物行为学告诉我们，动物自身被引向了拖延策略，cf. D. Lestel，*Une multimodalité problématique：communications symboliques des primates non humains，tromperie tactique et socialité postulée*.

④ 还需要补充几种情况，在这几种情况中，谎言的问题——出于真诚——没有被提出。如在科学话语中，当人们使用假设推理或者归谬法（人们错误地假设一个命题，然后证明这个命题的真实性）时，或者在幻想话语中。伊阿古只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我们却假装相信他在撒谎！

⑤ Cf. François Julien，*Le détour et L'accès*；或者是泰国人的模糊文化，J. Bilmes，*Misinformation and Ambiguity in Verbal Interaction：a Northern Thai Example*. 范德维克认为“会话原则是语言运用的语用共性，会话原则和特定的人类文化无关”，*Non-Literal Speech Acts and Conversational Maxims*，p. 379. 格赖斯的质量准则的例子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既然会话实践和支配它们的规则明显是社会性的，那么这一点就没什么让人惊讶的了。

进行斗争是合法的……所以我们经常通过向对手撒谎来战胜敌人。”[1]我们可以想一下用谎言进行斗争的所有形式：宣传、提供假消息、心理战、设圈套等等。

就像尼采（Nietzsche）指出的那样，真实性是一种必须要向前追溯的价值[2]。在我们的社会里，对真诚的推崇这个行为准则并不属于任何道德的命令，它只是组成了一个建立在遵守信用条约基础上的纯语用学规则：“最精明的人都有开放的、坦白的行为表现；人们认为他们是真诚的、真实的，甚至是当他们偶尔认为有必要隐瞒时，人们还是会这样认为。当他们使用隐瞒手段时，从他们的良好信用、真诚和行为表现中获得的先前声誉将会保护他们。”[3]

（2）相应的，只要谎言还被理解成断定失败的情况，那么断定的言外分析就不能够明确地考虑到谎言失败的情况[4]。当说话人有意撒谎，但自己却搞错了的情况下，他所相信的内容并不是真实的，他的谎言策略就失败了，因为他所说的正和他的错误所想相反，也就是所说的是伪真实的，这就是谎言的失败。

因此，谎言是作为断定在语用上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它们各自都有不完善的情况：错误之于断言，谎言失败之于谎言。在互动层次上谎言有着和断定一样的功效，在交流层次上谎言的涵义就是试图操纵他人。

四、断定和谎言的互动功能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断定的定义主要涉及的是行为的交流范畴：人和人之间的诚实关系，人们和他们所共建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真实关系。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下断定和谎言在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特别的功能。

首先来看断定。断定似乎直接针对客观现实。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以说话人到听话人之间的关系为媒介的。就是这个媒介构成了长久以来被断定所忽略的复杂性和特征性。

和宣告类的情况一样，在我们叫作担保类的情况中（cf. *supra*, chap. Ⅲ），相关的交流是明示的：这涉及让听话人或说话人做一个动作，或只是通

---

① A. Koyré, *Rélexions sur le mensonge*, p. 20—21. 在这本写于1943年的小册子里，柯瓦雷揭示了谎言在极权社会和法西斯社会中的系统用法。

② Cf. *Le livre du philosophe*, *L'énonciation de la vérité à tout prix est socratique*, § 70, Ⅲ: “真实性是幻觉，人们忘记了它们是什么，真实性是隐喻，都被滥用了并且丧失了它们的感性力。”

③ Cf. Pio Rossi, *Dictionnaire du mensonge*, p. 41—42.

④ 然而，我们能够将谎言失败的情况定义为断定行为的满意和不成功情况。

过说一个仪式惯用语这个事实来做某事。话语的形式是被编码的，对话体功能是被区分的。

至于断定，交流则不是明示的，它隐藏在一个表面上无关痛痒的对客观现实状态的描述之后。因此，断言所拥有的行为力是除元话语之外最弱的（*ibid.*）。这样的话，断定在实际的互动中拥有的形式和功能就非常的不同了，也就很难预测[①]。对断定的对话体分析不能够在单个互动层次上进行，而应该在整个互动这个更完整的层次上进行。一个断定可以根据相关的对话类型、根据它在对话体进程中的地位、根据它是对话双方中哪一个人说出来的，从而拥有不同的对话体功能（cf. *supra*，chap. VI）。因此，断定被看作独立于它的各种可能的对话体功能，它只是一个抽象、分析的片断。

断定所拥有的媒介特点同样也说明了它能够采用大量的间接形式：讽刺、幽默的表达方式、暗喻、夸张等等。古典修辞学的修辞格在大部分时间里描述的就是断定可能的互动修辞式样的特点。

现在来看看谎言。谎言有着和断定一样的可能性，完全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断定中所涉及的交流在互动中是不明示的，互动可以被掩饰，并授权各种操纵。自此，和断定一样，谎言也拥有了不同的互动式样，从最背信弃义的暗示到最卑劣的谎言。我们可以用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谎言形式的不同等级来举例说明对谎言的互动分析。

坏话的失败和成功

戏剧对话可以被看作是对日常会话（conversation）的简化模仿[②]，它使用了沟通的技巧，其真正的对象——虽然是间接的——大众。只要我们不混淆模仿体和被模仿的客体，戏剧会话就可以构成沟通行为的“放大镜”，即对话体策略，真正的日常会话中不可避免的“杂音”都被隐去了，或是退居其次了。

从严格的对话体观点来看[③]，《奥赛罗》这出悲剧是通过一系列企图的失

---

① 塞尔将断定加在听话人身上的约束的“缺乏”和毗连配对的研究方法（例如，提供可以引出接受或拒绝，问题可以引出回答，等等）对立了起来，cf. *Convention*，p. 10.

② 两种会话类型的主要区别取决于它们所使用的陈述处置，cf. C. Kerbrat-Orecchioni，*Pour une approche pragmatique du dialogue théâtral*. 在日常会话中允许的，例如说话人的重叠介入，在戏剧会话中是不允许的，反之亦然，例如，独白在日常会话中是不被允许的交流行为表现。

③ 我们的分析不针对各主要角色所具有的心理复杂性，并无心提出一个对深层动机（引起了沟通行为或不同人物的其他行为）的新解释，cf. R. Girard，*Shakespeare*，*les feux de L'envie*.

败和成功[1]链接起来的，通过这一系列的企图，伊阿古想要说服奥赛罗相信苔丝狄蒙娜（Desdémone）的不忠。伊阿古的这些企图有交流的性质[2]，例如，从爱米利娅（Émilia）那里偷来苔丝狄蒙娜的手绢是为了能将它变成苔丝狄蒙娜不忠的证据（第三幕第三场），它也有互动的性质，例如，“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让奥赛罗相信，凯西奥（Cassio）和自己的妻子过分的亲密”（伊阿古的独白，第一幕第三场）。伊阿古所策划的阴谋最终能成功完全建立在双重的操纵之上。为了能成功地欺骗这个“外族的冒险家”，伊阿古要成为事件的主宰，这些事件对于摩尔人奥赛罗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他还要让这个摩尔人相信关于这些事件的解释。

对于这些事件所涉及的内容，伊阿古需要详细地叙述非真实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经常使用隐瞒（omission）的手段，部分或全部地隐瞒那些听话人并没有参与的事件的有关信息。他有计划地篡改事实，例如，他和洛特利哥一起去勃拉班修的家，去告诉这位父亲，那个摩尔人策划了对苔丝狄蒙娜的绑架（第一幕第一场）。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绑架目的的信息——也就是奥赛罗想和苔丝狄蒙娜结婚——就被屏蔽了。这使得勃拉班修得出了一个关于这个事件的非真实的观点。

在互动的层次上，伊阿古的权利还主要建立在他的暗示（insinuation）能力上。这种策略意味着不宣告地背叛摩尔人奥赛罗赋予的信用契约，具有圈套的涵义：“如果你爱戴我，就告诉我你的想法。”（第三幕第三场）必须要强调，伊阿古的非诚实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当摩尔人奥赛罗要求他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伊阿古明确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他真诚地回答奥赛罗说：“当您知道我对您的无限坦诚时，您不能这样要求我回答，既然我要尽可能地保守这个想法，您也就不会得到答案。”[3]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尝试着，一方面重建两个阴谋时刻的话语产生和立

---

① 译者注：这里所说的失败和成功指的是说话人的企图（其中介入了听话人的反应），和上一节中所指的成功条件的成功或不成功（诚实或不诚实）涵义不同。

② 选择舞台演出这个类型已经是对原来文本内容的一个解释了，这个解释由虚构的比喻组成，而虚构的比喻则由演员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游戏产生，cf. C. Kerbrat-Orcchioni，*Le texte littéraire : non-référence, autoréférence ou référence fictionnelle*. 我们所选择评论的舞台演出是 C. Stanislavaski 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所设计的舞台演出。Cf. *Othello de Shakespeare*（F. - V. Hugo 翻译，C. & R. Lalou 改写）*avec la mise en scène et les commentaires de C. Stanislavski*.

③ 第三幕第三场。伊阿古的这句对白与他向大众的宣告相呼应——“我不是我那样”，第一幕第一场。它也许组成了这出戏剧中唯一的一处：伊阿古遵守了对于摩尔人的信用条约，尽管是通过拒绝的方式。

足点，另一方面标明部分阻止阴谋结果的话语要素。主要思考的是第一幕的第一场和第三场，以及第三幕的第三场。

隐瞒

在第一幕第一场中，伊阿古和洛特利哥通过隐瞒的手段向勃拉班修和大众说谎，他们隐瞒了摩尔人奥赛罗绑架苔丝狄蒙娜的目的。伊阿古意图隐瞒的理由是在第二场中明示的，当时他对奥赛罗说："但是，请听我说！先生，您是坚决要结婚？……这会使你们离婚的。"

这两个骗子关于绑架苔丝狄蒙娜这件事的断定的非真实，根据语境，也就是根据所针对的听话人类型——主要角色或是大众，有着不同的功能。

对于大众来说，隐瞒可以创造一个围绕奥赛罗品质的悬念[①]。它的目的不是要直接操纵观众的行为表现，而是要诱使大众对奥赛罗这个人物抱有负面的态度。围绕这个人物创造的悬念来源于同时存在着洛特利哥和伊阿古对于奥赛罗的怀恨之情的诚实断定，以及无法确定他们关于奥赛罗的负面评价的真实度。公众处在这么一个情形之下，由于奥赛罗的缺席，公众无法估计奥赛罗的真实品质和赋予他的罪行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

同样的隐瞒也构成了一个操纵企图，操纵勃拉班修针对奥赛罗所采取的行为表现。洛特利哥和伊阿古的断定是非诚实的。在他们的阐述中这些断定是要让勃拉班修相信他们是因为好心才来报信的："非常严重，勃拉班修，我来您这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纯洁的灵魂。"而事实上他们是为了泄愤。但是，大众没有上他们的当，大众听到了这两个合伙骗子的对话——洛特利哥："这是她父亲的家；我去楼上喊他。"伊阿古："好的！语气要惊恐一些，带些可怕的吼叫，就像在一个不慎引起火灾的夜晚在居民区响起的火警一样。"

但是，对于勃拉班修来说，两个骗子的"非真实"服务于他们"非诚实"的态度，也就是说，让勃拉班修采纳了针对奥赛罗的敌对行为表现。

伊阿古的阴谋也经常会遭受部分的失败，第一幕第一场和第三场的情节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奥赛罗的非真实形象——"爬上白母羊床"的"一只老黑公羊"或者"一个淫荡的摩尔人"——被奥赛罗在元老、总督和苔丝狄蒙娜面前所做的解释给揭穿了。面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听话人——大众和勃拉班

---

① 除了伊阿古所提供的负面介绍，奥赛罗要到稍后才会真正登场（第二场，第47句对白）。这符合莎士比亚的编剧理论意图，要创造一个围绕主要角色的悬念，cf. *The Arden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 *Othello*, M. R. Ridley (éd.).

修——奥赛罗的独白所导致的阴谋失败有着双重的效应：

一方面，它通过向大众展示我们这位主人公灵魂的高贵，从而解开了关于他品性的悬念："好的，阁下，您的阅历比您的武器让您拥有更大的权力。"（奥赛罗对勃拉班修说，第二场）。

另一方面，他促使勃拉班修更真实地再现这些事实："……我绑架了这位老者的女儿，这是真的，但我也娶了她，这也一样是真的。……我会……面对您严肃的审问明确解释我是怎样得到这位美人的爱的，以及她是怎样属于我的。"（第三场）

但是这个阴谋的失败，只局限在伊阿古、洛特利哥的言辞非真实的范畴。鉴于伊阿古这个角色在接下来情节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功主要是指其非诚实的态度：成功地实现对于奥赛罗的怀恨。不论是勃拉班修、元老，还是奥赛罗都未能觉察到这种感情的唯一体现。只有公众[①]和洛特利哥明白这一切（cf. 第一场）。就像人们在第三幕第三场所看到的，引起奥赛罗发生变化的伊阿古的权利和他断定的实效主要都建立在诚实缺失的基础上，即通过他们话语中非公开表明的定义。

暗示

随着剧情的展开，就严格意义来说，伊阿古只撒了两次谎。第一次是他向奥赛罗详述凯西奥所说的梦话，第二次是他对奥赛罗的自白："……但是我今天看见凯西奥正是用这块草莓色花边的手绢在擦胡子，我很确信这块手绢是属于您夫人的。"[②] 但是，就像人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两个谎言都处在第三幕的结尾，那个时候操纵奥赛罗的工作基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谎言是完全不能被证实的，事实上这两个谎言都是为了向奥赛罗提供伊阿古所强加内容的确实性：证明苔丝狄蒙娜不忠。

这个漫长的说服工作开始于第三场的开头，因此这一场就很关键。第三场的意义在于可以定位陈述策略，通过陈述策略伊阿古让奥赛罗心中首先产生疑

---

① 根据莎士比亚戏剧的惯例，独白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向公众介绍人物的真实面貌，特别是在和其他主要人物所做的介绍进行对比的时候，后者的作用在于掩藏这个人物的真实品性，cf. R. Marienstras, *Le proche et le lointain*, p. 228.

② 第三幕第三场。第二个谎言比第一个谎言更加危险，因为它可以被证实。在这种情况下，伊阿古的背信弃义并不是较多地存在于他向奥赛罗说谎这个事实之中，而是在他的手段之中，通过这个手段他成功地得到了手绢，把它转变成苔丝狄蒙娜不忠的证据。在同一幕中，他通过让爱米利娅相信这只是一个玩笑、一个年轻情侣之间的游戏，从而从爱米利娅的手中拿走了手绢，cf. *Othello de Shakespeare aveclamise en scène et les commentaires de C. Stanislavski*, p. 209.

惑，紧接着是怀疑，并且借助于话语游戏引导着奥赛罗去协助实施他的恶魔计划①。

操纵奥赛罗对于苔丝狄蒙娜的感情既是暗示的一个被动结果，也是暗示的必然话语策略，使用暗示包含了交流层次和互动层次上的步骤。

在交流的层次上，伊阿古引导奥赛罗注意某些原本奥赛罗不注意的东西，即当奥赛罗到达城堡花园的时候，凯西奥就匆忙离开了花园②。

在互动层次上，伊阿古成功地将对于这一事件的偏见性解释强加给了奥赛罗。当摩尔人看见凯西奥离开花园时，伊阿古立刻强调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通过表达开启了交互："啊！我不喜欢这样。"③

否定形式和不确指的语言单位"这样"都用来吸引奥赛罗注意到这两个不同的要素。

否定形式结合了动词"喜欢"，这让伊阿古表达了痛苦的感情。他行为的第一部分可以通过某种类型化的内容更清楚地表示："我多希望没有看见我们刚才看见的事情。"④而且，指示成分"这样"的不确指使得伊阿古将引起他痛苦的客体变得不确定了。鉴于伊阿古完全非诚实的态度，这种不确指是恶意的。在互动的层次上，这种不确指用来在话语中创造空白（un vide），空白的功能在于吸引摩尔人的注意。事实上，计策奏效了："你说什么?"

奥赛罗的反应如预计的那样，他感到很困惑。但是，所需要的确指并不涉及行为的言内范畴，即"你不喜欢什么?"而是涉及行为的言外之力。奥赛罗使用了一个具有元话语功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改写为："为什么你要说你

---

① 关于让伊阿古和奥赛罗相对立这个戏剧特点，我们在这里采纳了 R. Marienstras（*op. cit.*）所明确提出的解释。伊阿古代表了人间事物的相对性观念，这是由人类和其外表的不一致支配的："……他是否认一切在变化、一切在变质、习惯于否定的那群人中的一个。" p. 214。相反，奥赛罗则代表了男性道德等级中的完美观念，也就是说，人类和其外表之间的完美黏着："……'人们必须要发现我'（第一幕第二场）……也就是说：我就是我这样的。" p. 195.

② Cf. *Othello de Shakespeare aveclamise en scène et les commentaires de C. Stanislavski*，"伊阿古假装被抓住……闪到一旁，似乎是偶然打开了门，他拉着门把手，指着走远的凯西奥"，p. 177.

③ 对于这个否定形式（forme négative）我们所提出的解释受启发于弗洛伊德（S. Freud）的文章，当然也做了必要的修改——《否定》（*La négation*），也可以更准确地翻译为《否认》（*dénégation*）。弗洛伊德的解释涉及病人使用否定形式和抑制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判断中否认某样事情意味着在内心深处，这样事情是我更想主动忘记的。" p. 136. 我们在对悲剧《奥赛罗》的分析中采纳的弗洛伊德的否认概念仅仅涉及它的语用功能，也就是说，可以在话语行为中表达某样伤害说话人、使说话人反感的事情。

④ "我们刚才看见的"，而不是"我刚才看见的"，由于伊阿古的巧妙手段，奥赛罗看到了凯西奥的离开，根据接下来的对话"刚离开我妻子的人不是凯西奥吧?"，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奥赛罗知道伊阿古和他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刚才所说的话?”奥赛罗所提问题的元话语功能自动地将伊阿古所表达内容的真实性问题推到了次要位置①。奥赛罗支持了伊阿古的话语策略，恳请伊阿古明确其“说”的诚实性（不能证实的状态）。自一开始，这就让伊阿古有可能将交流游戏聚焦到明示他所做断定的良好信用上。

针对奥赛罗的元话语问题，伊阿古用两个否定形式做出了回答：“没什么，大人……或者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否定副词“没什么”似乎否认了第一句话的所有价值。但是第二个否定“我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再次提及了先前表达的痛苦感情，这意味着他知道内情，而且仍然是不确指的：“什么”是“这样”的回声（écho）②。这两个否定结合了“他知情”的提示，使得伊阿古表达了由于害怕才对所见事实的暗含意义保持缄默。伊阿古假装不敢说他所知的事情，从而避免了告知有关事实的所有信息。但是，自此在话语中提出了知情的必然性——代表了事物的隐含面貌。通过这个暗示策略，伊阿古主要是为了一个言后目标：让奥赛罗“有所警觉”。与其平淡无奇地撒谎（断定非真实的事情），伊阿古更追求巧妙地让奥赛罗自己表达出疑惑——

“刚离开我妻子的人不是凯西奥吧?”

奥赛罗的这个问题再一次构成了断定的否定形式，并证实了伊阿古的成功，也就是说，暗示将奥赛罗所看见的事情和他容易对此事产生的想法结合了起来。奥赛罗由此自己考虑起伊阿古貌似害怕供出的实情。从这层涵义来看，伊阿古成功地将疑惑灌输给了奥赛罗——

“凯西奥大人？肯定不是；我不能相信他会像个罪犯那样一看到您来就躲避起来。”

伊阿古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暗示关于凯西奥行为举止的偏见性解释。伊阿古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首先小心地通过两个新的否定重提了奥赛罗的问题，这是为了在回答问题之前将答案归结于奥赛罗。伊阿古通过两次否定掩饰了非真实的断定：“他会像个罪犯那样一看到您来就躲避起来。”

第一个断定涉及实在性的领域：“肯定不是。”同时第二个断定涉及思想的领域：“我不能相信。”通过否定的策略，伊阿古成功地陈述了非真实性。伊阿古虽然让奥赛罗对他言词的诚实放心——“肯定”，但他还是通过否定非真实

---

① 相反情况是明确言内内容的要求，将行为的诚实问题推到次要位置。对言内内容的聚焦自动地开启了对内容真实的谈判和/或怀疑的可能性。

② 我们紧扣莎士比亚的文本“Ha！I like not that/ I know not what”，而没有采用由 C. & R. Lalou 改写的 F. -V. Hugo 的翻译译本。

性的方式在话语中放置了非真实性，这是为了让奥赛罗在想象的空间中承认这个非真实性。伊阿古之所以断定凯西奥离开的意义不是由于看到奥赛罗而躲避起来（事实上就是伊阿古给离开行为赋予了这个意义），其目的却是为了让这个意义逐步成为可接受的真实性。这个意义由具有指示功能的词"那样"引导出来，这个词将他们所看见的结果和凯西奥的罪行联系了起来。最终，先前两个不确指成分"这样"和"什么"所创造的空白最终被填满了……良好的信用！

"我相信就是他！"

策略成功了：奥赛罗解除了伊阿古的否定，他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然而奥赛罗并没有明确采纳伊阿古所暗示的道德判定。

在这一场接下来的情节中，苔丝狄蒙娜通过她单纯的真诚无意间平息了奥赛罗的怀疑之心：奥赛罗"您想谈谈谁？"苔丝狄蒙娜"啊！谈谈您的副手凯西奥……我请求您把他喊回来……"

就像在第一幕中一样，伊阿古阴谋的部分失败只涉及他背信弃义的断定中的非真实。苔丝狄蒙娜通过话语介入使得伊阿古的策略失去了作用，但却不能够消除其邪恶的效果：对妻子苔丝狄蒙娜的忠诚的怀疑[①]。

伊阿古话语策略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精神特质（éthos），也就是说，凭借奥赛罗给予他的信任而拥有的针对奥赛罗的权力。伊阿古的困难在于奥赛罗对他副手的信任至少不比对伊阿古的少。伊阿古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要起了诡计。在这里他采用了暗示这个间接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伊阿古不明确说任何针对凯西奥的话，而是引导奥赛罗对他的副手产生疑问，就好像是奥赛罗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紧接着再回答这些疑问。因此伊阿古的目标不是"说"，而是让奥赛罗"说"伊阿古通过一系列的否定而假装不能表达的内容。

奥赛罗不由自主地支持了这个策略，逐步将确定听话人断定的真实性再次引向承诺分享信用契约："以上天的名义，我愿意了解你的想法。"在这里提供给了伊阿古两面派游戏的可能性，伊阿古在信任条件下（"因为我现在被允许向您表示我对您的爱戴、我毫无保留的忠诚"）暗示了怀疑（"……您从我这获得这个秘密……我仍然不谈证据……请您看住您的妻子，观察她和凯西奥，保持眼睛的雪亮，但别醋意大发"）。

---

① 在接下来的一场里，伊阿古话语的狡猾性在于成功地将奥赛罗的高级理性，即建立在苔丝狄蒙娜证明其爱奥赛罗的行为上，转变为了低级理性，即建立在苔丝狄蒙娜有奸情的旁证——手绢上，cf. R. Marienstras, *op. cit.*, p. 222-227. 伊阿古的坏话成功地使"骁勇的将军"完全变成了"黑公羊"。

为了能够把让人难以想象的内容放到话语中，伊阿古又一次以否认形式断定了这些内容，这就成了一个可能空间——留给奥赛罗一扇通向过度怀疑的门。

五、结论

对《奥赛罗》的简短分析只是为了举例说明一些陈述策略可以让说话人通过话语媒介实现有效操纵听话人的行为举止。莎士比亚所写的整部悲剧都是对最精妙的谎言策略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言后效果的巧妙说明。在这层涵义上，这部悲剧有力地证明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断言类话语的复杂性。

相反，曾经主宰着断定标准定义的独白体视角、再现视角和相符主义视角，导致了对话语的断定用法的不合理的简单化。它们将断定解释为对真实命题的真诚陈述，认为断定单方面描述了客观现实的事实。

只有纯语用的研究方法才能修复断定的复杂性，它指出断定担保了指向听话人的双重契约关系：

(1) 信用契约，这涉及说话人对听话人“说”的诚实；

(2) 认知契约，说话人的“所说”应该具有真实回答的价值，它回答了由交流的最终目的所引起的问题，这个交流的最终目的是说话人面对听话人时所继续追寻的。

语用框架让我们最终发现了谎言的策略价值——用以操纵他人。

第五章　辩证法、对话形式和对话体进程

闪耀着光芒的尼采哲学标出了20世纪的开端①，这个已经结束的20世纪毫无疑问是言语活动的世纪。其主旋律陆续接受了很多概念化。首先，人们致力于从涵义中分离出句法限制（卡尔纳普在逻辑学上，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上），接下来尤其突出的是，人们认清了语义符号的系统性，一般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它。但是，很快人们为了强调在言语游戏中对陈述的运用（维特根斯坦），最终否定了索绪尔对言语的排斥（索绪尔是将言语看作语言的个人实践这个纯心理学现象的），接下来人们又推出了话语语言学（班维尼斯特）。整个话语应用固有的对话体（dialogique）范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现在，在沟通哲学、会话语言学、互动社会心理学、文学理论②甚至是逻辑学③和重点在于人机对话的人工智能学中（cf. *infra*，chap. VI），对话体范畴都是研究的核心。就这样，对话体通过坚决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来源于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和研究客体的本质复杂性），指出沟通是言语活动性质的。还需要指出的是，从话语（discours）到对话（dialogue），从言语互动到会话（converstion），每一个学科、每一个理论，都根据自己的方法论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问题在于要知道，通过趋同（convergence）、公度计算（commensuration）和趋异（divergence）、边界迁移（déplacements de frontières），通过对话体感知沟通的不同方面，我们是否见证了这个或多或少有着共通性的研究领域的产生。

这个问题在沟通和互动的有效策略中介入了言语活动的实践，它提出了明确的语用学研究方法。

重新回到对话体上，我的目的在于阐述关于人类互动和交流的语用学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① Cf. *Le livre du philosophe*.

② Cf. Mikhaïl Bakhtine, *Le principe dialogique*.

③ Cf. Gerhard Heinzmann, *La logique dialogique*.

1. 首先，回顾这个问题的哲学起源。
2. 接下来，阐述通过对话形式进行定义的不足之处。
3. 然后，建议用三个标准来描述对话体的特征。
4. 最后，概述符合所提三个标准的语用学分析。

一、逻各斯①和辩证法②

对话体的问题是一个双重的哲学问题。首先，关于对话体能力的思索就是关于人类和其特征性的思索。班维尼斯特（Benveniste）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将动物沟通和人类的言语活动进行了比较，他正确地强调了人类沟通特有的对话体特征："在对话中，对客观经验的指称和对语言表现的反应自由地、无限地混合在了一起。蜜蜂不能从一条信息出发建立另一条信息。每个蜜蜂，被外勤蜂的舞蹈所提醒，飞出去到指明的地点进食，当它回来的时候又再次重复同一条信息，但这不是根据第一条信息做出的，而是根据它刚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做出的。"③用来描述人类天资特点的不再是言语活动的能力或者是言语的实践，而是对话体能力。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笛卡尔也曾经强调过人类的智能、创造能力，即天生的创造才能（ingenium），是通过恰当回答问题的可能性表现出来的，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在对话中占据位置的可能性而表现出来的④。根据正确的反笛卡尔主义者的观点，如皮尔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对话决不表现为简单的效应，而是由人类智能固有组成的。甚至图灵（Turing）所创立的对于机器智能的测试也是对话体的：机器是否可以通过问题和回答正确模拟言语活动交互（échange）中人类的角色（cf. *infra*, chap. Ⅶ）。

另外，在哲学家的希腊模式中，哲学实践在传统上被设想为逻各斯的练

① 译者注："logos"这个词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概念。一般指世界的可理解的规律，因而也有语言或"理性"的意义。希腊文这个词本来有多方面的含义，如语言、说明、比例、尺度等。赫拉克利特最早将这个概念引入哲学，在他的著作残篇中，这个词也具有上述多种含义，但他主要是用这个词来说明万物的生灭变化具有一定的尺度，虽然它变幻无常，但人们能够把握它。在这个意义上，逻各斯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用这个词表示事物的定义或公式，具有事物本质的意思。西方各门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中词尾的"学"字（-logy），均起源于逻各斯这个词，"逻辑"一词也是由它引申出来的。

② 译者注："dialectique"，源出希腊语"dialego"，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指一种逻辑论证的形式，可以翻译为谈话艺术、问答艺术，在中国习惯上将其翻译为辩证法。

③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 1, chap. V, p. 61.

④ Cf.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5e partie, p. 121.

习，也就是对思考能力和推理能力的使用，这种使用是在对话中并通过对话而实现的。自此，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哲学：人类特征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逻各斯的运用。

苏格拉底，作为西方哲学家的标志人物，除了询问以外并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和神话（muthos）、富有灵感的故事相反，逻各斯是提问（questionnement）和相互询问（mutuelle interrogation）。还有，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思考就是和自己的灵魂进行对话：从自己到自己的内心化提问[①]。而笛卡尔则是在装有小火炉的房间内进行沉思，和自己对话，和哲学家对话，和恶灵（Malin Génie）对话，和上帝对话，最后和他的读者对话[②]。在当代，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罗素“他一个人继承了柏拉图式的对话”，他拥有罕见的特质，能够不断地提出问题来讨论[③]。我们还知道《哲学研究》就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和他自己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

如果说神话，作为对神的狂热，引起了多样的解释，那么逻各斯则表现为话语实践，我们应该解释这种话语实践。思考这种实践的哲学就叫作辩证法[④]。辩证法首先被接受为研究理性对话实践的方法论。迈加拉学派（Mégariques）预示了现代语用分析，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对话体实践并在对话体实践中，理性才能展开并且找到它的局限性。对于欧布里德（Eubulide de Milet）[⑤] 来说，说谎者的语义悖论拥有对话体形式。在他初期的辩证法阐述中，悖论发展为没有结论的询问：

“——如果我肯定我在说谎，那么我是在说真话呢，还是在说谎话呢？

——你说的是真话。

——但是如果我是通过肯定我在说谎而说真话，那么我是在说谎话。

——那么，你是在说谎话。

---

① Cf. *Théétète*, 189e—190a.

② Cf. Denis Vernant,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 chap. 6, § 52 :《Le dialogisme du *Cogito*》, p. 176—187.

③ Cf.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 3, p. 17.

④ 传统的逻辑学著作长久以来都冠以“辩证法”的名字，譬如，出版于1555年的第一部用法语写作的逻辑学著作就是这样，它的作者是德拉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也叫作拉米斯（Ramus），他是皇家学院的第一位数学教授。但是事实上，这些著作都认可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学、推论科学和辩证法、概率艺术之间所做的切分。

⑤ 译者注：迈加拉学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如果我是通过肯定我在说谎而说谎话，那么我是在说真话。”①

同样，预设现象也只有在对话中并且通过对话才会有涵义，才有可能产生困难。举例证明一下，犄角（Cornu）悖论也是通过对话体展开的：

“——你没有丢失的，就是你拥有的吗?

——是的。

——但是，你丢失犄角了吗?

——没有。

——那么，你就有犄角咯。”②

对于迈加拉学派来说，这两段对话是悖论的。辩证法原则认为总是有可能正面回答或是负面回答一个问题，而这两段对话违背了辩证法原则。因此，询问既不是建立在一般的言语活动之上，也不是建立在言语或话语之上的：它只是语用学上对话研究的一个内容。

为什么我们谈论“对话体”（dialogique），而不是简单地谈论对话(dialogue)？这个问题，尽管看起来很表面，实际上却不涉及次要的词汇偏好，而是涉及基础概念的选择。

二、对话形式和独白性

通过形式区分对话是相对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传统将对话定义为种类（genre）的原因了。独白（monologue）是只有一个人包揽言语，与独白相反，对话通过至少两个人之间的言语交替而进行。我们将这种形式定性为对话(dialogale)，它建立在言语交互的观念之上，在这个观念中每个人都轮流占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位置。因此，对于塔索（Le Tasse），这个16世纪的意大利诗人来说，“散文式讨论模仿的就是对话”③。

在这里引入模仿的观念并不单纯，它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话在它的有效性中首先是“口头的现象”。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其实苏格拉底从没写下过

---

① Cf. Robert Muller, *Les mégariques*, p. 77. 一直到20世纪人们才开始重视这种悖论。罗素通过引入命题之间的类型判别来解决这些悖论——判别可以从元语言中区分出言语活动。Cf.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 42 *b*, p. 288—289. 然而人们注意到罗素像他的继承者一样，忽略了这些悖论最初的对话体范畴。

② 为了能够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想要知道我们是否丢失了犄角”这个问题，必须预先在拥有犄角这个事实上达成一致性。自1892年起弗雷格就概述了指称预设的理论，cf. *Sens et dénotation*, p. 115—116；cf. Denis Vernant,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 § 33, p. 227—233.

③ Cf. *Discours sur le dialogue*, p. 87.

什么。对话的口头实践的限制和功效并不就是文本书写中的限制和功效。小说的对白过程、讨论中所写下的关系、电视辩论的视频痕迹，明显不同于对话双方参与的辩论，甚至是进行中的人机互动的实际进程。最好不要将“当前”（in actu）进行的对话和“后来”（a posteriori）所做的校订（采用某个形式）混淆起来。没有书面的对话，只有对话的书面痕迹（trace）。尽管如此，还是存在着通过书写得来的对话形式。例如，书信往来就构成了一个现实的延后性对话、一个通信和以信件节奏展开的提问。然而，人们也可以对此进行反驳，口头对话和通信对话与对话的书面痕迹都共享了同一种对话形式，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柏拉图的著名对话表现为对苏格拉底的提问所进行的书面改写。他就此会将这些问题变成什么呢？苏格拉底变成了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中的一个人物。苏格拉底因此成了权威。就这样，我们从对话回到了言语。提问不会再被指责为是虚假的知识，而是成了在真理和本质的主宰者（Maître de la Vérité et de L'Essence）的指引之下所进行的发现①。美诺（Ménon）的“对话”② 没有表现为真正的询问，而是详述了审讯：美诺想让他的奴隶招认实情，这个实情美诺已经掌握了，但并不让他的奴隶知道他已知情，他是通过“不朽灵魂对理念的回忆”（réminiscence），也就是说，通过预判天性的直觉经验而掌握实情的！在教学上对这类对话的夸张模仿导致了假对话的发生，在假对话的过程中，小学生在老师的戒尺的威逼之下，能够发现诗歌的涵义！从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话形式丝毫保证不了对话的对话性（dialogisme）。有些表现为对话的东西，例如美诺的对话，完全体现出操纵对话者的策略，或是显现为两段独白体（monologique）话语的交叉进行，就像经常在哲学家之间发生的对话情形③！相反，一个独白却可以完美地表现出对话体：作为自我思考的实践，自言自语是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分成了两部分：“思考总是根据对话的形

① Cf. Michel Meyer, *De la problématologie philosophie*, *science et langage*, chap. Ⅱ：《Dialectique et interrogation》，这主要是关于成熟对话的。

② 译者注：美诺，古希腊哲学家。《美诺篇》是柏拉图记载的苏格拉底和美诺之间的对话，他们试图确定德行的本质定义。

③ 哲学家之间的辩论经常是“聋子的对话”，对话双方不共享相同的预设，例如黑格尔（Ricoeur）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之间的辩论，cf. *Esprit*，1963；或者对话双方不共享相同类型的提问，例如德里达（Derrida）和塞尔（Searle）之间的论战，cf. Mathieu Potte-Bonneville，*La Violence dans le débat philosophique*.

式而进行——这是我（ego）的不同相位（phase）之间的对话。”①

这个评定表明很有必要强调形式标准的不足。但是，又以什么名义来对它进行批判呢？又是什么从根本上将苏格拉底的提问和柏拉图的助产术②（maïeutique）区分开来呢？研究对话的哲学家们带来了答案。

三、对话体探索

当代哲学家事实上并不相信只有一种形式来描述对话的特点。他们强调对话体交互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对话体交互被设想为了一致性的相互达成和共享体验。例如，布伯（Martin Buber）③ 就提出了明确的唯灵论形式——你/我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用来与他人、客观现实和上帝相会的特有方式④，而卡罗吉诺（Guido Calogero）⑤ 则提出了更哲学些的形式——“对话原则”是对他人的完全理解和承认的基础⑥。从探索性的角度来看，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⑦ 认为言语活动的范畴（语言性），作为完全理解和对话的层次（问题和回答的开放性游戏），是所有真实性的来源⑧。阿佩尔（Karl Otto Apel）⑨

---

① 皮尔斯继续说道：“因此，作为对话体，思考在它的物质方面基本上是由符号构成的，就像在象棋游戏中，其物质方面就是棋手。” *Collected Papers*, 4. 6. Cf.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I, p. 79 sq.

② 译者注：助产术，苏格拉底惯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论术。

③ 译者注：布伯（Martin Buber，1878年2月8日—1965年6月13日）是一位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他的研究工作集中于宗教有神论、人际关系和团体。

④ Cf. *Je et Tu*, 1923.

⑤ 译者注：卡罗吉诺（Guido Calogero，1904—1986），意大利哲学家、散文家和政治家。

⑥ Cf. *Philosophie du dialogue*. 对于这一分析，cf. È. Buissière, *Idéal du dialogue ou idéal de la science? Un débat entre Ugo Spirito et Guido Calogero*.

⑦ 译者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德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现代哲学解释学和解释学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真理与方法》《柏拉图与诗人》《短论集》三卷、《我是谁、你是谁》等。伽达默尔与其老师海德格尔共同将传统解释学放到现象学本体论基础上研究，他的出发点是反对古典解释学的客观主义。

⑧ “整个对话产生了共同的言语活动。就像希腊人说的那样，某些东西呈现在（我们的）层次中，某些东西是对话双方所参与的，是他们所谈论的。……在成功的对话中，对话双方服从于对立，服从于事物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将两者联系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人们在对话中进行解释-融洽，这种解释-融洽不在于简单地使自己的观点有价值和获胜，相反它是一种为了成为共同内容而做的变形，为了有利于解释-融洽没有人还能保持他原来那样”，cf. *Vérité et méthode*, p. 402.

⑨ 译者注：阿佩尔（Karl Otto Apel）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富创新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哲学的改造》（1972）、论文集《先验符号学》（1994）、《从先验符号学的观点来》（1998）等。先验语用学是他的代表思想，语言交流共同体是先验语用学的“阿基米德点”。

从逻各斯的最终基础上分离出了“语用－先验”条件（conditions pragmatico-transcendantales）①。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② 则将“沟通行动”变成了所有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③。至于雅克（Francis Jacques）④ 则明确了对话体的新范式（paradigme），他肯定对话关系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表现为对话双方的组成原则。真正的对话成为了先验的“逻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对话双方由人组成，能够建立起相互的认识，并一致确立和客观现实的关系⑤。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苏格拉底或陌生人作为游戏的主人，尽管他们肯定自己是无知的，但仍然被看作是掌握着真的标准，相反诸如柏拉图的对话就只能是广义上的独白体了”⑥。

但是，我们抛弃了研究对话的哲学家们的基础性和先验性导向，我们愿意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更强调由社会调节的、历史性标注日期的“生活形式”中的言语游戏⑦。问题在于要了解是否存在着对话体的实质，这个实质只在某些沟通的升华形式中才能实现，或是在于要了解人们是否能够将对话体概念性地定义为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外交谈判、选举辩论、哲学讨论、沙龙会话、情侣间的玩笑等所共有的，尽管它们有着不同的模态。

根据当代人所做的分析，我建议以纯探索性的方式，用三条标准来定义对话体。这三条标准描述了语用分析的三个主要方向，也就是行为分析、对话体探索的三个主要方向。

---

① Cf. *Le logos propre au langage humain*. 对于阿佩尔来说，先验的负面标准是语用学驳斥的。因此，所有的论据都建立在要求有效性之上，强调权力重要性的怀疑论者是看不到这些的。只有以错误的方式，在人们将对话体限制为辩论时，在人们承担所有的自主性时，这样的立场才是可以忍受的。真正的语用学研究方法，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正好相反，是强调整个对话的交流限制的。

② 译者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1962）、《理论和实践》（1963）、《知识和人类旨趣》（1968）、《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1968）、《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合法性危机》（1973）、《文化与批判》（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沟通与社会进化》（1979）、《沟通行动理论》（1981）等。

③ Cf. *Théorie de L'agir communicationnel*. 哈贝马斯宣扬脆弱的先验主义，也就是临时性的先验主义，让位于对哈贝马斯所称的“过去世界”进行的历史改造。但是，就像阿佩尔一样，他也坚持真正的对话拥有自主性这个幻觉。

④ 译者注：雅克（Francis Jacques），1934 年生于斯特拉斯堡，法国哲学家，哲学和神学博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人类学、分析哲学和语用学。

⑤ *Dialogiques, recherches logiques sur le dialogue*; *Différence et subjectivité, anthropologie d'un point de vue relationnel*.

⑥ F. Jacques, *Du dialogisme à la forme dialoguée: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pproche pragmatique*, p. 28.

⑦ Cf.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23, p. 125.

对话双方的共同组成

对话体交互是由说话主体构成的，班维尼斯特认为，对着“你”说“我”的人就是主体①。但是，从更本质的方面来看，与此相关的是，用雅克称作“对话关系优先性”（primum relationis）的内容替代从苏格拉底逻辑学那里继承来的所有谓项阐释。对话（dialogue）的前缀“dia”② 和交谈（interlocution）的前缀“inter”在单词里表达的都是“对话关系优先性”。“应用在人类推理中的关系优先意味着个体‘我’不能够被看作充分的、孤立的主体（充分的、孤立的主体性可以构成实在性），而是应该被看作一定数量的权力、能力和关系控制的中心：与另一对话创建人相结合，保持和他的关系，或是相反，恢复清醒和镇定。”③

在独白体的研究方法中，说话人作为自主组成的人，可以用固有的相信和意愿来评述，他的地位从属于笛卡尔主义对于“我思”（cogito）的幻觉，可以在纯粹思考的自反经历中被感知。相反，从对话体的观点来看，在基本的对话体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进程中对话双方相互组成。

日益发展的心理学证实了这种共同组成：母亲和孩子之间最初的交流，特别是通过爱抚和游戏的交流，引起了孩子对现实的分类，并能够逐步形成孩子的沟通互动能力④。相对于独白体的话语运用和它所派生出的书面痕迹来说，对话作为两个相关联的人之间的生动的交互言语首先表现在本体论上。

对客观现实的共同构建

同样，对话双方是在对话中并通过对话建立起相互认识，并比较各自对所共建的客观现实的相信。通过指称过程对话双方在他们话语的客体上达成一致⑤，但问题不仅在于对指称过程的对话体感知上，更一般、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共同建立客观现实的过程所具有的对话体特点，这个过程提供了到事物的指

① *De la subjectivité dans le langage*, in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 1, chap. V, p. 260：“只有在和某个人说话的时候我才会使用‘我’这个词，在我的讲话中某个人就是‘你’。这样的对话条件是由人组成的，因为它意味着可逆性，当轮到这个人被指定为‘我’时，在他的讲话中我就成了‘你’。”

② 或者是辩证法（dialectique）这个词的前缀，它的意思是交谈。

③ Cf. F. Jacques, *Différence et subjectivité*, chap. Ⅲ, p. 151.

④ 这可以解释儿童能够迅速掌握言语活动的“奥秘”，cf. Sandra Laugier 所分析的 Jerome Bruner 的博士论文，*Le dialogue et L'apprentissage du langage*.

⑤ Cf. F. Jacques, *Dialogiques, recherches logiques sur le dialogue*.

称约定范围。

根据再现主义的信条，奥斯汀称其为“描述性幻觉”，话语的优先客体是提供对客观现实、唯一实在性（假定为独立于整个对话体进程之外）的真实再现。我们必须要抛弃这种再现主义信条。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cf. *supra*，chap. IV)，其中一个技术关键就是对断定的定义。断定不是说话人对真命题的表达（命题符合客观现实的事实），而是说话人面对听话人时担保对于某个客观现实的相信，在这个客观现实之上他们达成一致，在这个客观现实之中他们展开交流。

开放的过程

对话体的特点既不是对话形式，也不是交互结构，而是开放的过程(processus ouvert)。

蜜蜂没有对话，因为它们所跳的舞蹈是直接附属于非言语交流的：对于给出的信息，回答是行为性的而非沟通性的[①]。相反，人类的特征性在于能够对语言信息给出语言回答，简而言之就是能够建立言语互动。因此，每个实际对话作为至少两个面对面的对话者之间的言语互动过程，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事件，从先验上（a priori）是无法预见的。在口头交互中，对话人的一系列选择逐步地、双边地构成了对话。行为上（en acte）的时间性将对话变成了来自对话双方的不断进行的创造（création)。和建立文本不同，建立文本在二维空间中允许每个校订，而对话的终结是无法预见到的。口头对话在回答的紧迫性中展开，只有当没有什么再是可能的时候才能知道它结束了[②]。很明显的欺骗：柏拉图一个人很从容地重写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对话的结构逐渐从对话体自身的进程中显现出来。互动序列或多或少的一致连贯性取决于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能力和达成协定的能力。这就像帆船的航行：人们先验地知道目的地，但是航行取决于风和大海的状况。因此，我们不考虑后天（a posteriori）重组对话结构，而人们在文学领域经常会重组对话结构。相反，我们要考虑的是发现

① 另外，我们注意到，八字舞的几个信息内容元素直接模拟了飞回来时所实施的交流：相对于太阳的位置，翅膀的振动频率等同于飞行频率（250 赫兹），舞蹈的持续时间与飞行的时间成正比。

② 对话的结束（完成）取决于它的最终目的。客厅会话——其最终目的是纯寒暄功能的(phatique) ——没有理论上可确定的结束，只涉及了维持主体间的交流；一段告知信息的对话在获得了希望告知的信息时就完成了，cf. *infra*，chap. Ⅵ. 我们还可以区分“可结束的”对话和其他“无休止的”对话。

一步步支配对话体进程的规则，以及控制互动序列的模型①。

我们看到，通过三个标准显现出来的对话体的复杂性要求一个非谓项的、非再现的、非结构的分析。要克服这些负面因素需要一个关系性的、行为性的、过程性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只能从语用学的角度展开，只有语用学才能避免言语活动的再现概念的陷阱，才可以分析对话关系，并将超言语活动的最终目的赋予对话。从语用学角度，我们提出同时分析对话的交流和互动。

四、对话的交流和互动范畴

交流的最终目的

首先我们来看交流范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cf. *supra*，chap. Ⅲ），交流范畴介入了将对话和非言语活动联系起来的复杂关系，对话是他律的（hétéronome）言语活动实践，而非言语活动赋予了对话以涵义和最终目的（finalité）②。

从交流的角度来看，对话构成了合作的言语活动策略，它保证了对话者之间的相互承认，对话者既是人类，同时又是作为共同行为、联合行为的施动者，这些行为作用于他们所共同建立、共同改造的客观现实。因此，交流有双重范畴："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f）和"客观现实内的"（intramondain）。

主体间的交流

交流的第一个方面立足于人际关系（relations interpersonnelles）。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上文已经谈过的第一条标准：对话双方的共同组成。对话首先是指对话双方通过精神状态的单向或双向适应而相互认识和承认，这里的精神状态包括相信和认识（认知范畴）、欲望和意图（意志范畴）、价值观和禁忌（公理范畴）、感情和冲动（情感范畴）。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在对话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来的，超越了他们的再现表达，应该用语用学和行为学来解释。

例如，对话双方的相信就从属于行动处置，"思想的所有功能就在于创造行为习惯"③，而价值观则可以用行动理由来解释。

---

① 在第八章中我们将继续就这一点进行行为分析，我们将对话定义为"情形中的联合活动"（activité située et conjointe）。

② 哈贝马斯分离出了被假定为自律的（autonome）纯语言行为，这使得他可以任意地将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区分开，沟通行动倾向于能够达成一致的纯粹的相互理解，策略行动则代替了利益的对抗，倾向于成功。

③ Cf.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5. 400.

因此，在对话中涉及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成分[①]。言语交互中含有的信息、口头对话的韵律要素（语气、节奏等），以及身体要素（如距离、姿势、手势、鬼脸和目光等），都提供了人际交流的指标。自柏拉图开始人们就知道，哲学实践作为提问担保了对真实性的欲望，这种欲望经由对其他的欲望而来。更通俗地说，所有的疑问（érotétique）都以某种形式假设了色情（érotique）。

这里也涉及对话双方在交流中通过沟通互动而形成的地位和脸面、身份和形象。因此，社会性的礼貌要求就优先于格赖斯主义的合作原则，例如，一般来说，不去冒犯他人显得比表达清楚更为重要[②]。对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代词的运用可以使我们掌握对话双方之间的关系地位：对称的“我－你/我－你”，不对称的“我－你/我－您”。同样，以下两种对话是很不同的：一种对话中对话双方相互使用“我们”，用“他们”来指其他人；另一种对话中，说话人使用“我们”来表示从属于一个团体，听话人作为这个团体的成员被称呼为“你们”。

客观现实内的交流

在对话中并通过对话进行的人际交往不能和客观现实中的施动者所做的“担保”（engagement）割裂开来，不能和他们的言语交互所具有的固有行为“关键”（enjeux）割裂开来。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第二条标准：对客观现实的共同构建。

所有的对话行为总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以改造客观现实为目的，它的完全意义取决于行为的最终目的。人们去打听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时刻表，是为了乘火车，为了到达一个城市，为了参加一个讨论会，为了和某人联系，为了……

---

① Cf. Francis Jacques, *L'espace logique de L'interlocution*, p. 97：“对话的时间，……人物……都明确地要求与它们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关系脱离开来”；p. 101：应将“仍然是不说出来的对话灵魂”放在“话语公正性的元规则中（métarègle）”；p. 120：这使得雅克先是将会话，后来又将谈判，与“真正的对话”对立起来，在真正的对话中对话双方不要求社会地位，而是“担任理想化的说话人或听话人的位置”；p. 124：在真正的对话中“对话的交谈空间避开了力场”；p. 572：真正的对话是“和解功效”（vertu irénique）的来源；p. 216：有关“对话的”所有内容都被设想为“理想化的限定”。“对话的”这种身份带来了困难：这是不是一个理论的抽象或一个可能可以实现的理想呢？为了不把愿望和实际混淆在一起，我们就要考虑将所有的对话，不管它有怎样的对话等级，都归入交流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对话双方不能够撇开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会上的限定。这丝毫不阻碍达成完全一致的可能性，虽然这种一致或多或少是暂时的！但是这种一致是正面获得的，不是虚幻地通过否定或加括号而得来的（加括号是指给人的实在性和交流关键的实在性加上括号）。

② Cf. R. Lakoff, *The Logic of Politeness ;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 , p. 298. 关于礼貌原则，cf. Catherine Kerbrat-Orecchioni, *Variations culturelles et universaux dans le fonctionnement de la politesse linguistique*.

当“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明确以交流范畴为目的时，他谈论的不是纯粹的语言运用，而是在行为范畴内对言语活动的实际使用（Gebrauch）：“命题的涵义是它的最终目的”[①] 和“我们所说的内容从我们其余的行为那里获得涵义”[②]。因此，互动的涵义由客观现实内的最终目的和交流关键（enjeux transactionnels）来确定。

所有的交流都建立在行为人的理性及合作这个公理之上。行为人被设想为能够根据目标独立地行动，并使方式符合目标，也能够集体地将各自的行为关联起来，并在共同的最终目的上达成一致。合作的模式可以不同，但是基本上行为和反应是相协调的。对目的的共享意味着对行为的共享，多个行为人可以借助于同一个行为：两个护林员可以一起用绳子拖着一段木材将它运出来。多个行为人也可以联合实施互补行为，就像伐木工人用龙锯锯倒一棵大树时那样。再或者，他们可以一个接一个连续他们的行为：纵向锯木工只在伐木工人和装卸工人完成工作之后才开始工作。这一切都假设了一种计划化（planification），这种计划化确定了目标、子目标的连续性以及策略的制订。当计划化经常被重复时，它就凝结成了惯例、一成不变的“脚本”（scénario），这个脚本几乎是自动地支配着行为的进展，并为言语互动提供框架[③]。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式”是在技术上、社会上被确定的，它们根据不同的空间和时间而变化。很久以来人们已经不再用龙锯砍伐大树了，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大象作为装载工！

然而不要认为交流是建立在简单技能和后天实践之上的。简单技能和后天实践，作为介入客观现实的模式，和“客观现实的像”是密不可分的，而客观现实的像并不被设想为最终的、客观的、即时给出的实在性，而是来源于言语互动和非言语交流的集体实现（cf. *supra*，chap. Ⅳ，§ 1）。自此，每个客观现实都是暂时的，多元的客观现实是共存的。在我们大部分会话中所涉及的日常生活的客观现实、在关于量子理论的论战中所涉及的物理学家们的客观现

---

①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② *De la certitude*，§ 229.

③ 关于共同行为和联合行为的定义以及脚本的作用等，cf. *infra*，Chap. Ⅷ.

实[1]，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课间休息时在图书馆的小咖啡馆内的讨论可以完美地混合这两种客观现实！

对客观现实的交流范畴进行分析必然依赖于说话人所说内容所提供的语言资料[2]，以及由对话双方所处语境所带来的非言语标志、由暗含的生活形式所确定的行为背景、赋予生活形式以意义的客观现实的像。

现在还需要谈的就是对话自身的展开，也就是言语互动，它使得非言语交流成为可能。

互动的特征性

互动分析考虑交谈这个特征性范畴，即固有的言语互动。

我们已经看到，对话作为本质上的他律，从属于它的最终目的和外在的交流关键。就像格赖斯强调的那样，所有的对话至少都有一个目的[3]。一下子就接受的或是通过协商所接受的目的，解释了互动并给互动确定了一个行为框架。例如，在一个断断续续的会话中，发言的顺序是经过协商的，交互主题的选择则是为了吸引对话方的注意力。警察做质询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发言顺序是被预先确定的，主题是被强加的，从不涉及吸引对话方的问题！交流的最终目的和关键既涉及了人际关系，也涉及了他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行为，交流的最终目的和关键直接决定了对话的性质。

然而，在分析时为了避免严重的混淆，从交流中分离出言语片断（le moment langagier）是很重要的，这些言语片断被看作符合特别限制的互动的特征性形式。言语行为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通过媒介，以改造客观现实为目的：通过信息交互引起他人的行为。船长发出的报警消息“船要沉了”产生了由全体乘客实现从船上撤离的这个脚本。在这种情况下，既然非言语的反应——如果活动被正确完成的话——几乎自动地符合语言行为，那么“对话”就被简化为最小。但是，在说服他人、使他人相信、威胁他人等情况中，为了

---

① 通过强调理论的作用、理论内部的论战作用，我们可以发展关于科学的对话体概念，cf. F. Jacques，*L'espace logique de L'interlocution*，chap. XI，p. 461－497。但是，更应该将互动范畴和交流约束交叉起来：实验规程和“制造现象”的技术的作用，社会和历史的限定（支配着价值的关键和体系），经济担保和研究政策的选择，甚至当分析达到一定的精密等级时还要考虑研究者的心理状况。每一种科学都根据互动、交流的进程对“客观现实的像”做出贡献。

② 例如，“轮船要沉了”描写了一个非语言的行为，它的主体不是话语行为的施动者，cf. *supra*，chap. Ⅲ.

③ 客厅中的会话也逃不脱出这个规则，简单来说，它的目的是纯粹的寒暄：这里只涉及交流的主体间范畴，而不涉及客观现实内范畴。

获得他人的反应，对话变得更加复杂。言语的迂回以文化为基础可以或长或短，或复杂些或简单些。对话的不同形式的特点可以被描述为复杂的合作策略，这些策略由严格的或没那么严格的规则来支配。突出的问题在于要满足我们的第三条标准，也就是说要解释互动所固有的动态性，以及对话体进程的规则。因此，虽然不能声称给这个棘手的问题带来最终的答案，但我还是推荐一个用来研究互动的方法——投射研究方法。

投射研究方法

在对话的完整形式中，也就是口头对话中，对话使用了发声媒介——言语。然而，言语和唱歌不同，它的表达不允许暂时性的卡农[①]和重合。由此可知，互动由对话体行为的交替规则来控制。常人方法学（ethnométhodologie）对于轮流发言中的交替所进行的分析解释了对话的表层结构[②]。但是最小的结构限制是建立在表层对话形式上的，它不能够分析对话体本身的进程。

在交流框架内，互动根据自身的约束而展开。和暴力的野蛮发作这些行为相反，对话在它所有的形式中（包括争论、谈判、讨论、辩论、舌辩、论战、争吵、笔战等）都假设了在互动固有的目的、脚本和策略上进行合作的一致性。这并不是说对话体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一致同意，在意图上、相信上、价值观上建立一致性[③]。即使当不一致同意占据主导地位时，争论双方只要接受纯粹的言语对抗规则，只要不变成真正的斗士，开展对话体游戏，那么对话就能继续。自此，对话双方都愿意共享互动模式[④]。这种模式，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⑤]，用来规范对话体进程，评价每次发言的对话体功能和可接受性。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具有一定可预见性的对话模式是有可能的。这样的模式起到了互动脚本的作用。我会在下一章中指出基本的信息性对话——例如向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询问信息——是如何由投射模式控制的。投射

---

① 译者注：卡农（canon）是一种音乐谱曲技法，和赋格一样是复调音乐的写作技法之一，也是利用对位法的模仿技法。卡农的所有声部虽然都模仿一个声部，但不同高度的声部依一定间隔进入，造成了一种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效果。轮唱也是一种卡农。

② Cf. E. Goffman, *Façon de parler*.

③ 哈贝马斯的错误在于将这种促使和解的情况看作是“言语的理想状态”。哈贝马斯认为在这个理想状态中，至少在理论上，人们凭借理性争论可以建立一个社会性的一致同意。

④ 这里所说的模式只有说明功能。作为对话者的对话体能力的体现，模式保证了互动的导向。模式的投射特点：根据目的，模式确定了对话双方的预期和反应。

⑤ 进行选战的时候，电视辩论的规则是预先需要明确、仔细协商的对象。关键明显不在于理论或实际上的一致性，而是人与人的对抗，cf. A. Trognon & J. Larrue, *Pragmatique du discours politique*.

模式像暗含的脚本一样发挥作用，从属于对话双方的沟通能力，先验地支配着他们的对话体行为表现。从对话双方一开始就共享的这个模式可以预见到恰当的互动，这些互动保证了对话的趋同（convergence），相反，这个模式也可以衡量对话的趋异（divergence）和可能的失败。

然而，明确的是，这样的模式只对仅含有信息传递的对话有效。还有些对话其关键实际上在于对话双方的共建和他们就客观现实的共建（例如，概念化的任务），考虑这些对话则需要其他更为复杂的模式化。互动策略从不是预先确定的，以至于对话可以联结或插入多样的序列（séquences），例如语义解释的元语言序列、论辩序列等等。

但是，我们的模式化在教学上体现出了好处，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说明对一些基本方法论的选择：整体互动（interaction globale）、互动行为（interactes）、基础行为（actes élémentaires）。

（1）作为活动的言语互动，本质上表现为投射。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来源于这样一个计划：人类活动组成了实现目的的意图。因此，它属于“目的论”的解释：行为的目的是行为存在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对话体进程是投射性质的。在外在交流约束的基础之上，对话根据每个对话者就自身所接纳的最终目的、主题和对话体策略所实施的投射而展开。投射模式提供了对话体互动的一般框架。

（2）在这个框架里，为了形成互动行为，对话体进程展开为相对应的话语行为和话语反应①。对话者的每一次发言在对话的投射空间内部都组成了行为命题（proposition d'action）。

听话人的反应就是认可或不认可这个命题，确认或不确认这个命题所提出的互动选择。我们看到，反馈（rétroaction）在控制和调节对话体进程方面起到了作用。但是，反馈相对于前馈（proaction）来说是第二位的，前馈是目的论的预期，由说话人的第一个命题组成②。如果将次序颠倒，我们就不能解释对话体的动态，仅能涉及事后（post festum）的结构性描述。因此，对话的动态就在于互动投射框架内互动行为的反应性适合（adaptation réactive）。

（3）语义分析所说的基础行为，也就是话语行为。只要话语行为实际的对话体功能不具有特征性（实际对话体功能主要依赖于话语行为在对话中的地

① 维特根斯坦对于“言语游戏”的定义至少在语用学上考虑了这个基础性事实。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讨论这个问题，chap. Ⅷ.

② 也许可以用投射观点来重新解释特罗尼翁（A. Trognon）和布拉萨克（C. Brassac）所说的“会话的连贯性”（enchaînement conversationnel）。

位、承担话语行为的说话人的角色和所采用的策略），那么话语行为就只是理论抽象。因此，我们区分了话语行为的抽象定义（从属于分类，cf. *supra*，chap. Ⅲ），并分析了话语行为在互动进程中所起的对话体功能。换句话说，话语行为只有作为互动行为才能在对话体进程中得到有效实现。

这一点在解释“断定”时表现得特别明显。根据语义学的正统观念，断定假设为断定力符合完整的言内内容，也就是说，符合可能为真或为假的命题[①]。人们不能够断定一个简单的专有名词，一个单独的限定描述，甚至是一个孤立的指示成分。但是，嵌入对话体进程的这些词却可以在互动中承担“回答”的语用功能，而且还可以作为真正的断定表现出对话体价值。我们试举一例：

安提斯泰尼（Antistène）：啊！谁可以将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第欧根尼（Diogène）（晃动着匕首）：这个。

安提斯泰尼：我是说从痛苦中解脱，并不是从生命中解脱[②]。

虽然安提斯泰尼作为高尔吉亚（Gorgias）[③] 的学生，对第欧根尼[④]所提出的极端解决方法并不满意，但是他对第欧根尼所使用的指示词“这个”并不感到惊讶。《从问题和回答出发》（*De la question et de la réponse*）的作者安提斯泰尼和后来的斯多葛学派的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⑤] 都认为，只要互动框架能暗含地保证所需的完备性（complétude），词语的语义非完备性不一定会阻碍其在对话中承担“回答”的语用功能[⑥]。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中，互动框架就是交流情境。

从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现代语用学家忘记辩证学的古代前辈们的经验是

---

① Cf. Searle, *Sens et expression*, chap. 1, p. 53：“判断断言的最简单标准：是否可以将其（特别是）从字面上描述为真或假?”

② Cf. Diogène Laërce, *Vies*, *doctrines et sentences des philosophes illustres*, vol. 2, p. 12.

③ 译者注：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 483—前 375），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著名的智者。他是西西里岛雷昂底恩城人。高尔吉亚继承了恩培多克勒的学说，认为感觉是由自然物发出的流溢物进入人的感官孔道而产生的。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对“非存在”的论证中。

④ 译者注：安提斯泰尼创立了犬儒主义，其学生第欧根尼（公元前 404—公元前 323）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

⑤ Cf. *ibid.*, liv. VII, p. 118. 斯多葛学派认为，“苏格拉底在写字”是个完整表达（*ibid.*, p. 72），而“苏格拉底”是不完整表达。但是，人们可以用“苏格拉底”来回答“谁在写字?”这个询问。询问/回答这样的问题架构是由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开创的，cf. *ibid.*, liv. IX, p. 186.

⑥ 我们注意到，对问题的回答所具有的语用功能同时保证了词“是”和“不是”的完备性，甚至更极端一些说，保证了沉默的完备性！

没有好处的！

五、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指出了轮流发言的对话交替这个纯形式标准的不足，而后概述了对话体的定义，虽然并没有做太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对话体探索的复杂性。

通过将交流的最终目的——既是主体间的最终目的也是客观现实内的最终目的——和规范好的投射进程的互动特征性交叉起来，我们勾勒出了语用学上分析对话体的主线，同时我们提供了评估不同对话类型的标准。

就这样，我们加入到批判"美诺的对话"的语言哲学家们的行列中。尽管"美诺的对话"有着完美的对话形式，但从互动的层次来看，它绝没有表现为不可预见的口头交互，而是来源于复杂的（sophistiqué）书面制定；从交流的层次来看，为了有利于巩固和奴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偷偷摸摸地提出了他自己的世界观，这和苏格拉底作为提问人的"博学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相去甚远。

然而，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能够在另一个极端上分离出"真正的"对话，这种对话可用来认识客观现实以及认出人类的终极探索和基础探索。言语互动的对话性（dialogisme）应该是一个度的问题：人际关系可以是深入些的也可以是浅一些的，在制订客观现实的像时所做的更新可以大一些也可以小一些，互动的策略可以复杂些、交错些也可以简单些、单一些。人类的各种沟通互动形式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沟通行动总是或多或少地依赖于策略行动、修辞的辩证法、色情所推动的疑问（L'érotétique de L'érotique）。从这层涵义来看，美诺的对话是将互动搬上了文学舞台，互动的策略和修辞方面完全是用来提出哲学关键和哲学选择的。

我们所提出的对话体的行为研究方法解释了对话体探索的丰富性，但是我们不把对话体放在一个能够直接达到真、美、善的理想位置之上。无论人际间的对话多么丰富，它也只能是人类的活动，纯人类的活动。

第六章　信息性对话的投射模式

“命题的涵义就是它的最终目的。”
——维特根斯坦

就像在前文中所看到的那样，关于对话的思考不是什么新内容了。它至少可以追溯到迈加拉学派的“辩证法”分析。至于对话体的实践，则可以追溯到蒙昧时代。然而，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引出了人类之间的新型对话形式。特别是自 20 世纪以来，我们的科技社会增加了许多传播工具和沟通工具。主要涉及对距离的控制（电话、电视、电传、传真、互联网等等），以及参与者潜在数量的大大增加（大众传媒）。虽然这深深地改变了社会讨论形式，但交互仍然是在人与人之间、在人类施动者之间进行的。然而，20 世纪中期人工智能的出现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形式：“人机对话”。转变的不仅在于媒介，而且在于对话者的性质：被称为“智能的”计算机。

如往常那样，这样的创新可以用隐喻形式表达为：应该询问一下，还应在哪层涵义上来谈论对话，机器在哪些方面可以和真正的对话者进行类比？我们会在下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将会准确考察人工智能问题架构中对话体能力所起的关键作用。过去，我们都愿意指出，“人机对话”的某些基本形式作为实验室的产物，可以研究前文所提到的对话体进程的模式化。人机之间基本对话的研究证实了（如果还有必要证实的话）针对对话体实践的行为研究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我们提出了投射模式，这个模式分析了参与信息性对话（dialogue informatif）的对话双方的沟通能力。

计算机的传统优势之一就是它的存储能力。一个机器为了回答使用者对于信息的请求，可以储存一大批它能够管理的资料。因此，人们可以建立或简单些或复杂些的信息管理系统（资料库/知识库），但是另一个问题在于“界面”（interface）或者说机器和使用者一起承担或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回答游戏的能力。出于人机工程学（ergonomie）的考虑，这方面最具野心的目标在于：建造一台机器，这个机器可以创建一个与使用者进行的尽可能自然的口语

对话。挑战在于哲学上的恰当性，因为，相对于毫无约束的口语交往的自发性，现在用来传达信息的键盘和鼠标只是一个权宜之计[①]：对话主要是口语现象（cf. *supra*，chap. V）。不幸的是，这样的挑战还是超出了目前的技术可能。

计算机的声音控制并没有真正地实现人机之间毫无约束的口语互动。我们可以认为，当前的机器不能够“说话”（parler），这也就排除了它们能够进一步“对话”的可能性！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还没掌握会说话的机器（machines parlantes），但是，还是有一些很有前景的研究，它们以假设实际解决了计算机的言语处理问题为前提，研究了“人机对话”，其明确的研究目标是将机器的对话体行为表现进行模式化。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很简单，通过人类模拟机器的言语能力！奥兹国的魔法师（Magacien d'Oz）[②] 所说的技术就是这样：根据确定的约束，让不可见的同伴将机器发给使用者的信息大声说出来。然而，这种像托词的掩饰（dissimulation）却属于人工智能的经典方法论：当人们还不能使一个功能信息化时，人们就暂时借助于人类施动者来模拟。在具体的情况中，可以将机器和人类使用者之间的口头对话作为研究客体。因此，人机对话的领域成了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重要特征性领域[③]。

在这个掩饰的范畴内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人机对话明显具有人工的特点。它在实验室内实现，构成了直接来源于试验规程的“人造物”（artefact）。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认为，虚假对话和真正的对话主义毫不相干，这足以取消它的资格。恰恰相反，我们却认为只要试验情形允许在互动进程中完全控制相关的参数，那么它就表现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客体，当然这是以牢记研究客体的人工特点和我们所得出经验的恰当性限制为条件的。从这层涵义来看，有关计算机的模式化提供了一个用来观察基本对话形式和特征性对话形式的优先平台。

一、信息性对话中的交流约束

为了考察对话的基本类型，我们选择从下面这个视角出发：就资料库（une base de donnée）的计算机进行询问。在这里，我们有着最小的对话情形，就像在实验室中一样，可以分离出一定数量的确定整个信息性对话的因

---

① 这完全没有解决人机工程学的问题：口语媒介的运用在某些情形中可能有很大的弊端。

② “奥兹国的魔法师”是鲍姆（L. F. Baum）所写的儿童故事《奥兹国的魔法师》，即《绿野仙踪》中的人物。关于这个方法论，cf. N. M. Frazer & G. N. Gilbert, *Simulating Speech Systems*.

③ 这个问题架构的入门，cf. Gérard Sabah, *L'intelligence articicielle et le langage, représentation des connaissances*, vol. 2, chap. 10：《Modèles de dialogue》, p. 283-316.

素。这种对话类型，和所有的询问一样，都应该根据交流和互动这两个范畴来分析（cf. *supra*，chap. V）。

对于“人机对话”所包含的主体间交流方面的研究，我们放到下一章中讨论。在这里我们建议先着手讨论客观现实内的交流（行为关键和最终目的），特别是要概述一下对信息性互动进程的模式化。

首先研究一下交流的约束。我们认为，所有的对话都服从于交流的关键，它为对话确定涵义：意义和最终目的。当然，这条原则应该根据所涉及的对话类型的具体情况而灵活调整。断断续续的会话、客厅的闲聊、电梯里邻里间的交互，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最终目的都是寒暄，是主体间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客观现实内的最终目的。这里所涉及的与邻居、宾客的交谈是为了会话的愉快，而不是为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完成任务（tâche）。

另一个极端，哲学辩论、艺术家之间的讨论、科学论战都表现为高级的、自主的对话体实践，也就是说，这些对话体实践摆脱了平庸的交流约束。这些高文化的对话形式追求对真和美的认识、对理念的纯粹沉思。事实上，它们表现为复杂的言语迂回，这些言语迂回最终归属于平凡的交流关键。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作为无私沉思（contemplation désintéressée）的知（savoir），这种理想是不会实现的！

信息性对话和众多只有寒暄功能的对话形式，以及同样多的最高尚的言语结构不同，信息性对话即时地从属于客观现实内的最终目的。信息缺失所产生的对话体行为，其价值是为了非言语行为而寻求知道。因此，对资料库的询问很明显地组成了他律的活动，其最终目的属于非话语性质的外在目的。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人们不会只是为了想要知道时间而去询问报时钟，询问报时钟是为了制订行为计划。对话体活动明显嵌入了一系列的非言语行为之中。自此，信息性行为就由更一般的行为情境来确定。说话人的意愿就是为了行动而想要知道信息的欲望①。

这在技术上表示为，我们在与“由任务引导的”② 对话打交道，这样的对话使用“可操作性言语活动”（langage opératif），其句法特别是（贫乏的）语义直接由交流目的确定③。根据更一般的行为原则再次阐释对话过程中产生的话语行为，我们强调这种再次阐释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言语行为只有指向过去

① 超言语交流和言语互动紧密交错在一起是很常见的情况，例如买电影票时：——买两张票（同时递过去一张 100 法郎的钞票）；——80 法郎（同时找回零钱）；——谢谢。

② Cf. Jean-Marie Pierrel, *Dialogue oral Homme-Machine*, p. 160.

③ Cf. Pierre Falzon, *Ergonomie cognitive du dialogue*.

的和未来的非言语行为时才会有涵义。自此，话语行为由行为计划和/或脚本（描述了话语行为所在的行为框架）来确定。“任务模式”（modèle de la tâche）以明确约束、向对话双方所产生的推论提供必要信息为目的。因此，任务模式看上去就像是，根据行为的计划化或方案化，或者根据背景中——所有的对话体交互都建立在背景之上——合乎规定的限定部分所具有的脚本，而进行的计算机解释。人机对话的人造特点明确地来自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任务是被明确标出范围的、被精确限定的，所以就相对有可能掌握所有涉及的知识和需要的技能，这些原本可能是无限的。

言语互动再次处在了交流的视角之中，它根据参与者的意图、目的和计划而拥有涵义。因此，对资料库的询问就采用了指称对话（dialogue référentiel）的形式，其策略是已知的。例如，阿伦（Allen）和佩劳特（Perrault）就从任务模式出发依据信息请求分析了一个信息性对话，这个任务模式通过出发和到达的时空坐标定义了火车，通过乘火车和等火车的行为定义了使用者的潜在目的，信息请求所涉及的则是通过描述火车来进行辨认[①]。在这些条件下，机器的整个策略就在于反向展开，从赋予使用者的目的追溯到为了达到目的而需要的行为和知识。在这样一个推论策略中，可以直接考虑到障碍，并在没有明示请求的情况下就提出解决方法[②]。

再来看一下卢扎蒂（Daniel Luzzati）所提出的例子：汽车抛锚后寻找修车厂[③]。机器可以推论出：如果故障严重或者故障还会再发生，那么寻找修车厂就会结合寻找附近的酒店或者寻找可能的火车班次。同样，对于问题的否定回答也可以有步骤地结合替代命题，这些替代命题可以通过未考虑过的途径达到假定目的。当问“今天上午有没有高铁去巴黎”，回答可以是“没有，但是你可以乘 7 点 22 分去里昂市巴迪火车站的火车，然后换乘 9 点钟的高铁去巴黎”。因此，只有对这样的已知交流条件进行推理才能弥补一般提供的言语信息的贫乏，才能解释经常性的省略现象、含糊现象、歧异现象，甚至可以考虑到对话双方的预设。

---

① Cf. James F. Allen & C. Raymond Perrault, *Analysing Intentions in Utterances*.

② 译者注：根据 James F. Allen 和 C. Raymond Perrault 所提理论，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解释：“——最近一班去苏州的高铁几点开?；——9 点开，36 元。”由于机器掌握了请求信息人的目的，即买最近一班去苏州的高铁车票。通过反向展开的策略，机器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买票人需要知道火车的出发时间和票价。但是买票人只询问了出发时间，并没有询问票价，这个时候，机器就可以直接考虑到障碍，并在没有明示请求的情况下就提出了解决方法。

③ Cf. Daniel Luzzati, *Un modèle dynamique pour le dialogue Homme-Machine*, exemple 8a, p. 285.

二、信息性对话的投射模式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者和机器之间被模拟的交互所固有的互动范畴。对话双方之间建立起的对话体关系具有合同价值，并且假设了对于理性原则和合作原则的接受①。我们还要加上一句，言语互动由对话模式来支配。我们之所以用“投射”这个词来定义这个模式，是因为它不仅有理论解释的价值，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对话体交互所产生的动态功能。投射模式作为从属于对话双方沟通能力的暗含脚本而运转，它先验地控制着对话双方的对话体行为表现。对话体策略的发展，对所有机能障碍（dysfonctionnement）的制裁，都来自这样一个投射模式。

我们觉得在基本的信息性对话，即对资料库的询问这个限定情况中，这样的投射模式是特别合乎规格的。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中，情形是非常简单而又明确的。在结构上，我们所应对的是唯一的媒介——交互言语，以及仅有的两个参与者。他们的角色是不对称的：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想要知道什么。在功能上，目的是唯一的——获得信息，主题被准确定义（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时刻表等等），并且对话的展开严格地遵守轮流发言的顺序。同一个互动情形支配着特征性的对话体举止（conduite），对话双方对其的认识控制着动态最优化的对话策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在于建立一个投射模式作为对话的动态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用来实时地控制机器参与对话体进程的举止。为了让机器能够（通过同伴）承担信息员的对话体角色，对话模式组成了对于所必需的最小值的对话体能力的计算机翻译。

卢扎蒂不久之前提出了一个对话的动态模式，我们完全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模式的方法论预设②。

首先，作为“动态”模式，它摒弃了曼彻雷（Moeschler）③所提出的“对话体阐释原则”（principe d'interprétation dialogique），根据这个原则，对

---

① Cf. H. Paul Grice, *Logique et conversation*. 合作原则可以细化成四条准则（“不要说得太多也不要说得太少”“要真实”“要说相关内容”“要清楚”），合作原则提供了会话规则，在说话人有意识侵犯这些规则的时候，听话人方面可以修复暗含提出的信息得到言下之意（implicature）。在信息性对话中最终目的是被明确分享的，并且我们认为最终目的限定了对话的投射模式，这就使得格赖斯的分析在信息性对话的情况中变得特别的恰当。

② Cf. *Recherches sur le dialogue Homme-Machine*.

③ 译者注：曼彻雷教授的简介参看 http://www.unige.ch/lettres/linguistique/moeschler。

于听话人反应的解释提供了对于说话人介入（intervention）的解释[1]。机器在立刻回答之前，应该对使用者的介入所具有的涵义做出假设，但它不一定掌握这个使用者其后的回答！对已完成对话的书面上或视频上关系的“过后解释”和“实时”的计算机约束毫不相干。

其次，如果说对资料库进行询问的对话约束就是严格遵守轮流发言，那么这将导致抛弃就“跨越了轮流发言”的话语行为所进行的分析[2]。因此，对陈述内容的分析就从属于对它们固有对话体功能的研究。

卢扎蒂用一个双坐标轴的图形明确解释了对话的展开：

（1）横向“支配轴”（axe régissant），主要的问题和回答（QP/RP[3]）理想化地连接。

（2）纵向“插入轴”（axe incident），插入的问题和回答（QI/RI[4]）提出了一个深化，这个深化的形式为要求更明确表达、解释、确认、精确等。所有的技巧都在于掌握这种插入，在需要时让机器更明确地表达或者重申使用者的要求，甚至是通过要求整个插入序列的再次启动而使机器被迫回到先前的层次。

卢扎蒂所提方法的整个目的就在于控制对话体进程，从而避免在交互的奥妙中（会导致完全的不理解）作茧自缚的机器闹出笑话来，就像使用者请求开启的饶有趣味的对话那样[5]（如图 6－1 所示）。

---

① Cf. Jacques Moeschler, *Modélisation du dialogue, représentation de L'inférence argumentative*, p. 94.

② Cf. Luzzati, *Recherches sur le dialogue Homme-Machine*, p. 357 & 360.

③ 译者注：QP 是指 questions principales（主要问题），RP 是指 réponses principale（主要回答）。

④ 译者注：QI 是指 questions incidentes（插入的问题），RI 是指 réponses incidentes（插入的回答）。

⑤ Cf. Luzzati, *Le dialogue verbal Homme-Machine*, p. 44 ; *Un* modèle *dynamique pour le dialogue Homme-Machine*, p. 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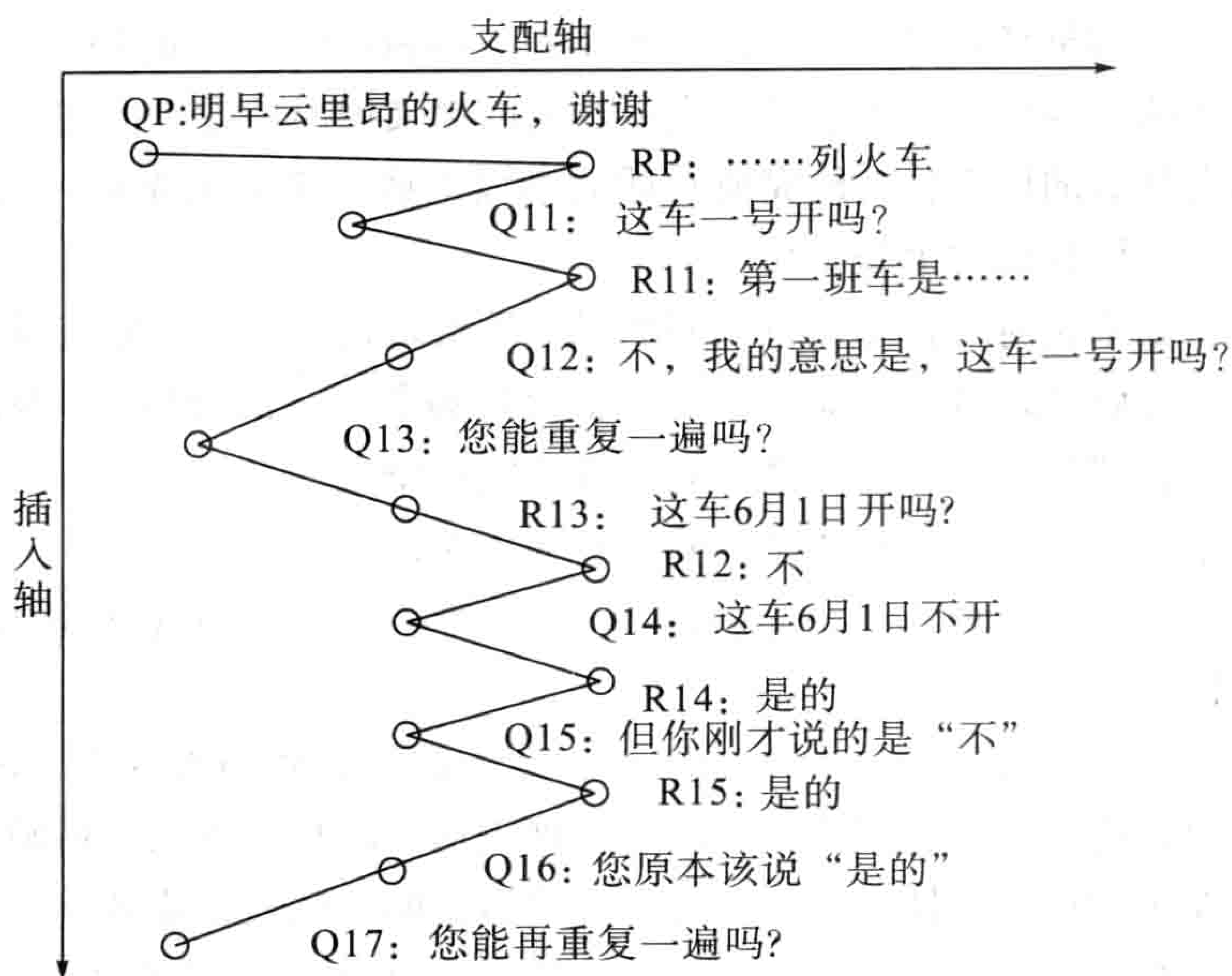


图 6—1　卢扎蒂关于误会例子的模式

首先在方法论的选择上，根据对话的动态管理的最终目的，我们建议修正卢扎蒂的研究方法，我们既要考虑对话双方的对话体角色的特征性，又要考虑话语行为的对话体功能的特征性。一个问题或一个回答并不存在于自身，而是组成了互动行为（interacte），互动行为在对话的一个既定时刻，并且根据说话人的对话体角色而拥有涵义。对话的动态模式的目标为：勾绘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授权了对于对话的固有对话体解释。

所有基本的信息性对话都建立在对话双方的初始区分之上。从信息性方面来看，对话双方的角色是严格区分的、不对称的：说话人希望得到一个听话人能够并且愿意提供的信息。一个是“请求者”（demandeur），另一个是“回答者”（répondeur）。“提供信息的极性”（polarité informationnelle）决定了这类对话本身的可能性。我们另外注意到，从提供信息这个最终目的来看，回答者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请求者向机器询问就像人们向圣贤咨询一样[①]。而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缩小这种初始差距，为了最终满足对信息的初始请求而建立语义趋同（convergence sémantique）和指称趋同（convergence référentielle）。我们要补充说一句，为了使对话尽可能的自然些，机器选择合作策略，它让使

① 相反，论证类的对话则是由提出者的一个断定开始，这个断定受到反对者的质疑（以问题的方式）。有关论证策略的建设性逻辑的模式化，cf. G. Heinzmann, *La logique dialogique*.

用者自由地表达他的请求，而不是以指令的方式展开，用接二连三的问题来纠缠使用者①。

在图表上，我们建议用翻转的V型或者说翻转的漏斗型结构来再现这种趋同（如图6-2所示）。从最初在信息上的不同开始，理想上语义场和指称场应该逐步地减小，以达成最终一致：对信息的共享。

图6-2 信息性对话的投射模式

这类对话的“最小方案”可以简化为三个介入：

（1）请求者陈述了他对信息的请求：“几点了？”；

（2）回答者提供了所期盼的信息：“17点40分。”

（3）请求者在评估之后接受了信息：“谢谢。”

然而，信息的趋同一般来说只有在更为复杂的进程之后才能达到，在进程的过程中初始请求根据附属请求而变化，对信息的提供也变得明确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左面区分出了针对请求者的请求线（ligne des demandes），在右面区分出了针对回答者的提供线（une ligne des offres）。因为严格地遵守请求和提供之间的话语交替，对话体序列根据在进展轴（axe d'avancement）上表现出的、由介入次数数字化的时间推移而展开。包含 n 次介入的序列包括了 $n-1$ 次的交互，第 $n-1$ 次的介入提供了所希望的信息，并位于请求线和提供线的交汇点上；最后的那个第 n 次介入表示对信息的接受，它位于进展轴上，同时在横坐标上标明了一致点（le point d'accord）。

对话体角色

当然，我们刚才描述的趋同进程构成了一个引领对话双方的理想模式，但

① 卡兰（Jean Caelen）区分了六种可能的策略：指令的、反应的、协商的、合作的、建设性的、由意图指引的，cf. *Interaction Homme-Machine : théorie et pratique*.

对话的实际开展还需引入趋异因素（phénomènes de divergence）。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不可避免的插入干扰。附属互动（intéractions subordonnées）的序列由此展开，例如对话体角色的翻转：机器由于没有理解请求而站上了请求者的位置，使用者则成了回答者。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区分不同的趋异类型的同时，也要根据赋予对话者的角色从对话体上区分请求者或回答者，并且根据他们的重心度（degré de gravité）将他们区分开来。

请求者

我们首先来看单独的请求者。除了最后那个有着断定价值的介入（表达对所提信息的接受），请求者的基本对话体角色在于发表对信息的请求（demandes d'information）。这个对话体角色可以支配分析，特别是支配对介入的言外之力的阐释，尤其对于间接现象的情况[①]。

请求者所发出的陈述“下午两点我要到达巴黎”，具有对信息进行请求的对话体功能，它不被立即解释为直接断定行为（提供一个简单的信息），而是被解释为间接询问行为：“哪班火车可以让我在下午两点到达巴黎?”同样的对话体必要性解释了将所有类似“您能告诉我下一班去格勒诺布尔的火车的出发时间吗?”的问题转变为对信息的间接请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请求者的所有陈述都具有请求信息的实际功能，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请求者也可以在对话过程中产生趋异的介入，趋异介入的间距不仅可以用度来衡量，还可以用性质来衡量。人们可以不断增加这些趋异的类型。我们只以探索的名义来列举两个：

（1）比起信息的初始请求或附属请求（从对话体的角度来看具有提问的力量），请求者首先能够发出我们建议叫作“接话”（réplique）的东西，它具有断定的言外价值，在“接话线”（ligne des répliques）上聚集了各种回答、反应、评论，相对于请求者所介入的理想询问进程，它表现出实际上不可避免的间距、迂回。这条接话线拥有趋异的度，这个度随着交互次数的增长而增大：越接近对话的结尾，请求者就应该越少接话。

（2）当然，也可以出现更严重的趋异。我们将具有询问（interrogation）这个言外价值的所有行为总称为“疑问”（mises en question），它们在对话体功能方面不再是对信息的请求，而是表现为对回答者的呈请的不理解、拒绝，甚至是对回答者的预设的否决。“疑问线”（ligne de mise en question）在更左

---

① Cf. Searle *Sens et expression*, chap. 2, p. 71－100. 陈述“你能够到盐吗?”可以被“直接”解释为一个简单的问题，或是被“间接”解释为请求递一下盐。

边展开，标出了请求者可接受的趋异界限。

通过疑问，人们可以达到暗含信息的层次，这些暗含信息要么来源于蕴含、言下之意或采纳的预设——为了一开始就让人接受（“不要提问”），要么来源于对话过程中默认的推论。这个层次上的分歧直接使对话的继续陷入了危险。

回答者

现在我们来看看回答者。相对于请求者的对话体角色，初始的信息极化表明了回答者的对话体角色的镜射特点（caractère spéculaire）：提供所请求的信息。这里的“提供线”集中了断定行为，信息通过这些行为被告知。这种不对称（asymétrie）既表现在趋同的进程中，也作用于趋异的进程中。

（1）既然请求者可以接话，那么回答者就可以发出呈请（requête）。在回答者的“呈请线”（ligne de requête）上，我们可以找到具有询问这个言外之力的各种介入，它们的对话体功能是向请求者提问以获得请求者进一步的确认、重复、解释、更明确和更精确的表达等等。既然在提供信息之前回答者要先搞清楚请求的确切涵义，那么实际上这类趋异就不可避免。当然，这类趋异应该随着对话的展开而减少，线上的趋异度将随着交互次数的增长而增大。

（2）还剩下最后一种更为严重的趋异，我们把它叫作“质疑”（mise en cause），它集中了具有断定这个言外之力的介入，它们的对话体功能是对请求者的介入“提出异议”（contester），在有限的情况下，它的对话体功能还可以是通过预设加入不相容的陈述。譬如说，当请求为：“去 Viâpre 的高铁几点出发?”机器回答说：“没有去这个目的地的高铁。”

通过呈请线和质疑线，人们可以获得趋异的第二个区域。这个区域由左向右，和请求者的区域方向对称。我们不再探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形式化的细节，我们只是明确一点，每一个介入都是由一对值来定义的：

第一个值是“进展变量”（variable d'avancement）：指进展轴上的介入次数。这个变量可以方便地确定所涉及的是请求者还是回答者，因为请求者的介入拥有奇数值。

第二个值是“趋同或趋异变量”（variable de convergence ou de divergence），这要看情况。当行为处于趋同轴或进展轴上时，趋同变量的值为正，区域为对话双方所在点到趋同/趋异轴和进展轴的交汇点。趋异值为负，其测定对于请求者来说是从右向左，对于回答者来说是从左向右。

我们再来通过图例（如图 6－3 所示）看一下曼彻雷所举的例子①。

对话以回答者的纯寒暄功能的提问开始，值为＜1，0＞。它在趋同线上理想化地展开：通过秘书的回答，自＜5，1＞起达成一致。在＜6，1＞上请求者接受了回答，在＜7，1＞对话结束于一个寒暄功能的惯用语上。最后一轮交互的目的在于就互动成功达成一致，同时保证对话双方对交流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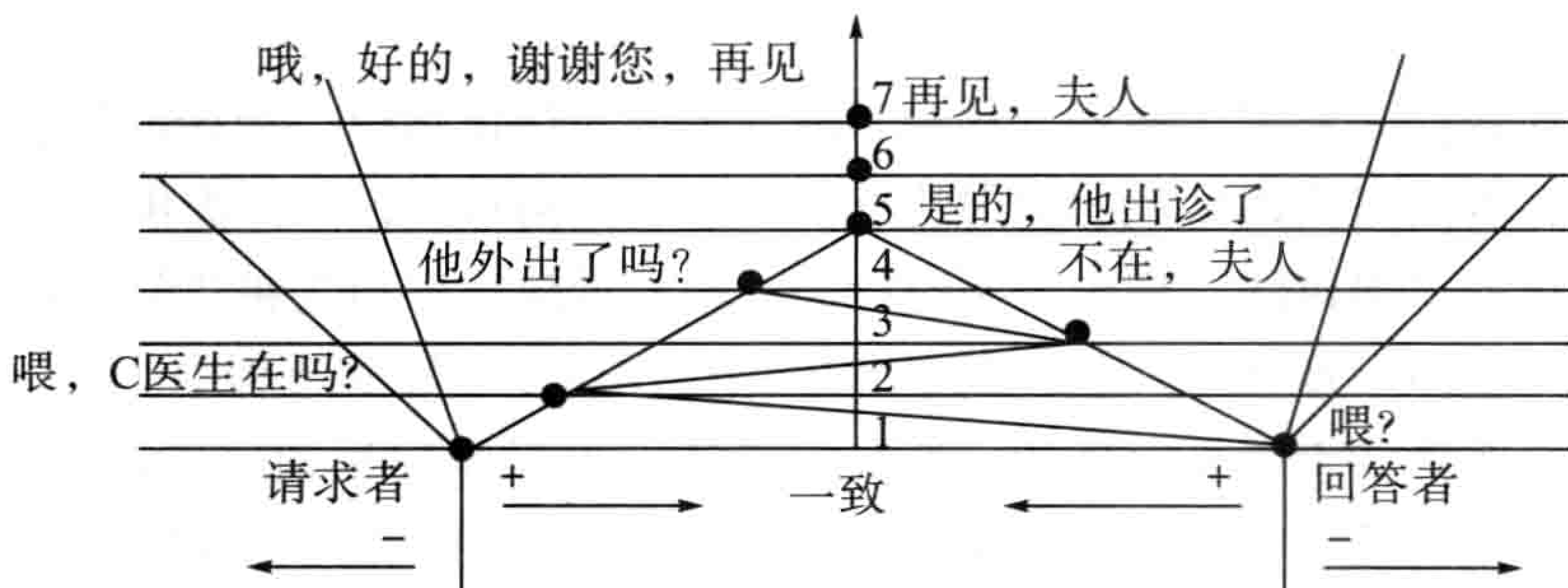


图 6－3　用投射的方式解释对话

我们在这里注意到，我们接触到了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主体间交流的成功和言语互动的成功伴随着的是客观现实内交流的失败。互动理想化地遵循着信息性对话模式，但是请求者的预期目标——和 C 医生通话——却没能达成。

因此，我们只有使趋异类型多样化，只有相对于回答者的趋异潜能表示出请求者的趋异潜能的对话体镜射，我们才能分析信息性对话。分析可以被精炼，但是我们提醒一个我们认为很关键的方法点：对于对话的动态研究不应该立足于对话语行为的观察。被抽象定义的介入的言外之力不足以确定它的对话体功能。请求者的一个具有提问这个言外之力的介入，在对话体上可以作为对信息的初始请求或附属请求而运作，并因此归属于趋同的进程，或者相反，拥有疑问功能（fonction de mise en question）并表现出巨大的趋异。

同样，具有断定这个言外之力的介入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对话体功能。它可以表现为回答者告知信息的简单回答、请求者的接话，或是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回答者的质疑。例如，如果请求者用一个问题——“去 Viâpre 的高铁几点出发？”开启一轮交互，那么回答可以是“12 点 46 分”，“接话”可以是

① Cf. *op. cit.*, p. 236.

"您问什么?"[①]，或者"质疑"——"没有去这个目的地的高铁!"这证明了：对话体功能由对话的信息性最终目的来支配，由理想化展开的投射模式来控制。

对话体的时间性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cf. *supra*, chap. V），对话是一个开放的、线形的过程。因此，所有的介入都由说出这个介入的人的对话体角色来定义，由这个介入在对话中出现的时间来定义。自此，每一个处在对话体进程中的介入都拥有了完全的独特性：两个产生在不同时刻的语义上不可区分的话语行为在对话体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是截然相反的。信息型对话的投射模式提供了正确处理"重复"（répétition）现象和"回声"（écho）现象的手段，这两种现象提出了对话的固有时间性（temporalité）。

重复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卢扎蒂所举的关于动物标本剥制师（taxidermiste）的例子[②]。根据我们所做的模式化，我们可以用图 6－4 所示的方案来再现这个例子。

请求者在 1 上明确表达了对信息的请求：动物标本剥制师的地址。回答者并没有提供所要求的信息，而是在 2 上发出了一个呈请。插入就在这里开始了。请求者由于回答者角色的改变而愣住了。他在 3 上的反应是对于回答者的对话体态度的一个疑问。这就导致了回答者在 4 上重复了他的初始呈请。我们注意到这里涉及的不是纯粹而简单的重复。回答者很小心地用"意思是（veut dire）"替换了"指（signifier）"。虽然语义上的转变很微小，但这种转变所表现出的动词标记的改变可能就证明了：回答者在进行准确重复时有考虑到不要显示出威吓性。怎样解释这样的重复？人们也许认为，应该把它维系在呈请线

---

① 译者注："您问什么?"这句话根据在对话体进程中所占位置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对话体功能。在这里我们提出两种解释：第一，如果这句话是由请求者发出的，那么它具有的对话体功能应该是对呈请的不理解或拒绝，即"疑问"（mises en question）。举个对话例子："——去 Viâpre 的高铁几点出发?（请求者）；——上午的还是下午的?（回答者）；——您问什么?（请求者）"第二，如果这句话是由回答者发出的，那么它具有的对话体功能应该是向请求者提问以获得确认、重复、更明确的表达，即"呈请"（requête）。举个对话例子："——去 Viâpre 的高铁几点出发?（请求者）；——您问什么?（回答者）"综上所述，原文中"您问什么?"这句话事实上是不能被理解为接话的。我们在这里换一个接话的例子："——去 Viâpre 的高铁几点出发?（请求者）；——上午的还是下午的?（回答者）；——下午的。（请求者）"最后这一句才是标准的接话。Cf. *supra*, chap. Ⅲ, § 4，也有一处相似的错误。

② Cf. Luzzati, *Recherches sur le dialogue Homme-Machine*, p. 377.

上。但是，回答者在对话的后一阶段感受到了重复呈请（几乎不做任何修改）的需要，这体现出了呈请自身并没有被理解或考虑（我们已经看到，在3上请求者的反应不建立在回答者的介入内容之上，而是建立在它的呈请功能之上）。将重复标在呈请线上就赋予了重复一个它明显不具有的趋同值。更恰当的做法是赋予重复一个更强的趋异值，将它向右边移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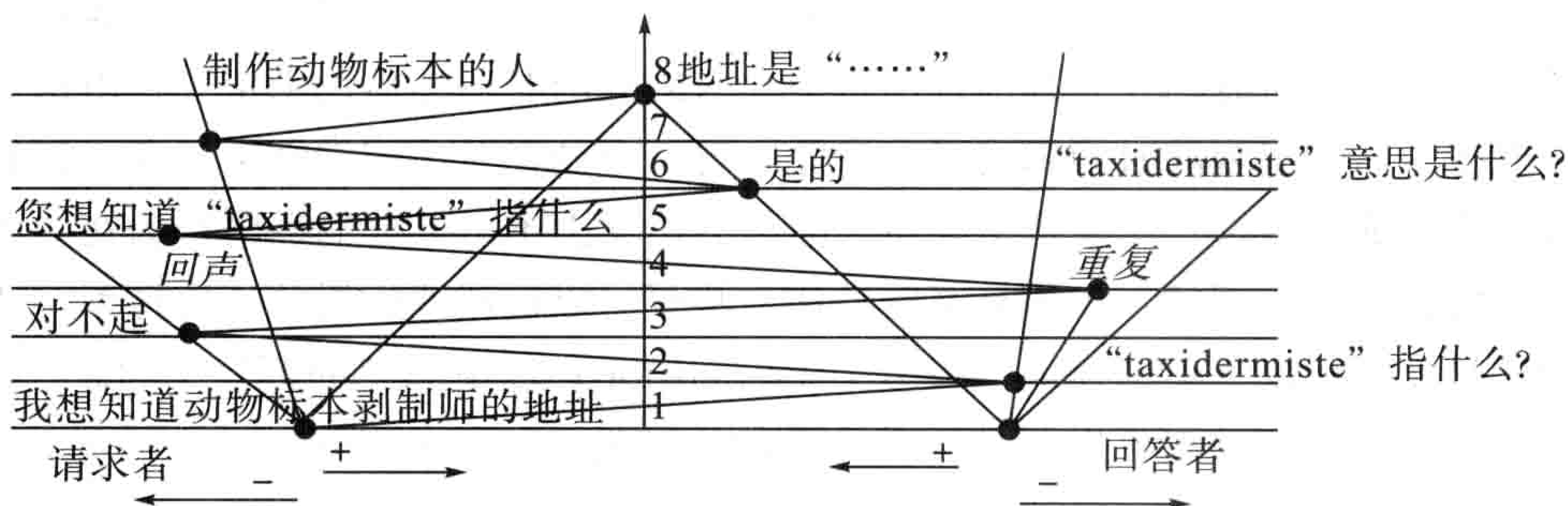


图6-4　对于重复现象和回声现象的投射解释

回声现象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回声现象，说话人重申了听话人的介入。请求者在5上重复了回答者在4上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重复了在2上的初始呈请。实际上我们注意到，请求者使用了“指（signifier）”这个词，而不是“意思是（veut dire）”，这证明请求者对于回答者的初始呈请所做反应的原因并不是语义上的不理解，而是面对回答者对话体角色的改变表现出的惊讶。在言外方面，请求者的这个回声介入保留了询问的言外之力。但是，很明显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处在趋同轴上的一个对信息的请求。提问并不针对对话的客体，而是针对回答者的对话体态度。因此这也不涉及疑问，回声的趋异值要弱一些，位于疑问线的右侧。

相对于直接告知信息这个对话的最终目的来看，如果请求者不得不就呈请的涵义询问回答者，那就会表现出趋异。但同时，如果请求者从惊讶中恢复过来，辨识了回答者的呈请涵义，那么就可以重树对话：在6上回答者确认了所提的解释，在7上请求者满足了相关呈请。自此，在8上回答者最终回答了请求者的初始请求！

和前面C医生的例子相反（图6-3），在付出艰苦的互动后，交流的目的最终达成了。事实上，这是一个由语义分歧造成插入的典型例子。很明显，请求者过高地估计了回答者的能力，没有考虑到回答者并不知道“taxidermiste”这个词的意思！一个对话体序列就这样展开了，在这个序列中发生了角色翻

转，完成了语义匹配。一个元话语过程介入了进来，元话语过程的关键在于"taxidermiste"这个词的意义。这就证明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元话语行为（actes métadiscursifs）在对话中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cf. *supra*，chap. Ⅲ）。元话语行为的介入可以调节、阐明对话体进程，介入 3、5、6 就是这样的情况，还可以保证趋同和语义上达成一致，介入 2、4、7 就是这样的情况。

三、模式的局限性

就像我们刚才所粗略描述的那样，我们觉得投射模式能够较为清楚地提供一个信息性对话的动态形象。在卢扎蒂所提的那些例子中，趋异类型的多样性似乎更清楚些。从这样一个模式出发，我们能够构建一个关于对话的最优管理模式，这个管理模式发展了一些策略，这些策略可以避免对话偏离到质疑和疑问这两个极端，可以把不可避免的趋异，即接话和呈请，重新带回到理想的信息请求线和提供线上。

毋庸置疑，针对言语活动的行为研究新方法，在提供分析方案方面表现出了长处，分析方案确保了语言固有信息和非语言信息之间的联系。因此，新的研究方法保证了任务的、使用者的、对话的、推理的等信息处理模式之间结构上的一致性。然而，我们不应就此得出结论：纯模型的处理方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只是试图证实信息性对话的实际展开依赖于投射模式，它将固有的对话体功能赋予言语行为。最终，这种模式可以给整个分析提供一个总的框架。

很明显，对于信息性对话的行为研究方法和投射研究方法，我们的建议是有前提的、谨慎的。这些建议不适用于严格意义上没有以任务为最终目的的会话，同样也不适用于更复杂的信息性对话，例如指称对话，雅克（Francis Jacques）将其定义为对话双方在共同寻求辨识所指对象时两者之间的实在对抗（confrontation）。在指称对话中，不仅有信息的传输，还有对信息的共同构建："信息被交换，被分享。但这并不是说言语活动是用来分享信息和告知信息的，指称话语中的言语活动是用来组成共同信息的。信息不是通过言语活动告知的，而是由言语活动组成的，言语活动将这个信息变成了共同信息。"[①] 在这类情况中，对话双方的角色、互动行为的对话体功能都不是在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而是在对话过程中变化的，因此，这类情况和简单请求信息相比，研究策略所遵守的约束要模糊很多。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用我们已经讨论

---

① Cf. *Dialogiques*, *recherches logiques sur le dialogue*, p. 210.

过的关于柏拉图虚假对话的内容（cf. *supra*，chap. V）来谈“人机对话”。“机”是指知的机器，人机对话没有别的最终目的，只是通过不可避免的趋异来明示机器的知（savoir）。我们在这里彻底颠覆了历史上苏格拉底的提问态度。如果说机器是“知”并且“回答”，那么苏格拉底就是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并且提问！

当前的研究只注重从属于最基本的信息性对话的人造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能贬低这类对话。如果对话的一般模式不能实际分析信息的单向简单沟通，又怎么能认为它是可行的呢？

从这里出发，我们已经能够在人机对话的框架中预见到更为复杂的互动形式，这些互动形式为了更为复杂的创造任务或设计任务而确保了使用者和机器之间的合作[①]。

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使得我们可以根据相关互动类型、所追求目的的交流价值来抽离出对话的特征性模式。明确一点，这些模式只是无限接近于实际的对话，例如我们所提的信息性对话。复杂的对话可以根据不同的序列来分析，这些序列一个接一个地涉及了信息性模式、解释性模式、论证性模式、谈判性模式等等。

---

① Cf. 例如奥兹坎（Nadine Ozkan），他研究了创作素描这个任务过程中的人机对话，*Analyses commnunicationnelles de dialogues finalisés*.

第七章　机器智能和其对话体能力

人类为了生存或舒适而发明的所有机器中，电脑毫无疑问是最特别的。这不仅是因为电脑通过授权对信息的自动处理从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战争方式，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电脑的出现将机器与智能的结合这个古老问题真正提上了研究议程。当麦卡锡（John McCarthy）发明“人工智能”这个词时①，他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出了一堆从此被大肆渲染的问题。假设机器是有智能的和能够思考的，那么这将又一次打击到人类的自恋②。除了这样一个假设必然要引起诸多想象之外，我并不想回答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我只是想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客观资料出发厘清问题的层次。

首先，我们将指出可以根据对话能力来考量智能；其次，我们将研究“人机对话”的内容；最后，我们将主张只有机器人才有可能表现出由语用约束要求的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形式，即控制着对话体行为表现的行为约束所要求的意向性形式。

一、针对机器的智能测试

重要的是要先确定可以将智能形式赋予机器的标准。对于这个初始问题，图灵（Alan Turing），计算机的创始人之一，从 1950 年起就用他著名的测试

---

① 麦卡锡在 1956 年组织了“关于人工智能的夏季研究计划的达特矛斯会议”，主要的与会者还有 M. Minsky，H. -A. Simon，C. Shannon，A. Newell。1957 年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成立了。然而，我们要注意，早在 1947 年图灵（Turing）就谈论过“机器智能”，这正是他提交给国家物理实验室的报告的标题。

② 图灵谈论了“鸵鸟的异议”：“我们愿意相信人类以微妙的方式高于其他的创造物。最好还能够指出人类是必然高级的，因为人类没有任何丧失其统治地位的可能。”cf.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trad. p. 50.

给出了回答[①]。在这里我们不探究图灵介绍这个测试的文章的历史沿革的复杂性[②]、哲学上的复杂性甚至是精神分析上的复杂性[③]，我们只是将这个测试作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根据“图灵测试”，在“提问/回答”游戏的过程中，询问者要猜隐藏着的对话者的性别，由于人类是有可能发挥拖延策略的(stratégie dilatoire)[④]，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能和男子A有着相同行为表现的机器看作是有思维能力的。通常人们过多地讨论了测试本身，而没有真正思考这个测试所提出的所有可以描绘机器智能特点的标准。关于这一点，我们列出三条意见：

(1) 总体来说，图灵测试是一个行为表现的测试：机器应该能够模拟(simuler)人类的行为表现。图灵根据行为主义明确地解释了这一点：在面对同一情形时，机器给出的答案应该和人类的答案相同或相似。机器应该能够行动、反应甚至是恰如其分地互动。与此相关的是可观察到的结果，而不是产生结果的内在过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明显不涉及要求机器和人类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而只是想要机器能够借助于不同的程序扮演相同的角色。举个简单的例子，虽然一个机械挂钟、一个报时钟、一块数字表盘（数字显示）的石英表或模拟数字表盘的石英表等等，只要被校准过都可以给出相同的时间，然而它们实际上是根据完全不同的程序和显示方式来做到这一点的。因此，“结果”的相同或相似和“操作模式”(modi operandi)的相同是不同的两个标准，前者的要求较低[⑤]。如果机器能够表现出和人类智能行为表现相似的行为，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机器会思考或有智能[⑥]。因此，严格来说，模拟的是功能，而不是过程，更不必说是下层基础了。

从历史上看，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种狭义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观点就被抛弃了，产生了一个认识论的实质改变：从“仿真(émulation)目标”（人类的行为表现是模仿的原型）过渡到“模拟策略”（机器实现了控制着人类

① 将男子A、女子B用隔板和询问者C分开，A、B和C之间用电传打字机来沟通。C需要猜A和B的性别。“模仿游戏”在于用机器来替代A，cf.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② 关于图灵的传记，cf. A. Hodges，*Alain Turing : the Enigma of Intelligence*.

③ 关于模仿游戏的精神分析学，cf. Jean Lassègue，*Le test de Turing et L'énigme de la différence des sexes (Pour un dialogue entre cognitivisme et psychanalyse)*.

④ 图灵清晰地预测到了游戏中的女人和询问者是有合作的！

⑤ 图灵认为，如果将电脑看作使用电流作为符号载体的大脑，就构成了“过于表层的相似性”。他更主张追求“对功能的数学模拟”，cf. *op. cit.*, p. 45—46.

⑥ 换一个说法，举个例子，当机器具备视觉功能时，我们就说机器能够“看”，即使它的视觉“器官”很明显与人类的眼睛相异。只要视觉功能适合固有的最终目的就可以了。问题架构明显只是技术上的、创造工具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模式化的。

行为表现的认知进程模式）。对于推理过程和使用符号的再现过程的思考取代了“黑匣子”。自此，重要的不仅是对人类功能的复制，而是这种复制的模态和这种模态在心理上可能的逼真性。机器的运转被看作是对有关测试理论的信息化实现。主要问题在于发出的假设、介入的策略、所使用的程序和形式体系。因此，西蒙（H. -A. Simon）设计了一台“使用物理符号系统”的电脑，他将这台电脑变成了模拟人类认知进程的工具①。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避免将现象和模式化混淆在一起，我们不再说机器是“有”智能的，而只是说机器“模拟了”相同的智能行为表现。更确切地说，人类和机器之间行为表现的对比让位于了人类思想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化程序的计算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并驾齐驱。

（2）第二条意见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在图灵测试的构建中相关的行为表现只能是言语活动。这一点非常关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图灵为了破译纳粹的密码而发明的机器依然是数字计算器。而纽维尔（A. Newell）、肖尔（J. -C. Shaw）和西蒙（H. -A. Simon）的程序“逻辑理论家”，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程序提供了针对有质的——而不再只是有量的——信息进行固有逻辑处理的可能性，而不再仅仅是数字处理②。依靠推理过程、符号再现由逻辑提供的认识，程序不再针对特定的客体，进而获得了一般能力③，例如最近非常热门的在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中提供决策帮助的专家系统。

然而，计算能力和使用符号的能力仍不足以描绘机器智能的特点。虽然图灵和他的朋友钱珀瑙恩（David Champernowne）一起发明了第一个国际象棋程序“图灵钱珀”（Turochamp），但在1950年图灵并没有采用机器战胜最好棋手的能力作为测试内容，这绝非偶然④。真正的挑战在于模拟人类固有的言语行为表现，也就是说，不在于控制形式符号（虽然它们是复杂的），而是控制词、控制自然言语活动的符号。因此，这里涉及的不是模拟最精妙的专业认识，而是模拟从属于一般涵义的最日常的行为表现。言语行为表现的精细、灵

① Cf. *Sciences des systèmes*, *sciences de L'artificiel*，在书中西蒙和“人工智能”这个表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更喜欢“对认知进程的模拟”这个表达（p. 4，n. 1）以及 p. 22：“（电脑上的模拟）成了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使我们更深层地理解人类的行为表现。”

② 在1956年5月，纽维尔、肖尔和西蒙发明了第一个能够证明命题演算定理的逻辑程序，cf. *Programming the Logic Theory Machine*.

③ Cf. Denis Vernant，*Stratégie de représentation des connaissances en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④ 在1947年的文章《机器智能》（*Intelligent Machinery*）中，图灵提出了第一个机器下国际象棋的模仿游戏的草图。国际象棋除了像专家系统一样从属于专门的领域外，还表现出了只能要求自给自足地使用符号体系的缺陷。

活和复杂最能体现出人类的智力能力。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逻各斯这个古老的主题：既是言语活动又是思想，既是话语又是理性。至少，言语活动表现出了思想的迹象。

（3）最后一条意见，图灵测试不仅要求机器沟通，而且要求机器对话，要求机器能够在问答的交互中正确模拟人类的角色。这条意见长久以来都被忽视了①。自此，假设为了掌握对话策略的事物，不仅需要在言语活动的符号体系中再现构建问题，然后通过推理过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必须要有能力建立和他人的互动。因此，只有交谈的对话体功能中孕育出的自然言语活动才能成为智能的标准。

哲学家们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笛卡尔就曾经强调过：人类的智能、发明创造的能力都通过恰当回答问题的能力表现了出来，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对话中占有位置②。当今，语言学界也持同样观点，班维尼斯特不仅用人类使用符号的能力（使用符号系统，而不是信号代码），而且还用人类对话的能力（即对语言刺激做出语言回答）来定义人类言语活动的特征性③。

我们注意到，图灵给机器确定的目标是模仿人类的言语行为表现甚至对话体行为表现，但他从没有考虑过用来实现行为表现的过程。他只满足于主张功能的相似性！随后的十年间，出现了对自然言语活动的计算机处理，出现了自动翻译语言的希望。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摆脱了图灵研究计划的明显败笔。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的研究开始纳入使用言语活动的语用学范畴。但也要看到，尽管最近的研究突飞猛进，但我们还远没有掌握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上的分析程序，这些分析程序用来恰当地分析对自然言语活动的使用。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由于我们还没有掌握对言语的认可现象，所以创造出真正会说话的，甚至能够对话的机器这个目标还远在天边。

但是不管怎样，就像我们所知的（cf. *supra*，chap. VI），通过预计目前

---

① 图灵本人也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一点。

② “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台机器是这样构成的：它可以大声讲话，甚至说出几句有关身体动作的话（这些身体动作造成了机器在部件上的某些改变），如果人们触碰到了机器的某些地方，它可以问我们想要对它说什么；又或者大喊我们弄疼了它或诸如此类的事，但它不能以多种方式来安排这些话语以回答对它说的所有话，这是最愚笨的人类都可以做到的。” *Discours de la méthode*，5e partie，p. 121.

③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t. 1，chap. V，p. 61：《Communication animale et langage humain》. 我们注意到，虽然普墨克的雌性黑猩猩 Sarah 能够用符号来回答向它提出的问题，但它还是不能够通过自己提问来发起沟通。

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给出了研究“人机对话”的方式。恰当的做法是了解相关的对话（甚至是模拟的对话）是否满足了图灵测试所提的要求。由于我们已经论述了纯互动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信息性对话的投射模式，所以现在我们着重来看交流方面，即相关施动者的地位以及机器与客观现实的关系。

二、我们能够在哪层涵义上谈论“人机对话”？

我们依次细看相关的三个方面。

人

机器的使用者是预先确定的自然要素。一般赋予机器的使用者以真实人的身份，他由意愿、意向和目的驱动，有情感、想象、思考、意识，拥有特有的技能和知识。

人的一些特征可以被机器所感知。事实上，机器能够在对话的过程中就人类这个对话者的特征做出假设，机器的对话体行为表现就由这个假设来决定。“使用者模式”（modèle de L'utilisateur）构成了机器对使用者的动态再现（représentation dynamique）。这个模式的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任务领域中使用者所表现出的能力和认识水平。我们举个例子，有关落实建筑师所做计划的对话。使用者的能力和认识水平相当程度上直接确定了他对技术词汇的理解能力、他的意向和目的，以及为了达到目的而介入的策略。如果新加入的使用者表现出了比专家水平差很远的行为表现和需求，那么对话就不再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在新手参与的对话中不理解的可能性、含糊的可能性将是最大的。

机器

我们再来看看机器的身份地位这个棘手问题。复杂的使用者模式也应该包含电脑使用者所感知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电脑使用者所认为的机器形象。当使用者和机器对话时，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认为在和机器对话时，使用者根据他所构建的对机器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再现，从而改变自己的对话体行为表现。一般来说，适用于所有人际间对话的相互打招呼的寒暄范畴，在和机器对话的情况中都被最小化了。举个例子证明一下，电脑使用者会躲开通常的礼貌约束[1]。显然，使用者明白他面对的并非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台机器。然而，只有在使用者与机器进行对话体游戏，假装机器会像一个人、一个真正的

---

[1] Cf. É. Bilange *Le dialogue personne-machine*.

对话者那样做出反应时，互动才有可能。程序 ELIZA 在某些对计算机一无所知的使用者中引起的强大的对话体效果就完美地解释了这一切[①]。事实上，这是一个有关"意向性策略"（stratégie intentionnelle）的例子，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意向性策略控制着对人类的、动物的甚至是机器的行为表现的解释[②]。使用者就这样自发地将意向性赋予了机器。

但是，我们想用意向性这个词表示什么呢？在这个词之下，我们经常会混淆其不同的特点，最好能小心地将这些特点区分开。为了分析的需要，我提议区分三个特点：

（1）针对一个客体的精神状态的语义能力，或者用来指称某物的符号的语义能力；

（2）施动者的语用能力，根据意向和固有计划而行动；

（3）最后是意识的反身能力[③]。

因此，只有当我们认为或假装认为机器所使用的符号对其自身具有涵义和指称，并且机器的行为符合目标和理性的计划化，而且机器掌握着呈现出自动控制（autocontrôle）能力形式的最小值的"意识"时，我们和机器的对话才是可能的。

设计"智能"界面的明确目标就在于，通过赋予机器以正确模拟真人的对

---

① 程序 ELIZA 是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于 1966 年发明的，这个程序模拟了与罗哲斯派心理学家（psychologue rogerien）之间的非指令类对话，cf.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 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

② Cf. *La stratégie de L'interprète*. 这个策略属于古老的拟人化取向，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将趋势赋予了移动的客体。自伽利略（Galilée）以来人们就摒弃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无生命身体移动的解释，这就表明意向性的赋予是和生活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③ Cf. Franz Brentano，*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liv. I& II，trad，p. 102："每一种精神现象都是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称作对象在意向上的（有时也称作内心的）内存在为特征的，并且是以我们愿意称作（虽然并非十分明确地）与内容相关联，指向对象（这个对象在这个语境中不应理解为是某种真实的对象）或内在的对象性为特征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包含某种作为其对象的东西，虽然它们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包含的。在再现中，某样东西被再现；在判断中，某样东西被接纳或被拒绝；在爱情中，某样东西被爱着；在仇恨中，某样东西被恨着；在希望中，某样东西被盼望着……"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在 *Sentences about Believing* 中推广了语言学的版本，这个版本将客体变成了所针对的外在客体。弗雷格认为，关键在于从符号到客体的指称语义，以及所听到涵义的语义，"作为指称的赠予模式"。意向性表达表现为内在性（intensionnel），它们不再满足外延性原则——外延性原则授权了等同替换和存在普遍化。cf. Denis Vernant，*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chap. 5，p. 119－136. 这就是意向性的第一层涵义。第二层涵义符合意向这个词的通行用法。第三层涵义是由布伦塔诺预见到的，他注意到，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是意识的（第二）客体，第二客体是主体自身的活动，cf. *op. cit.*，liv. I，p. 114.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语义层次和语用层次所做的区分是纯探索性质的，最终，对客观现实的指称是从属于行为计划的。

话体行为表现的能力，从而满足意向性策略。当前关于通过目的和计划管理人机对话的研究也明确以分析使用者的意向且同时赋予机器以意向性策略为目标！当然哲学家可以回答说，不管这些研究多么有意思，它们在哲学上还是有局限性的，机器的意向性是“借入的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 d'emprunt）①。机器表现出的涵义和指称、意向、反身，只是机器的设计者赋予它的，只是机器的使用者借给它的。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机器“智能”的人工范畴：它表现为假人、纯粹模拟的事物。机器的“人格”只是创造机器（设计者）、使用机器的人类的投影。接下来我们思考第三个要素，即对话，这将使我们能够评价贬低人工智能的人引为依据的哲学上的反对意见。

与机器“对话”的可能性质

我摒弃了所有沟通的内在论，将对话定义为根本上他律的活动，它遵循唯一给予它涵义和最终目的的行为约束（cf. *supra*, chap. V）。考虑到研究对话明确的语用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两重能力来测试机器模拟对话体沟通的才能：

（1）互动，像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一样引导对话；

（2）交流，建立对话者之间的关系，介入到客观现实。

互动能力

提供对话体能力给机器，尤其在于赋予机器以“对话的动态模式”（modèle dynamique de dialogue），这个模式能够即时地处理沟通互动的策略。我们已经看到（cf. *supra*, chap. VI）基本的信息性对话，诸如“询问铁路信息”是怎样由对话双方分享的投射模式来控制的，这个模式可以预见到直接相关的互动并且衡量对话的差距和潜在的失败。概括地说，对铁路公司数据库的询问始于使用者的请求，应该以机器的回答为结果。初始请求和最终回答之间或长或短的过程是以澄清请求的字眼、在所用符号的意义和指称上获得一致为目的的。

然而，即使考虑到这方面最有前途的研究，我们仍然注意到我们离图灵测试所提的要求还差着很远。因为图灵预测了对话双方发展隐匿策略和谎言策略的可能性：男子通过假扮女子从而掩饰自己的身份，机器为了掩盖它的机器特

---

① 我在这里不就派生的/原始的意向性争论表态。例如，丹尼特（D. Dennett）就认为，只要人类是大自然的创造物，那么人类的意向性就和机器的意向性一样是派生的，cf. op. *cit.*, p. 390.

点而故意搞错四则演算[①]。当前的研究都建立在遵守格赖斯的质量准则这个假设之上，根据这个准则对话双方是真诚的，所以根据这个准则，对话体互动是纯理性的进程。伪装、谎言不属于目前机器的能力。除去特殊情况[②]，我们很难发现，机器为了实现赋予它的目标，在哪些方面拖延策略是必要的。一个接受对虚构航班的飞机票进行预订的机器，或者是一个故意欺骗使用者的毫无信用的机器能用来做什么！谎言的问题让我们回到了人机对话的最终目的上，回到了整个沟通互动的交流范畴上。

交流能力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和纯寒暄功能的客厅会话相反，人机对话有着严格的最终目的：它以信息交互为目的，为了实现明显合乎规定的任务（例如咨询铁路公司的时间表、预订飞机票、设计计划等等）。我们明白，语用分析需要考虑所针对的任务，需要构成“任务模式”（modèle de la tâche）。任务模式以详细说明词汇、包含的脚本、授权的策略为目的（cf. *supra*，chap. VI）。预订火车票的请求由这样的事实来确定：火车是从一个火车站到另一个火车站的交通工具，它通过编号而具有个性，它拥有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同时，预订火车票的请求也由对于固定脚本的认识而确定，类似于关于买票、预订座位的惯例等的固定脚本。

只考虑“由任务引导的”对话，将大大简化信息建模，因为由明显外接的任务所提出的计划化策略不会调动巨大的背景知识。想要询问火车到达的时间只需要关于铁路运输机制的有限知识。

但是即使考虑到相对复杂的任务，譬如设计任务，我们仍然离笛卡尔所提出的极端要求很远。笛卡尔坚持“理性是普遍的工具，它能够以各种方式和我们见面”，他不承认机器回答的专业化：“对于每一个特殊的行为这些装置都需要某个特别的设计；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上不大可能有足够的多样性让机器按照理性引导我们行动的方式一样，可以针对所有的生活情况有所行动。”[③]

至于图灵所设计的模仿游戏，由于对话的关键是发现对话者的性别，因此它提出了一个中间要求。回答的能力虽然不是普遍能力，但是也适用于远非普通的任务。事实上，回答的能力借助于对文化惯例的认识，在我们的社会中，

---

① Cf.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问题：34 957 加 70 764。——回答：（沉默了大约 30 秒）105 621。”有意思的是在法文译本中（p. 41，55）这个计算错误竟然被纠正了！

② 为了让机器回应购买机票的意图，我们会想要银行自动售票机的界面具备撒谎的能力吗？

③ Cf. *op. cit.*，p. 121－122.

这些文化惯例越来越趋向于模糊，性别差异的标志变得模糊不清。在这里的要求是掌握所有重要的暗含知识。困难就在于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德莱福斯（Hubert Dreyfus）就将其解释为："很难看到将事物与我们关联起来的多种精妙的方式是怎样被全部列数出来的。"①

图灵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反对意见，他将这种反对意见叫作"来自信息行为的论据"（The Argument from Informality of Behaviour）②。他完全承认，要陈述出支配我们每个举止的所有规则是不可能的，甚至陈述出支配特定举止（例如司机面对红绿灯时的行为表现）的所有规则也是不可能的③。然而，图灵就像德莱福斯以及之前的笛卡尔一样，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说：人类的行为表现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机器化的。因为，他揭示了"举止规则"（règles de conduite）和"行为表现的自然法则"（lois naturelles du comportement）之间的混淆：举止规则或许是有意识的，人类根据它来规范自己的生活，而行为表现的自然法则则直接规范了人类的生活。虽然这些法则还没有被揭示出来，但没有什么可以断定它们是不存在的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还剩下最后一个和相关任务有关的论元。确定性别的问题，我们不再从技术上将其解释为复杂的任务类型，而是从哲学上，更确切地说是根据德莱福斯所采用的现象学理论，来进行解释。这个问题是对话者身体性（corporéité）的问题，是他和他人、和客观现实之间基本关系的问题④。似乎很容易看出，由于机器是没有身体的，所以它不能够建立和他人、和客观现实之间的交流。

最后我想要指出，这样的推理似乎过快了，它偷换了意向性的不同范畴。

---

① Cf. *Les ordinateurs peuvent-ils être vraiment intelligents*?, p. 741. 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在于调和言语活动的严格再现概念和对非再现背景的最终借助，cf. Searle, *Intentionalité*. 我们认为，只有研究言语活动的彻底的行为方法才有可能避免这种窘境。事实上，问题不在于对全部认识的再现——再现必然是有限的，而是对行为处置的剪辑（montage de dispositifs d'action）。

② Cf. *op. cit.*, p. 59－60.

③ 译者注：图灵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原文如下——"当某人看到一个红色交通灯时需要停下，如果看到的是绿灯就通行，但如果由于某些故障红绿交通灯一起出现了怎么办？某人可能决定说最安全的就是不动。但是某些进一步的困难可能会从这个决策后浮现出来。试图提供指导规则以覆盖任何可能性，即便是那些来自交通灯的可能性，看上去是不可能的。这我完全同意。"

④ 和笛卡尔的二元论相反，和笛卡尔的动物－机器理论相反，当代人工智能的问题架构（从 *Embodiements of Mind*, W. S. McCulloch 到 *L'inscription corporelle de L'esprit*, F. Valera, E. Thompson, E. Rosch）实际上就是智力上的人性化。我们的假设是，除了现象学的直觉之外，只有语用研究方法作为行为的一般理论，才能分析智力的身体范畴。

三、机器和机器人的意向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目前我们所谈的“人机对话”中的机器。它们既没有身体也没有性别，这是一个事实。它们的材料结构不允许它们直接介入到真实的客观现实。它们的介入模式依然是纯使用符号（符号显示在屏幕上或是在打印纸上）。我们可以说它们的贡献局限于再现的领域。但是一个严苛的哲学家还是不会同意这样的断定，因为所有真实的再现都应该是某个事物的再现。符号的意义要求指称到客观现实。然而，相关的机器本身没有任何手段来建立指称到客观现实的任何关系。虽然机器使用了符号，但它们不掌握任何符号能力；虽然它们有记忆，但它们不掌握任何记忆力。塞尔的理由很充分，他提出了“中文房间”（la chambre chinoise）[①] 这个著名的试验，也就是说机器只是操纵了完全没有含义的符号（它们只是在纯登录内容的物理范畴内被感知），虽然机器掌握了句法（句法简化为了写作游戏），但是却没有掌握任何现实的语义[②]。管理着光盘上超文本格式的大百科全书的机器并不会比一本普通的书懂得更多！从语义到句法的不可还原性的论题[③]证实了“会对话的”机器不掌握任何指称能力的论据。即使我们能够将令人满意的互动能力赋予机器，但它们的交流能力仍然没有。机器自身既没有语义意向性的能力（没有任何实际的再现），也没有语用意向性的能力（没有任何固有的意图和计划）。机器，甚至是“会对话的机器”，仍然只是简单的工具，它们简化了由人类实施并解释的处理符号的所有形式。机器是一个搭档，这个幻觉来源于设计者由于程序和界面的透明性所造成的忽略。

然而，塞尔的结论更具野心：坚持要取消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人工智能产品的资格。我们认为，在这点上塞尔跑得太快了，这种大杂烩是不恰当的。

---

① 译者注：“中文房间”是塞尔提出的一个思维试验，借以反驳人工智能的观点。中文房间的思维试验可表述为：一个对中文一窍不通的，以英语作母语的人被关闭在一个有两个窗户的封闭房间中。房间里有一本用英文写成，从形式上说明中文文字句法和文法组合规则的手册，以及一大堆中文符号。房外的人不断向房间内递进用中文写成的问题。房内的人便按照手册的说明，将中文符号组合成对问题的解答，并将答案递出房间。塞尔认为，尽管房里的人压根不懂中文，但他可以以假乱真，让房外的人以为他是中文的母语使用者。在上面的过程中，房外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程序员，房中人相当于计算机，而手册则相当于计算机程序。正如房中人不可能通过手册理解中文一样，计算机也不可能通过程序来获得理解力。“la chambre chinoise ”亦有人翻译成“中国屋”或“中国房间”。

② Cf. *Du cerveau au savoir*, chap. 2 ：《Les ordinateurs peuvent-ils penser?》, p. 41－45. 在那个时代，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就已经在反对图灵的观点了，他提出“语义功能”只能由人类智力来承担，cf. *Personal Knowledge*.

③ 这可以追溯到塔斯基（Tarski），cf. *Le concept de vérité dans les langages formalisés*.

和以上所考虑的机器不同，虽然机器人不拥有身体和性别，但是它们的材料结构却允许它们拥有一个直接介入客观现实的模式：通过传感器它们具备最小值的感观，通过效应器具备动作和反应。因为所使用的符号——如果有的话——通过实际指称到客观现实的事物的可能性而具有了含义，问题架构因此发生了改变。根据程序，机器人所感知到的许多现实的立体物符合了再现的立体物。自此，机器人获得了最小语义（sémantique minimale）。根据原则，意向性的第一个层次得到了满足：指称能力。

既然机器人对于感知到的立体物所做出的行动是由程序控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①]。这种行为是区别于纯事件（机器人胳膊的随机移动）的，应该服从于目的论因果关系：它符合意图、目的。机器人因此拥有了意向性的第二个层次，即最小语用（pragmatique minimale）：根据意图和计划针对客观现实做出行动的能力。

图灵在其文章的最后曾试图建构起一个“儿童机”（machine-enfant），这个机器具备一个感知系统和行动系统，能够模仿“学习”这个社会化过程[②]。当前对于先进机器人技术的研究着眼于可动机器人（robots mobiles），例如布鲁克斯（R. Brooks）的人工生物（artificial creatures）[③]，可动机器人对于客观现实的感知、针对客观现实所做行为的结果产生了动态交流，在这个动态交流中可动机器人通过自主学习完成自我编程。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赋予机器人自主交流的能力[④]。就这样我们走向了智能的行为概念（conception actionnelle de L'intelligence），它避开了再现研究方法和认知研究方法的困难。一个能和使用者互动、能和客观现实发生真实交流的机器人，就构成了图灵所

---

① Cf. 例如，威诺格拉特（Terry Winograd）著名的 SHRDLU 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就模拟的“积木世界”（univers des blocs）进行对话、行动，cf. *Understanding Natural Language*.

② Cf. op. *cit.*, p. 61－67. 哈纳德（Stevan Harnad）曾向我指出他的文章 *Other Bodies, Others Minds : a Machine Incarnation of an Old Philosophical Problem* ，在这篇文章中，他区分了建立在语言能力之上的“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和介入了机器人能力的“完全图灵测试”（Total Turing Test），他指出“完全图灵测试”避免了塞尔的批评。我很高兴能加入到哈纳德的结论中来。然而似乎只要认真对待图灵关于儿童机的研究，那么这两个测试就是同一回事。只要对“模仿游戏”进行语用分析（图灵恰恰没有这样做），那么这种唯一性就可以建立起来。除了对符号的所有语用使用之外，句法和语义仍旧是抽象的，同样，沟通互动只有借助于客观现实的交流才会有涵义和最终目的。在此我们发现，智力哲学（philosophie de L'esprit）不能抛开语言哲学（philosophie du langage）。

③ Cf. *Intelligence Without Reason*.

④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了控制论的最初方向，cf. N. Wiener & A. Rosenblueth, *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这两个作者试图用非唯心主义的字眼来解释“意向”。

提的“儿童机”的恰当近似①。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塞尔明确拒绝在简单机器和机器人之间做必要的区分②。答案是，他悄悄地逐步强化了意向性约束。最终，他的论据立足于胡塞尔对于意向性的定义，将意向性定义为对某个事物的意识（conscience de quelque chose）③。很明显，如果我们考虑意向性的第三个层次，那么不管是机器还是机器人都不拥有意向性，两者之间的区分也就没有必要了④。

我们再次看到了哲学上对于图灵所设计的模仿游戏中性别主题的关注。人类的身体性（corporéité）和性别性（sexualité）只有在对身体性、性别性的意识这个范畴中才有完全的涵义。关键在于意识到生和死，这远远超出复制能力。如果我们考虑最后这个层次，那么我们就可以主张（因为我们还远没有掌握关于意识的真正可操作的定义，所以就更可以这样主张）：不论是机器还是机器人，甚至是低等生物都不拥有意向性，意向性描述了人类的特征。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很明显这种研究方法压垮了有用的区分，相反，被看作为行为研究方法的语用精细分析是可以建立起这些区分的。

四、结论

因此，只要通过对话体的语用定义得出所有的结论，那么被阐释为将机器智能和对话体能力联系起来的图灵测试就可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将对话体语用定义为：与他人、与客观现实的有效关系的交流约束，以及沟通的固有互动限定。因此，只要我们通过对话体的语用定义得出所有的结论，那么被阐释为将机器智能和对话体能力联系起来的图灵测试就可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种视角下，有必要在机器和机器人之间做一个区分，甚至可以假设机器可能在将来表现出对话体互动的能力，但是只有机器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

---

① 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在他的文章中，将他的研究步骤明确定位在了深化图灵关于“儿童机”的思考之上，cf. *Intelligence Without Reason*, p. 5.

② Cf. *op. cit.*, p. 46, 49.

③ Cf. *op. cit.*, p. 55－56 & cf. D. Dennett, *op. cit.*, p. 431：“什么才是塞尔的十字架？是意识，而不是‘语义’。”在 *La redécouverte de L'esprit*, chap. 9 中，塞尔重提了有关中文房间的论证。评论扩展到了句法，句法被重新定义为与观察者相关、从属于阐释（interprétation），cf. p. 278－284. 但是，阐释的意向范畴，以及因果能力都明确地被赋予了作为具体生物现象的意识，cf. chap. 9，§Ⅶ。主要论证（nervus probandi）虽然是明示的，但仍然和最初论证相同。

④ 我们注意到，图灵考虑了“由意识产生的论据”，并且指出这会导致唯我论（solipsisme）：“根据这个极端的观点，要确定一台机器是否能够思考的唯一方法是让自己变成这台机器并且感受到自己在思考。”p. 52－53. 塞尔考虑过关于“有意识机器人”的假设，他坚持认为这类机器人的行为表现不能够提供意识能力的标准，cf. *La redécouverte de L'esprit*, chap. 3.

交流能力，这是因为，从语义上看机器人可以建立和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最小值，从语用上看机器人可以根据固有计划的最小值而行动。

看待智能的新时期开始了：不再涉及通过机器来仿真人类的行为表现，甚至也不再涉及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人类的认知进程，应该是将智能设想为一个理性施动者（机器人或人）和同类对话的能力、通过行为适应周边环境的能力。

然而不能沉迷于幻想，幻想助长科幻[①]。机器人仍然是人造制品(artefacts)，虽然它们能够移动、能够在客观现实中行动，但是它们不具备身体。除了纯理性的范畴之外，人类的智能还和情感、欲望、冲动密切相关，这些内容和以下事实相关：人类通过身体和他人交往，通过身体居住在世界上，通过身体处于一个时间之中。机械机器人总是缺少基本的生物学范畴。

图灵当时预言说，在 2000 年机器将能够顺利地通过他的测试[②]。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技术上确定在今后机器是否有能力通过这个测试，而在于能否在所提标准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尝试指出的那样，对话实际的意义是什么、意向性概念包括哪些不同的涵义，要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相关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言语游戏，这个言语游戏给描述了认知能力（直至人类专有的认知能力）的各时期人造机器规定了外延[③]。因此，我们确定，当我们将不同的表达应用于人工智能产品时，很有必要在“智能的”（être intelligent）、“模拟智能的”（simuler L'intelligence）和“赋予意向性的”（attribuer une intentionnalité）这几个表达之间做出小心的区分。

很明显，哲学家是不能够了结这场争论的，但至少可以澄清这些概念。

图灵这样总结他的文章：“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是至少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我们想套用一下他的话：“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是至少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了我们去往哪里。”

---

① Cf. Harry Harrison & Marvin Minsky, *Le problème de Turing*. 我们注意到，在这本书中图灵测试的解决方法被解释为构建智能“机器人”。

② 译者注：很遗憾，即使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看，直至今日也没有任何计算机或机器人通过图灵测试。2012 年 6 月在英国著名的布莱切利庄园举办的一场国际人工智能机器测试竞赛中，俄罗斯专家设计的“叶甫根尼”电脑程序 29.2%的回答成功“骗过”了测试者，差 0.8%便可通过图灵测试（但如果从意向性的角度来看，那还差得很远）。

③ Cf. Jacques Bouveresse, *La Parole malheureuse*, chap.《Le fantôme dans la machine》, p. 397—470.

第八章　从行为到沟通

“……我欣慰地写下‘一切由行为开始’。”

——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 402。

引自《浮士德Ⅰ》（歌德）

言语互动（interactions langagières），从我们广义上所理解的来看，构成了人类举止的一个主要部分。皮尔斯说过：“人类是符号。”就同一个意思，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人是话语，更确切地说是对话。不管怎样，人类的言语互动首先一定是行为（action）。对行为的一般定义就成了起始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言语活动（activités langagières）的特征性。

首先从哲学上来看，对于行为的关注在哲学上是极其悠久的，因为言语活动最初可能是作为解决生存问题（和敌意的环境进行有效交流）的方式而出现的，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我们颠覆了目前大家所遵循的步骤，我们提出从行为到沟通，将“人”语用定义为交流和互动进程的共同施动者，将这个定义作为阿里阿德涅的线团①。

更确切地说，我们将概述行为的最小定义和一般定义，我们将通过将人特征化为共同施动者来描述行为的特征。我们还将研究人类交流的不同形式、共同行为和联合行为。最后我们将勾勒出言语互动的特征性。

---

① 译者注：米诺斯是克里特岛的国王。波塞冬被他不虔诚的行为所激怒，让米诺斯的王后帕西法厄爱上了一头白色公牛，并生下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洛斯，即米诺牛。米诺牛是头怪物，嗜食人。为了掩饰这桩丑闻并囚禁米诺牛，米诺斯命令著名的雅典工匠代达洛斯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迷宫。迷宫建成后，他将米诺牛囚禁在迷宫的最深处，并命令雅典每 7 年进贡 7 对童男童女以供米诺牛享用。雅典人惧怕米诺斯的强大，不得不按时进贡。凡是家中有童男童女的人家皆是惶惶不可终日。雅典王子提修斯不忍心看到人民饱受骨肉离别之苦，决定作为贡品中的一员前往克里特岛，趁机杀死米诺牛，为民除害。在觐见国王时，他英俊的相貌和不凡的气质引起了公主阿里阿德涅（Ariane）的注意。聪明美丽的阿里阿德涅爱上了他，不忍心他被米诺牛吃掉，于是在他进入迷宫之前，送给他一把剑和一个线团。提修斯把线团头系在迷宫的入口处，并抓着线团，沿着复杂的通道向迷宫深处走去。在迷宫的最深处，他与米诺牛搏斗，一剑刺死了它，然后沿着线顺利走出了迷宫。

一、行为

行为，作为对于客观现实的介入模式，必然拥有物理的、身体的范畴。问题在于要区分被认为是简单事件的物理现象和另一个（或可能是同一个）被看作真正行为的现象。然而，任何一个属于物理现象的特征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在夏夜打破寂静的雷雨。我们一般把这个物理现象看作一个简单的气候事件，它来源于相反电力之间的冲突[①]。然而，在过去人们曾经将同一个现象解释为天神发怒。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直接与简单的气候事件搭上关系，而是关联于宙斯的行为。事件成了行为。

相反，就像《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提醒的那样，一个行为可以用纯物理的字眼来描述："我认为这样是准确的，人们似乎都说苏格拉底是通过智力来做他所做的一切，接下来又尝试着说出我每一个行为的原因，人们首先认定，我之所以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的身体是由骨头和肌肉构成的，而骨头是坚硬的并且有将其分开的关节，而肌肉则具有拉紧和松弛的属性，可以用肉和皮肤包围骨头并将其掩藏起来，在关节中晃动的骨头、一松一驰的肌肉使得我有能力在此刻弯曲我的肢体，这就是我能够屈腿坐在这的原因。"[②]

维特根斯坦从中得出结论，重要的是区分两种不同的言语游戏：可以由理性解释的行为和可以由原因解释的事件[③]。因此，识别有行为能力的活跃的施动者，这属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规则的固有"语法"[④]裁定（规则支配着在历史上被限定的言语游戏）。我们不再相信亚里士多德的戒律——"自然厌恶真空"，相反我们倾向于接纳一个全新的言语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机器可以思考、可以演算、可以说话（cf. *supra*, chap. Ⅶ）。

我们不想重启一场属于行为哲学的辩论[⑤]，我们只是以假说的名义接受这么一个识别事件和行为的标准：将物理现象的根源赋予一个具有"智能"，并能据此"引导""控制"行为的施动者[⑥]。

---

① Cf. A. Hermant & C. Lesage, *L'électricité atmosphérique et la foudre*.

② Platon, *Phédon*, 98 c—99 a.

③ Cf.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613—614, 627, 630.

④ 译者注：维特根斯坦这里所说的"语法"指的是哲学语法，不同于普通语法，哲学语法更接近他早先所说的逻辑语法。维特根斯坦一向认为科学处理事实，哲学研究逻辑。提出哲学语法之后，他把哲学界定为语法研究，关注的是语法命题。

⑤ Cf. Marc Neuberg, *Théorie d'action, textes majeurs de la philosophie de L'action*.

⑥ 在这里我们和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的立场接近，cf. *Le problème de L'action*.

只要我们稍微维持一下用词的中立，试图避免机器与人的同形同性论，那么类似的研究方法就可以最低限度地定义行为。因此智能不一定意味着再现能力、思考能力和概念化的能力，而是更基本地被理解为有能力和环境（行为就产生于这个环境中）进行简单的信息交互。“引导”可以被阐释为，当行为在时间中展开时，有能力担保并维持这个行为。行动的决定和行为的方向是根据目标、最终目的做出的，目标和最终目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预定的。主要牵涉到的是整个行为的目的论特点。最后来谈谈“控制”，对行为的控制使得修改、校正、暂停或中止行为过程的能力在需要时能介入进来。类似的控制通过故意的、有意识的决定，或一个简单的自动调节过程来完成。

自此，不同类型的施动者就可以被感知了：类似机器人的人工系统，例如布鲁克斯的“人工生物”[①]、动物以及人类[②]。但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客体是言语活动（人类的特征性现象）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描述施动者的特别类型（即人类）的特点来继续我们对于行为的定义。

二、作为共同施动者的人

“一切由圣言开始。”对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来说，逻各斯表示理性和话语、推理能力和符号表示能力、以认识为目的的一连串符号。然而话语也是对话的实践，是以沟通和合作为目的的符号的社会运用。因此，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社会性、政治性的动物。我们将社会的范畴放在第一位，采纳了浮士德的研究方法，根据这个研究方法，“一切由行为开始”。因此，我们把人定义为交流和互动中的共同施动者。

对作为施动者的人进行分析可以概括地总结出四点，其中前三点重提了或多或少由主体的哲学定义所带来的特征，我们在完全的语用视角下，也就是说在行为视角下，再次解释、协调了这些特征。

反身性

就人类来说，对自我的理解、对其他人的理解、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基本上

---

① 我们提醒一下，“人工生物”并没有对客观现实进行再现的智能，但它可以在客观现实中进化，cf. *supra*，chap. Ⅶ.

② 问题在于配有人工智能的信息化“施动者”的身份。这方面的术语和主题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根据其关键主要是提供信息，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为只能够进行沟通互动的施动者。因此费勃(J. Ferber) 把它们叫作“纯沟通的施动者”，或者叫作“软件施动者”，cf. *Les systèmes multi-agents*，p. 14－17.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再次遇到了机器的语义能力问题，cf. *supra*，chap. Ⅶ.

都以反身性（réflexivité）为特点。笛卡尔将“我思”（cogito）定义为有思维能力的反思所具有的能力。这种反身性构成了主体。只要人把自己作为主体、意识到自己是主体，那么他就是主体。这种反身能力对于意识（conscience）同样有用，主体可以意识到哪些人和事物不是主体自身，即主体可以意识到其他人和事物。继布伦塔诺（Brentano）之后，胡塞尔将意识定义为“对……的意识，对自我的意识、对事物的意识”。反身性具有开放的、目的性的形式。胡塞尔把它叫作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

但是在哲学上，不管是笛卡尔还是胡塞尔都把基础结构和最终结构看作为反身性和意向性。当代的研究反对这一点，提出在符号游戏、话语的社会运用方面意识表达方式的从属性。

意识自我确实如此。对于班维尼斯特来说，说“我”的人就是“我”[①]。主体性通过话语并在话语中构建起来。同样，我思的经历依赖于话语的表述行为约束[②]。自我意识的反身性来源于内心化的运用［我们把它称为言内（intralocutif）运用］，以及话语的对话能力。在和听话人的会谈（colloque）中，说话人总是第一位听众。说话人在对他人、和他人说话时，同时也在对自己说话，对说话人的对话体行为表现的自我控制、自我调整的现象就属于这种言内形式。

至于对事物的意识，则依赖于符号再现和符号指称的能力。我不再继续局限于客体出现的瞬间，而是能够从容不迫地思考那些不在场的、想象的或不可能存在的客体的再现。因此，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cf. *supra*，chap. Ⅶ），意向性有语义的范畴。所有的再现都是对某物的再现。除了在语言中的不同价值之外，符号还是某物的符号，它拥有指称意义。最终，话语是关于客观现实的话语。如果指称成分（déictique）保证了“说”在陈述语境中的锚点，那么其他的符号则通过它们的指称功能确保了从符号到客体、从符号到构成情形的事件这些符号使用关系。

理性

人类施动者的第二个特征是他的理性（rationalité）。撇开关于理性界限的问题，最好能够提出一个假说：施动者是理性的，他通过演算而行动。我们知

---

①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 1, chap. Ⅴ：《De la subjectivité dans le langage》.

② Cf. Denis Vernant,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 § 50－52,《Le dialogisme du *Cogito*》, p. 176－189.

道演算观念的命运，知道根据人工智能和认知主义对于莱布尼兹观点的发展的意义，莱布尼兹提出的是在普遍特征（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上加进演算推理（calculus ratiocinator），也就是说对于符号表示观念的字符进行形式演算。形式化的、符号化的、信息化所实现的推论逻辑表现出了生命力。但是，当今，既要思考施动者的理性，也要思考施动者就客观现实进行交流的理性，以及施动者之间沟通互动的理性，这就要求“实用推理”（raisonnement pratique），一种被理解为方法的逻辑，也就是在词源上被理解为对于途径和方式的研究。这涉及发现可以使施动者介入客观现实事件的因果链接中的原则（例如经济原则）和规则。这就需要人类行为学（praxéologie），它是对行为规划的研究，是行动的方法论。人类行为的理性和逻辑的理性是不同的，逻辑的理性表现为纯粹的理论演算，而人类行为的理性则是服从于目的的实用推理。这个方面和人类的后两个特征相关。

最终目的

第三个特征是行为的最终目的（finalité）。人根据给自己确定的目的来考虑、演算所使用的方法。在这里，支配着确定目的、选择方法的职责范畴介入了进来。施动者根据标准和价值来行动，这些标准和价值的社会构建模态由“价值论”（axiologie）来确定。施动者建立了“义务论”（déontologie），它明确了施动者行为的道德规范。照此理由，施动者对他的行为负责。

根据所采用的伦理价值、意识形态的价值、哲学价值或者宗教价值，施动者建立了一个计划。根据对所缺内容的评定、对满意需求的评定，施动者给了自己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构成了通过行为解决的“实践问题”[①]。经过分析的任务分解为目的和子目的，它们指引着行为策略的实现。每一个执行的行为根据它所针对的目标和它所实现的意图都具有交流的涵义。在这里我们触及了意向性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固有语用的，是从属于计划的[②]。不要求一系列事件的因果逻辑，而是要求行为的目的论：通过意图和所针对的目标来进行投射性解释。意图绝没有表现为纯粹的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依赖于在既定情形中有

① 马克思认为，人类给了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② 在英语中，“purposive”这个词详细说明了意向性的语用涵义。在群居动物中，例如社会性昆虫，一个“简单的集体智能”可以从个人反应施动者的非智能的行为表现中显露出来。人类“复杂的集体智能”的特点则是“施动者可以意向性地思考他们固有的群生性，并导致行动”。这种可能性产生于“符号互动”，只有人类（认知的施动者）才能在人际间编织出“符号互动”。Cf. Éric Bonabeau & Guy Théraulaz (éd.), *Intelligence collective*, chap. 1, § 1. 3. 2, p. 24.

可能的行为："意图是由当时的情形、人类习俗、人类制度所确定的。"[①] 行为框架因此也就确定了意图的潜在性。

合作性

到目前为止，前三个分离出的特征表面上都是针对单独施动者的。笛卡尔和其后许多哲学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仍停留在了自决主体上，因此也就落入了唯我论（solipsisme）的思考模式。

从互动角度来看，虽然主体被定义为"说我"的人，但他对一个"你"说"我"，而这个"你"也会轮到说"我"。在对话体的进程中，主体性一下子就被理解为主体间的沟通（intersubjectivité）[②]。说话人和听话人作为人以相同的身份被构成。

同样，在交流的层次上，施动者并不是第一位的：他不能被他自己所单独理解。应该一开始就把施动者设想为一个共有进程中的共同施动者（co-agent）。从这里就引出了我们所提的人类施动者的最后一个特征：合作性。

生物是关系性的。生物学和动物行为学告诉我们，动物只是被定义为和它的环境有关系。作为生物，人类似乎也从属于相同的分析。但是，事实上，作为文明的生物，人类通过技术深刻地改造了他的环境，特别是人类享有再现，并可以将它变为客观现实，更确切地说，可以构建起一大批层层叠加的客观现实。这些客观现实构成了社会构建（来源于大量的交流）的历史性结果，因此这个结果是偶然的。自此，不应该再把人设想为孤立的施动者，而是应该把人设想为处在由历史限定的"情形"中的"共同施动者"，这个情形组成了交流场，在这个交流场里施动者和其他的施动者一起创立了和他们共建的客观现实间的联系。这样的情形只有在面对、通过施动者们和他们的目的、策略时才具有意义。当情形被说出、被描述出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情形是说话人视角下的情形、他的陈述时间和地点下的情形、他感知客体和事件的方式下的情形[③]。

因此，大部分的人类情形组成了行为的语境、共同施动者之间的合作站点。自此，人类的行为就符合了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确立了所有可能交流的积

---

① Wittgenstein,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337, p. 233.

② Cf. Benveniste, *op. cit.*, p. 260.

③ 在模式化和主题化的现象中，说话人表达他对于情形的观点，例如主动/被动，或"杯子一半是空的/一半是满的"。

极规则[1]。施动者们被假定为能够独立地根据目的而行动，并使行动方式适合这个目的，而且还能够集体地使他们的行为互相关联，并在共同的最终目标上达成一致。

施动者拥有操作上的自主权（autonomie opérationnelle），这使得施动者可以选择他自己的目标和计划。然而，由于集体的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以及施动者个人的创新能力会导致交流上的共鸣或不协调。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社会动态、社会演变和革命。个人的施动者事实上能够赋予自己目标，选择被角色和惯用常规所认可的实践，但他也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从未出现过的新目标和衍生举止，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质疑了公认的社会实践，长期来看这有利于新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出现。这些衍生目标可以被制度约束所缩小，或者被其他人重提，被放大，直至提出新的规则。个人进行革新、评论的潜在力量，就像集体整合的必要性一样，产生了社会生成和社会停滞的双重运动，这个运动解释了制度的动态。

用法/使用，行为/活动

我们将人描述为反身的、理性的、有目的的、合作的施动者，这使得我们很明显地区别于笛卡尔主体哲学所开创的对于人的定义。然而，为了掌握语用学在这方面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最好不要把我们的定义和当前认知学派就人工智能所提出的对施动者的定义混淆起来。事实上，把“物理符号系统”——电脑提供的这个系统的恰当模式[2]——看作人是很吸引人眼球的。其实，人类，包括在一定程度上的机器人，为了树立起对自身、对他人、对客观现实的再现而使用了符号体系，并为了确定行为方案而对再现进行了推理演算的操作，但是否因此就要停留在莱布尼兹的综合计算和推理（calculemus）上呢？相反，真正的语用感知提出要超越莱布尼茨的观点：意义的问题以及行为的问题，在再现回答和纯计算回答中并不能完结。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意义的问题。我们刚才强调了符号的角色，更确切地说是在人的自我意识中，在建立与他人、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中，以及思考其行为的能力并以合理的动机来说明其行为的能力中的话语符号和言语互动符号的角色。除非将我们所理解的语用学与陈述语言学混合起来，我们才不会停留在这

[1] 我们注意到，对于格赖斯本人来说，合作原则绝非局限于会话中，而是针对理性行为的所有形式，cf. *Logique et conversation*, p. 62. 在这页上，他将数量准则应用到了修理汽车这个联合行为上，还将质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模态准则应用到了烹调这个联合行为上。

[2] Cf. A. Newell, *Physical Symbol systems*.

一步。意义不会在符号游戏中完结，因为这个游戏是对话体的。就像我们经常提醒的那样，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恰当的做法是不要把符号的"用法和使用"（usage/utilisation）混淆在一起。符号的意义可以被语言学家们或是法兰西院士们，编成定义和《正确用法》（*bon usage*）的规则。但是，这类"用法"只有和词、句子在陈述行为中的实际"使用"联系起来时才有涵义、价值和最终目的，陈述行为构成了言语游戏中的行动，而言语游戏本身是扎根于生活形式中的[①]。

同样，可以回忆一下皮尔斯的观点："思想的所有功能就是创造行为的习惯。"[②]自此，我们可以将符号设想为恰当使用符号的表达，它保证了在惯例、趋性、知觉运动方案方面人的内在化和人际间的外在化。单词"桌子"（table）提及了桌子的概念，它收纳了字典中的定义，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单词是指一个物体，这个物体的价值是用具（ustensile），这个用具通过它在一定的情形类型中提供给人类施动者的行为功能性和可能性勾画出来。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维特根斯坦对于背景（arrière-plan）的概念：行为方案的网络，它脱离了再现感知，构成了在符号使用时相互间完全理解的可能性。

从意义出发，我们被引向了行为。但是，我们被引向了什么类型的行为呢？我们把人定义为共同施动者，这似乎将行为变成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自愿的选择结果，变成了经过理性思考的策略的实现。这就表现出了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我们在最复杂的、最大特征性的行为式样中用以思考人类行为的方式。因此，不能够仓促地将其总结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应该采用这种式样，同样也不能够就其所有的复杂性来描述行为过程的实际式样。

根据符号再现、计划化、有限理性，我们可以为人类的行为、动物的行为甚至机器人的行为建立模型。因此西蒙（H. -A. Simon）提出了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纯符号研究方法[③]。但是，我们反对他将模型和模型化现象（phénomène modélisé）混淆起来[④]。相反，"情形中的行为"（action située）的拥护者们提出了把"实际活动"（activité effective）设想为施动者和他所处环境之间的次符号（infrasymbolique）互动进程："情形中的活动（situated activity）不是一种行为，而一直是动物互动的本质，和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

---

① Cf. Wittgenstein,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 421："把句子看作工具，把句子的涵义看作对句子的使用。"

② Cf. *Collected Papers*, 5. 400. 在这里皮尔斯汲取了贝恩（Alexander Bain）的观点。

③ Cf. Alonso H. Vera & Hubert-A. Simon, *Situated Action: A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④ Cf. *Cognitive Science*, vol. 17, 1993.

机器相对立。这里不能简单地认为语境是重要的，而是应该认为构成语境的内容、人们给客观现实分类的方式一起出现（arises together）在了构成物理协调活动的过程中。正在感知客观现实就是针对客观现实的行动——它不是一种输出输入关系（行动－观察－改变）——是辩证法的，这使得我正在感知的内容和我所移动的方式被共同确定了下来。”①

行为和意义是一样的。行为同样可以被规则、准则、计划所描述、所明确。但是，相对于“实际活动”（在对它的完全实现中构成了交流进程）来说，这些规则、准则和计划只是些抽象的概念。这里存在着差距，平静思考过、确定下来的计划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符合情形中（in situ）的行为，为了及时适应环境和其他施动者所做反应的偶发和意外，情形中的行为时刻预设调整和校正。另外，不要忽略行为的功用，最好能限定再现研究方法的特性。事实上，人可以借助于符号资源、言语游戏的“语法”使他的行为合理化。为了合理地构建计划，人可以用展望未来的方式制订计划和策略。相反，人可以用回想的方式给出涵义，甚至是说明行为的理由：提供一个关于行为的可接受的合理描述。心理分析或许显示出：事实上，这涉及“第二个合理化！”然而，活动在它执行的同时构成了开放的、不可预见的、创造性的进程，这个进程实时地依赖于由引导和控制正在做的交流所提出来的一系列准时的、准确的选择。如果说行为可以设计，那么活动只可以实现。如果说行为可以被再现、被计划化、被合理化、被证明，那么活动只可以被实现、被产生：“如果我穷尽了这种根据，我就挖到了坚硬的基岩，而我的铲子就弯了回来。这时我就会说：‘我就是这样行事的。’”② 这个说法又一次地脱离了整个话语性，这是为了从属于身体上纳入的基本的态度、倾向和趋性③。它存在于主体间的交流方案、客观现实内的交流方案之中，主体间的交流方案和客观现实内的交流方案作为生活形式是得到社会和文化认可的。

---

① William. J. Clancey, *Situated Action : A Neuro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Reponse to Vera and Simon*, p. 95. L. Lucy Suchman, *Plans and Situated Action : The problem of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p. 50：引入了情形中的行为（situated action）这个词，主要是用它指称常人方法学（ethnométhodologie）研究。很奇怪，她提到了米德（Mead）（p. 51）、皮尔斯的指示理论（p. 58－62）以及话语行为理论（p. 39－42），但是不管在哪，她都没有明确语用研究方法的意义：同时思考言语互动和针对客观现实的交流。

② Wittgenstein. *Les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217，p. 207.

③ 维莱拉（F. Varela）在谈论“人性化”的行为时坚持了生物层次和感知层次，cf. F. Valera, E. Thompson, E. Rosch, *L'inscription corporelle de L'esprit*, chap. 8：《L'enaction : cognition incarnée》, p. 207－248.

三、交流的形式

我们同意将交流命名为所有针对客观现实的介入，这样的话，就把它和人际间进行沟通的言语活动区分了开来。这些交流（人际间的合作模式）能够采用不同的形式，最好将它们定义一下。

单个行为

最简单的交流式样存在于单个行为（action singulière）中，即以自主方式进行的个人活动：在乡村中独自散步，用钢琴谱一段音乐，独自根据菜谱做一道菜，等等。这类单个的交流绝对依赖于唯一施动者，并符合个人计划的，且不假设其行为和其他施动者的行为有着协调性（coordination）。如果一个名叫“让”（Jean）的人在乡村中散步，那么这是他独自做出了走出去的决定，并且独自选择了他的路线，独自散步。这个行为是独立于其他人的所有活动的。

说完以上内容后，我们再谈谈同样在这些基本情况中，单个的行为仍然保留了其绝对的社会特点。无论多么单个、多么自主、多么单独，人类的行为都只有在社会情形中才有交流的涵义，社会情形或多或少地决定了单个人所采用的策略。除非在完全无人居住的地区散步，“让”的散步都会受到交通方面的社会性要求的指引：不能穿过尚未成熟的麦田，不管走小路还是大路他都应该靠左走（注：在法国行人靠左走），等等。因此，行为的单个性并不是来源于任何一个反社会性的特点，而只是来源于它的独立性：面对他人的行为和集体的计划所显示出来的局部的、临时的独立性。

集体行为

我们将集体行为（actions collectives）和单个行为对立起来，集体行为来源于对目标、目的、策略的共同一致，来源于采纳了共同策略的不同施动者的个体行为（actions particuliers）[①] 的协调性。

从种系发生的（phylogénétique）角度来看，集体行为优越于个人行为。生存的必要性不仅是对个人提出的问题，而且也是对整个种系提出的问题。第一位的回答是集体的行为表现，如防守、捕猎等等。例如我们可以想一下鱼群所发出的奇幻闪光，鱼群的拟态行为表现构成了既突然又不可预见地移动着的

---

① 我们需要在个人行为（action individuelle）中区分出自主的单个行为（actions singulières autonomes）和纳入了集体（共同的或联合的）行为中的个体行为（actions particulières）。

独一无二的虹彩云。在人类社会，集体的举止是最复杂的，但是能保证种系生存下去的规则、惯例和习俗的建立却总是集体性的。

同时，人类的集体举止（conduites collectives）在理论上表现出了首要性，我们不能够用机械的方法（简单地将单个行为求和）来解释集体举止。单一的个人意图的聚合解释不了集体的意向性[①]。相反，来源于人类举止制度化（institutionnalisation）的集体意向性，可以解释个人的意向性。意向性首先表现为集体性的，属于作为生活形式来研究的集体举止。

剩下要做的就是搞清楚什么是集体行为。我们根据相关协调性的复杂程度将集体行为分为两种式样：共同行为和联合行为[②]。

共同行为

共同行为（actions communes）符合集体意向性，其表现为选择同一目标和同一策略。共同行为的特征性存在于它的分配特点（caractère distributif），这涉及多个相同的个体行为的叠加。我们可以假设在“让”单独散步的过程中遇到了一辆抛锚的汽车。如果“让”很好心，帮助其推车，那么他就放弃了他散步这个单个行为，而和司机一起实现了一个共同行为[③]。一时间，两个人有了同一个目的——重新发动汽车，采纳了同一个策略——推动汽车（这不一定是好方法），并且同心协力地实现了相同的个体行为——推汽车。我们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是很简单的——为了同一个目标，同时一起做出同一类型的行为，这样的话力量可以成比例放大：“精锐部队的两百个士兵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在基座上竖起卢克索（Louqsor）的方尖碑；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能在两百天内完成同样的工作吗？”[④]埃及工人们只有采纳共同行为才可以移动巨大的石块。但是，建立宏伟的金字塔还要求其他的合作模式。我们设想一下，人类的交流很快就被引向于采用更复杂的式样：联合行为。

---

① Cf. *L'intentionnalité collective*，在这本书里塞尔维护了这样一个论题，集体的意图不能够简化为依靠共同信仰连接起来的个人意图。他把集体意向性看作“原始现象”，奇怪地将其表示为“团体的预意图的情感”，而忽略了集体意向性固有的制度范畴。

② 我们还可以细化一下分析，考虑一下多个行为（action plurielle），多个行为集合了多个受到同一情形约束、有着相同目的的不同的单个行为。慌乱现象就很典型，施动者们有着同样的目的——逃离险境，但是丝毫没有合作，完全就是“人人为自己”。

③ Cf. *L'intentionnalité collective*，p. 235：塞尔将一起推汽车这个事实作为集体行为的例子，但没有区分共同行为和联合行为。

④ Cf. Proudhon，*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p. 216.

联合行为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在把汽车推到了斜坡高处后在下坡时尝试了发动，汽车仍然固执地拒绝运转。在这种情况下，“让”还是那么的殷勤，他建议去临近的村子给乡镇的修车工打电话。“让”和那位不走运的司机抱着同样的目标：重新发动那辆难弄的汽车。但是，他们采纳了配合不同的个体行为这个策略：在“让”打听修车工的时候，司机等在了汽车中。这两个人从简单的集体行为（推）过渡到了更为复杂的联合行为（actions conjointes）。

和共同行为一样，联合行为是由联合的意图、对于共同目标的一致性（迅速确定的或是经过漫长协商确定的）来指引的。这个目标一般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它需要制订计划，能够预见到共同施动者的不同的个体行为之间的配合（共时）和链接（历时）。在这里，完全符合了布拉特曼（Michael Bratman）的直觉，他认为“我们是计划性的产物（planning creatures）。我们想出了朝向未来的意图，它们是更广阔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计划在进行着的协调和实用推理中扮演着特有的角色；这些计划使得我们可以扩展现在或将来的决议的影响”①。这种计划化总是开放的、部分的，它允许把联合目标分级为目的和子目的，这些目的和子目的导致了一种规定策略：将不同的个体行为连接起来。自此，每个人的行为都属于这个策略，并来源于从属于指导性联合意图的个人意图。编织了共同计划的个体行为构成了从属行为和分支行为。因此，“让”朝着村庄走去不再是一个纯粹散步的单个行为，它自此成了一个纳入到联合策略中的分支个体行为。分享的策略框架将交流的涵义赋予了个体行为。如果“让”没有遇见汽车抛锚的司机，那么他也许会继续朝着村庄走去，这个行为仍然是单个行为。尽管在物理上没有区别，但是现在他的行走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涵义，成了联合计划的一个因素。

将涵义赋予行为的同时，考虑个体行为的策略角色能够对共同施动者的行为条件和结果进行实用演算。

我们通过塞尔所粗略提及的例子来看联合交流这个新情况：足球比赛时在禁区附近罚任意球②。所有的发球方队员都被这个行为动员了起来，都为同一个目标所驱动：将任意球变成进球得分。一般来说，比赛中的罚球在训练中都被长时间地演练过。在一个运动员准备罚球的同时，其同队队员为了摆脱对手都在巧妙地跑动穿插。为了在场地上迷惑对手而使用拖延的手段等。罚球就此

---

① *Intentions, Plans and Pratical Reason*, chap. 1, § 1.2, p. 8.

② Cf. *L'intentionnalité collective*, p. 230, 233-234. 事实上，原来的例子讲的是美式足球。

组成了一个联合行为，它从属于共同的目标，来源于对罚球角度、力量的选择（为了使同伴的跑位行为发挥最大的作用）。如果说射手选择直接射门，并且射失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批评他没有把球传给完全摆脱了对手的其他同队球员。射手“踢得太自我了!”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行为的涵义和价值取决于它对共同目标的贡献和对集体策略的贡献[①]。

就这样，联合交流组成了人类举止的主要部分。它们定义了最复杂的社会合作的形式。在谈论合作（coopération）时，我们要小心，不要采纳联合行为会促使和解的观点。生命的舞蹈——探戈舞，死亡的舞蹈——斗牛舞，这两个舞蹈都构成了联合活动，但一个是协作的（collaboratif），另一个是竞争的（compétitif）（施动者的目的是敌对的）。更进一步说，协作的进行很少伴有竞争，联合交流一般结合了协作的分支行为和竞争的分支行为。

例如，如果罚任意球的行为不是由积极的对抗构成的，并不与对方球队队员的防守相对而言，那么罚任意球的行为就没有了任何涵义。很显然，一场足球赛是两个球队在踢，这构成了竞争。我们不仅应该把同一球队队员间的合作行为看作联合行为，还应该把对方球队队员的对抗行为也看作联合行为。两个球队的目标是对抗的：通过尽可能多地进对方球而赢得比赛。其策略是敌对的，但是所有的队员在合作上还是达成了一致：根据确定下来的规则踢一场足球赛。

合作不排斥对抗、敌对。我们认为施动者间的合作可以采用否定形式，不然的话我们就犯了纯洁主义（angélisme）的错误。当行为人的目的相反的时候，合作原则可以转向，或更甚者，可以被明显地侵犯。断定行为的构成原则授权、给予了谎言以语用涵义（cf. *supra*，chap. IV），同样，合作原则也给予了所有的诡计策略、操纵策略、竞争策略和冲突策略以涵义。克劳塞维茨（Clauzewitz）将战争看作是用其他方式对政治的延续，也就可以看作是合作的否定形式。互助的缔造基础也授权了斗争。合作并不排除竞争。

就此我们明白了联合交流中社会制度化的重要性。它在于确定竞争游戏的

---

① 如果我们再算上多个行为（actions plurielles），我们对交流的分析可以归纳为如下：

行为类型		目的	策略	行为
单个的		个人的	私人的	孤立的
多个的		提出相同的目的	私人的	不同的
集体的	共同的	接受相同的目的	相同的	相同的
	联合的	接受相同的目的	协调的	不同的

规则。在足球场上，裁判的存在体现了两支球队在遵守游戏规则上的先决一致性。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是如此。比照一下，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其他的联合交流。它们只有通过或多或少的仪式化才能获得调节的功能。

规则通常只确定总的框架，总的框架授权了符合复杂策略的游戏，但这个游戏中的每一步是不可预见的。行为取决于确定了的条件，但是它的后果却来源于游戏的状态和其他施动者的反应。行为的预期结果不一定是实际产生的后果。自此，联合行为的能动性造成了开放的、有创造力的过程。简而言之，我们面对的是情形中的活动。

然而，也有些情况中的举止表现出了预见性，这些举止一般都符合一个社会认可的程序化、计划化。通常被多次重复的社会游戏凝结成惯例，这些惯例详细规定了行为人的角色和功能，甚至是他们的举动和话语。我们可以想一下尚克（R. C. Schank）和阿贝尔森（R. P. Abelson）的“电影剧本”（scripts），看看饭店这个典型例子[①]。饭店中施动者的角色、沟通互动的形式和一系列的交流（选择桌子，点菜、点酒，等等）都被社会制定成了一成不变的脚本（scénario）[②]。

联合的意向性、分支行为的涵义就是这样通过计划化的制度化和策略选择的制度化构建起来并维持下去的。就此我们可以明白，单个行为构成了极特殊的情况：大部分的人类活动都属于完全社会性的交流，它们规范了人类举止的相互依存（interdépendance）。人类通过集体行为和联合行为（确定了他们的合作）建立并改造着他们的客观现实。

如果说单个行为可以表现为完全的沉默，那么这对于共同行为，以及更可能的联合行为来说是完全行不通的。“让”在遇见那位倒霉的司机时，为了了解司机的困难，分担他的困境，和司机约定一个解决问题的策略，“让”不得不和司机建立一个对话。如果不借助于言语互动就不会有共同交流或联合交流，言语互动保证了“让”对问题的领会、目标的选择、策略的确定及对集体行为的引导和控制。就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会话（conversation）和对话（dialogue），除了它们固有的互动意义外，只有通过融入构成了情形情境的交流进程中才会具有涵义和最终目的。为了分析人类举止，将互动和交流范

① Cf.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 根据视角来指引这些电影剧本：服务员的视角不是顾客的视角。

② 我们注意到，在基础层次，行为处置（dispositifs d'action）一般是身体性的，不一定是决定的客体：行为处置自动地展开。我可以决定回应那个要求我（根据脚本赋予他的权力）品尝葡萄酒的酒务总管，但我将胳膊伸向酒杯、抓住酒杯、将酒杯端到嘴边、喝一口等等并不需要决定。

畴交错在一起的必要性在分析既定话语行为的言后后果（conséquence perlocutoire）过程中显得很明显。单单停留在互动层次上会完全地、愚蠢地阻止对言后后果的理解。言后后果很明显不是约定的，也就是说，不属于语言的编码用法①，言后后果似乎不顺从于任何理论化②。对言后层次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在一系列交流（提供了进行分析的行为框架）中提出了话语行为的登录。说话人预期的言后目标（objectifs）和听话人产生的言后结果（suites）——或者是说话人不希望的言后结果③——都不来源于任何语言约定（convention linguistique），而是从属于实用理性、人类行为的理性，这种理性受到对话双方各自的身份、情形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共同目标和私人目标，参与的策略，所产生行为的可预见结果的支配。因此，在将互动和交流层次连接起来的同时，言后行为提出了一个真正的语用学分析，也就是真正的行为分析，真正的对人类沟通的分析。

在以上内容中，我们定义了作为共同施动者的人，描述了可能的交流形式的特点，提醒了将人类合作的互动和交流范畴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剩下还需要分析的就是言语互动，并认清其特征性。

四、言语互动

我们知道，奥斯汀把话语行为（将其看作说话人一个人的行为）作为意义的单位。自然，这种行为针对的是听话人。但是，听话人被简化成了行为接受者这个被动角色，负责理解说话人的初始意图④。他还提出了言外行为的言后目标，即行为在他人身上的预期效果。例如，威胁可以用来吓唬听话人。

奥斯汀附带指出，有一些说话人的话语行为，他管它们叫作签约行为（actes contractuels），要求听话人的回答作为补充。典型的情况就是婚礼仪式

---

① Cf. Austin, *Quand dire, c'est faire*, IXe Conf., p. 120："事实上，一般来说，如果不涉及说的行为，而涉及非约定的物理动作，那么事情要复杂得多。"

② 范德维克（Daniel Vanderveken）很有道理地指出"言后行为不是由陈述的意义确定的"，他把言后行为看作是语义"消除的"。然而，他没有把语用中的角色赋予言后行为，他把语用中的角色设想为"说话人的意义理论"，cf. *Les actes de discours*, chap. 2.4，§ A, p. 72, 74. 自此，话语行为的交流范畴简化为了它们的满意条件。

③ 奥斯汀引入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区分——言后目标和言后结果，cf. *Quand dire, c'est faire*, IXe Conf., p. 125："因此，我们可以说'我曾试图提醒他，但我只是吓到了他。"

④ Cf. *Quand dire, c'est faire*, IXe Conf., p. 124："言外行为的实施包括了保证其被正确地理解（the securing of uptake）。" cf. p. 129, 143.

上的相互承诺或者是用来确认打赌的同意[①]。不幸的是，这只涉及少数情况，并没有质疑对话语行为进行分析时的独白体的本质特点（cf. *supra*，chap. IV）。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类，奥斯汀定义的话语行为（签约行为除外）只能很局限地构成单个行为。当然，这种行为从沟通的本质来看，是建立在规则和社会符号之上的，但是它拥有固有的完备性和自主性。根据确定的社会约束，说话人选择并单方面地产生一个自主意义的话语行为。就此我们可以撇开其他的进程式样直接就对话语行为进行分类，这个分类被理解为选择仅服务于说话人沟通意图的表达模式。

作为联合活动的言语互动

然而，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已经指出过，对话语行为的分类从一开始就应该让对话双方——说话人/对话人都介入进来。我们还强调过，对行为类型进行语义划分仍然是一种抽象，并没有考虑到它们的对话体功能（cf. *supra*，chap. Ⅲ）。经常被举到的例子就是断定，在实际的互动进程中断定只有作为回答、接话、质疑等时才有对话体的事实（cf. *supra*，chap. VI）。

现在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陈述是这样的："您能不能告诉我时间?"根据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我们很自然地做出了语言学上的分析，这个分析主要是提供关于所涉问题的信息：现在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够单义地确定所涉及的话语类型。当然，通过问题这个明示形式（"您能不能……?"），这个陈述不能表达为任意一个行为类型。宣告类和承诺类首先被排除了，而其他的行为类型仍然在抽象上是可能的。话语行为的类型不能够仅根据相关陈述的语言学形式——例如疑问模态——机械地来确定。行为的界定依赖于它的对话体功能，也就是说，依赖于它在对话过程中的位置和角色、所使用的对话体策略、对话双方的地位、情形、交流的关键等等。

我们来研究一下语用学课的笔头考试的内容：

老师的问题："给我一个间接行为的例子。"

学生的回答："您能不能告诉我时间?"

在这样一个对话体语境中，我们的陈述具有回答老师提问的价值。在这种

---

① Cf. *Quand dire*, *c'est faire*, Ⅲ^e Conf. p. 65："例如，当我说'我和你赌六便士'，除非你说'同意'（或者说差不多意思的话），否则我想打赌的企图就失败了。"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送礼物、给人命名的行为等。在对失败情况的分类中牵涉到了"意外的障碍"（accroc）。互动因此没有一般的价值。

情况下，问题（您能不能……?）失去了作用，行为具有了元话语的地位，更确切地说是具有了引用类的地位（cf. *supra*，chap. Ⅲ）：陈述没有被使用，而是作为间接行为的例子被提及、被引用[1]。在这里，我们的陈述只有相对于引起这个陈述的先前陈述才具有价值和意义。实际互动中的话语行为不是像项链绳子上穿着的彩珠那样链接在一起的：它们表现出相互间的紧密依赖，并且相互定义。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口头对话的情形：两个路人在马路上相遇了。我们的陈述可以引起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每一次都会赋予陈述以不同的阐释。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五种情况。

情况 1：
路人甲："您能不能告诉我时间?"
路人乙："抱歉，我没有表。"

在这种情况中，我们的陈述是作为问题运转的。听话人将它认可为一个关于告知时间的实际可能性的直接问题（question directe），他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但是，对这个陈述的运用不是只有一种可考虑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况：

情况 2：
路人甲："您能不能告诉我时间?"
路人乙："晚上 6 点。"

在这种情况中，听话人考虑到了间接性，他针对说话人的间接请求直接给出了回答。陈述被认可为一种礼貌的命令形式。在这种情况中，由直接问题所表达的条件被合乎逻辑地假设为满足了。只要我们具有了知道时间的手段，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告知时间。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明示的情况。

情况 3：
路人甲："您能不能告诉我时间?"
路人乙："当然，晚上 6 点。"

除了它的寒暄功能，"当然"是对于直接问题的一个明示问答。

---

① Cf. *Sens et expression*，chap. 2，p. 71—100. 塞尔定义了间接行为，区分了字面上的次要言外行为——它掩盖了听话人推论出的原始（间接）言外行为。

听话人的回答在说话人留下的开放的涵义可能性中进行了选择，在上面几个例子中是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的。因此，对话是逐步由前馈（pro-action）和反馈（rétroaction）的不间断游戏构建起来的。一个话语行为组成了游戏中的一步，这个游戏以说话人对听话人的预测形式假设了前一步，并假设了后一步，在后一步的过程中听话人认可或不认可说话人的预测。这样的游戏被陈述所承载的句法约束和语义约束所限制，否则就完全不可沟通了，但是它仍然保留了足够的差值（amplitude），可以将对话变成有可能很丰富的、不断开放的创造物和一个不可预见的活动。同样，在我们前三个陈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增加很多变体，至少可以想出两种新的情况。

情况 4：

路人甲："您能不能告诉我时间？"

路人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提供给你时间：晚上 6 点。"

听话人假装将时间看成了一件我们可以拥有的物品，他纠正了用在初始问句中的"告诉"一词。就这样，他建立了一个元话语活动。接下来，他通过接受"提供"时间这个方式，暗含地认可了这个直接问题："您能不能……？"最后，他通过回答满足了间接请求。自此，这个听话人的诙谐答话通过初始的陈述结合了三个抽象的开放范畴：元语言评语、直接问题、间接请求。

最后一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拒绝回答。在这种情况中问题是一个约束性小于命令的指令，这就提供了拒绝的可能性。

情况 5：

路人甲："您能不能告诉我时间？"

路人乙："对不起，我没空。"

我们可以假设这里的听话人是一位漂亮的女性，她在赶时间，厌烦在马路上被纠缠。她没有把路人甲的问题解释为一个真正的请求，而是把它解释为一种非常老套的搭讪手段。她以赶时间为借口避开了回答。行为被剥夺了开始互动的基本功能。

因此，我们的陈述"您能不能告诉我时间？"绝没有机械地符合确定的话语行为类型，我们的陈述只能在互动进程中被定义，只有在实际交互中并通过实际交互才能获得对话体功能。在所考虑的语境中有五种解释在抽象上是可能的：

（1）否定回答构成了作为直接问题的陈述；

（2）断定提供了准确信息，作为对间接请求的直接回答；

（3）对直接问题的正面回答，紧接着是一个对间接请求的回答；

（4）更复杂的反应，它玩弄直接问题的用词（元话语范畴），但是也做了正面回答，接下来满足了对信息的间接请求；

（5）最后一个，拒绝回答直接问题，这剥夺了整个行为的资质。

我们将五种可能的回答总结为图 8-1，并对初始行为做出可能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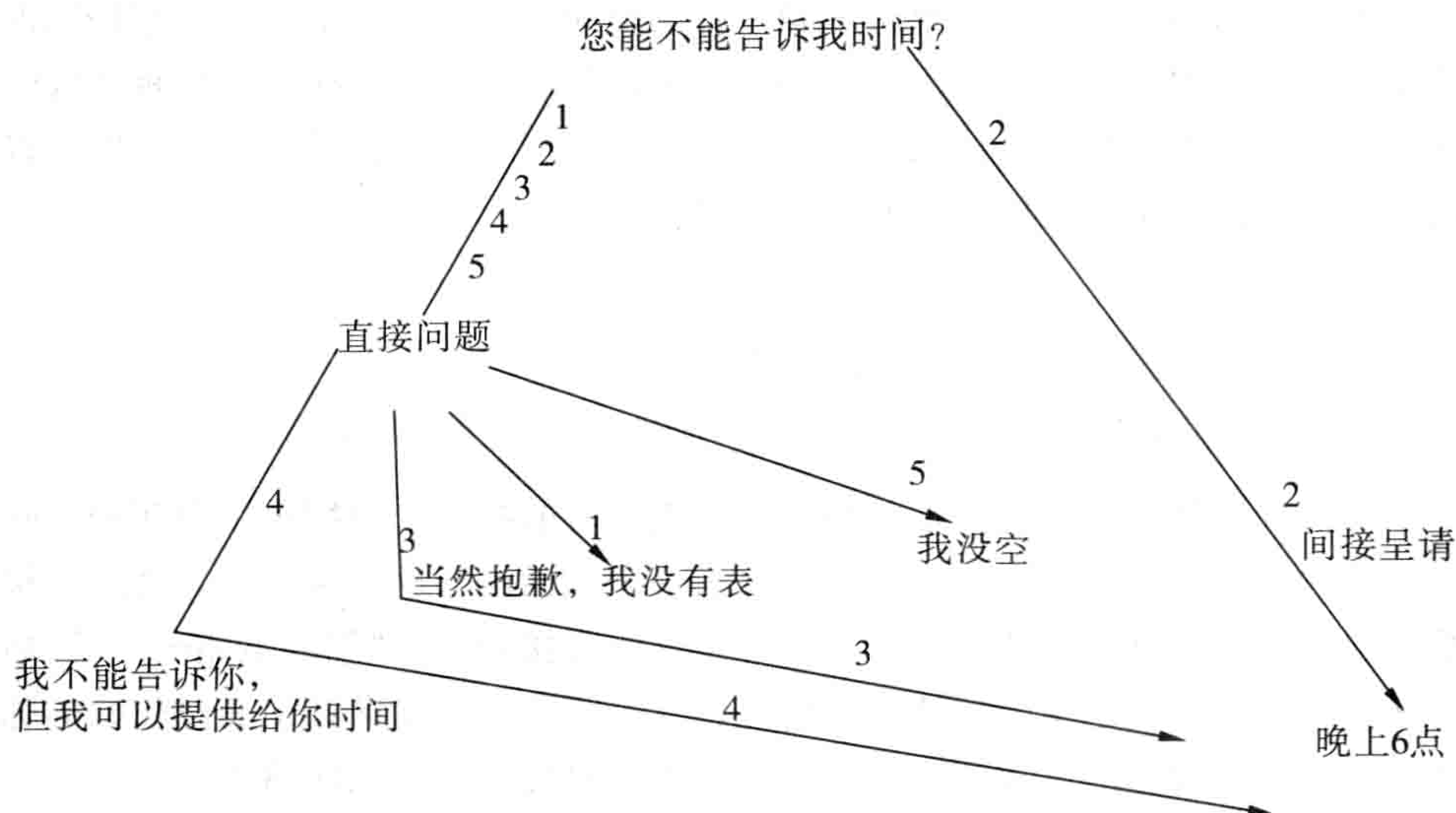


图 8-1　对一个互动行为进行解释的诸多可能性

这种既定陈述的对话体功能的可变性清楚地说明了话语行为只有作为游戏中的一步才有语用的实在性，我们同意叫它互动行为（interacte）。一个行为的对话体功能只有在和先于它的、和/或后于它的一个行为或多个行为的互动（interaction）中才能被确定。自此，话语行为不再构成单个行为，而是构成集体行为，更确切地说是联合活动①。

参与对话的双方就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合作。他们的互动是理性的，根据共同采纳的策略开展互动。通过投射的方式，对话双方遵循了动态模式，这些模式使得他们可以提前预料、回顾控制对话体进程的开展（cf. *supra*，chap. VI）。最后一点，每一个话语行为都来自于说话人固有的意愿，但是这种意愿是从属于共同对话体计划的。行为作为互动行为，应该是对前一个行为的反应，也应该是对后一个行为的投射预期。

① 克拉克（Herbert Clark），在 *Using Language* 中根据联合行为（他没有区分共同行为）提出了对会话的心理语言学分析。

整个言语互动表现为联合行为和一种情形中的活动①。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样，不仅个体行为（话语行为）离开了互动行为的交互就没有了涵义，而且互动过程本身也是不可预见的。在一些情况中，例如电视辩论，人们可以计划和编码地点、时间、角色等，但是却不能够预见到对话进行的实际模态（这就是电视直播风险的来源）。这是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过程，它即不符合预先确定的计划，也不符合预先确定的结构（cf. *supra*, chap. V）。然而，这样的过程并不是偶然的，它总是从属于一些规则（轮流发言的规则、会话规则等），例如投射模式的规则（cf. *supra*, chap. VI）。规则总是暗含的，并且随着进程的展开用于引导、控制活动。在实际的实在性中，发生的整个对话是一种冒险，这个冒险的发展和完成取决于情形、地点、时间、施动者、他们的最终目的、涉及的主题、连续遵循的策略等。整个对话是自主创造的互动。

言语互动的特征性

言语一直都是对他人、通过他人、和他人说的言语，否则就会显得很空洞，这是一个由社会确定的规则所产生的创造性游戏。对话表现出对联合活动的完美说明。对话组成了合作性游戏，它总是假设对话者之间的不同和对抗——这种对抗有着或多或少显现出来的形式。例如，信息性对话就建立在请求者（不知道）和回答者（被认定为拥有信息）之间最初的不同之上（cf. *supra*, chap. VI）。那么，它的特征性又在哪里呢？怎样区分客观现实的交流和人际间的言语互动呢？

我们首先注意到，虽然最好在理论上将两种类型的行为区分开（超言语的和言语的），但只要我们将整个对话看作是他律的过程（这个他律的过程在就客观现实的实际交流中获得涵义和最终目的），那么它们在实践上仍然是紧密叠加的。

问题在于要了解对意义的要求、对沟通互动的要求来自哪里。我们通过定义已经看到，人类所有的行为（由一个假设为理性的施动者发出）只有符合交流的最终目的并融入计划，才能获得涵义。所有的行为因此拥有交流的涵义。这个涵义在哪些方面还不足呢？

我们来考虑一个军事方面的例子。我们知道，在法国从弱到强的威慑理论中，战略核武器在使用毁灭性核武器之前绝对拥有最后警告的意义。但是，为

---

① 萨其曼（L. Sucheman）明确地将会话变为了情形中的活动这个范式。然而，她还局限于纯粹的常人方法学的感知，cf. *op. cit.*, chap. 5, p. 68—95.

了让敌人理解这个最后的警告，有必要让敌人理解威慑的“语义”。这来源于威慑理论的传播。因此，我们看到，一个行为的意义也可以从属于一个意义的行为（action de signification），也就是说，从属于运用这个行为的符号编码和言语编码。在我们刚才所考虑的情况中，因为我们想要避免实际使用战略性武器，所以对解释的要求就更加的急迫！一个没有明确威胁的威慑算什么呢？[①]

根据冷战背景下的交流关键，使用战略性武器的交流涵义也就夹杂了互动意义。在法国所发出的威慑话语中，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被明确编码为一个真正的沟通行为。从这个军事方面的例子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两点。

第一点，最好能够承认歌德式的格言“一切由行为开始”是值得怀疑的（cum grano salis）。纯粹的天然的行为自身并没有任何涵义。虽然行为提出了它的要求，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要求，但是只有在言语活动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才能定义它、思考它。奥斯汀已经指出，只有言语活动才可以将一个行为的物理效应的连续体（continuum）分割成几个有区别的行为：在最小的物理行为中是没有界限的。行为本身包含无限长的一系列“后果”，在这里——或者说应该在这里——就是言语活动理论的基本共同点，言语活动理论触及了一般“行为”。如果有人问我们，“他干了什么”，我们可以回答“他杀了驴”，或者“他开了枪”，或者“他按了扳机”，再或者“他扣动了食指”。所有的回答都是正确的。[②]

我们看到，在对话中人类施动者意识到了自身、他人和客观现实，人类施动者在言语活动中并通过言语活动思考了自己的行为并建立起复杂的计划，人类施动者通过话语保证了目的和策略的一致性并且控制了对集体行为的实现。似乎我们过多地思考了言语活动而不是行为，但是我们不应该与此相反，企图思考行为而不思考言语活动。

第二点，它回答了沟通行为的特征性、言语互动的特征性这个问题。

在传统的威慑理论中，使用战略核武器具有最后警告的语义价值。我们怎样才能从交流涵义过渡到一个真正的互动意义呢？应该是通过对威慑观点的编码和传播，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约定化（conventionnalisation）。人们在之前就用整个剧本创造了一个恐怖的言语游戏。

我们很容易再次看到关于举动符号的类似约定进程的痕迹。最初纯粹为了交流的举动（geste）被狭义编码后就成了纯沟通互动的支柱。例如伸出右手

---

① 因此，在冷战期间，“对话者”之间快速有效的沟通手段（热线电话等）得到了加强。

② *Quand dire, c'est faire*, VIIIe Conf., p. 118.

这个礼貌举动，或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否定举动。伸出右手这个礼貌举动是为了向对话者问好，在起源上，交流表示的是不想拔剑、抵消好战的举动。同样，从右往左摇头这个否定举动只是孩子试图吸食母乳这个举动的一个延续[①]。这些被约定的举动丧失了它们的初始交流涵义，转变成了简单的沟通互动。

言语互动构成了联合活动。就像联合交流一样，言语互动涉及精细的、开放的策略。但是互动的沟通性在于约定的因素，这些因素属于共同的语义编码和语用惯例。射门的足球运动员应用了全队所商讨的策略，对他队友的行为做出了反应，对他对手的行为做出了反应，等等。这个足球运动员介入了一些仍然保留着直接交流功能的行为，例如奔跑、急停、控球、起脚、触球、寻找身体平衡等等。吹响半场结束哨音的裁判也是根据游戏规则和他的角色而介入比赛的。他的行为也有交流涵义，但是他的吹哨举动是被立刻理解为一个约定信号，这个信号是任意性的。他的吹哨行为有着沟通意义，但是行为自身在物理的范畴内并没有交流的涵义——人们原本也是可以吹喇叭或者鸣枪的。

对话语符号的运用就更有理由这样了。言内行为（整个话语行为的基础）构成了特征性的行为，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是沟通，行为彻底落脚于对符号的任意编码（code arbitraire）的语义约定。同样，在言外层次上，话语行为依赖于约定的、历史上偶然的社会规则。

除非成为明文的约定（战略性武器的情况），一个对于客观现实的行为是有交流涵义的，但是就丧失了沟通的意义。行为拥有（交流的）涵义，就不能够再传达（互动的）意义。相反，言语互动的因素按照约定拥有互动的意义，那么自身就不再有交流的涵义了！

归根结底，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并不是本质，而是功能。在以上两种情况中，交流的涵义和互动的意义分属于两种制定人际关系以及人和其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方式。一切由行为开始。

---

① Cf. René Spitz, *De la naissance à la parole, la première année de la vie*, chap. XI :《Les origines et les début de la communication humaine》, p. 136－148. 史必兹（Spitz）将“不”看作为孩子所获得的第一个抽象概念。我们可以观察到胚胎时期的“挖掘反射”，它是婴儿吮吸反射的来源：寻找母乳的水平运动。这个预期的、有着肯定价值的举动在将近 6 个月的时候当孩子吃饱时就会转变为回避反射。在第 15 个月的时候，回避举动就会变成真正的具有拒绝语义的举动：“先天驱动的挖掘方案被用于了否定这个抽象概念，也就被纳入了沟通系统。”p. 146。

结　语

20 世纪逻辑学家们将言语活动的现象（phénomènes langagiers）作为了理论研究对象，同时也作为了哲学研究对象。因此，索绪尔将语言（langue）看作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有进行双重排除才能做到这一点：(1) 排除言语(parole)，言语被看作是个人的、“附属的，或多或少偶然的”语言实践；(2) 排除符号的指称意义（signification référentielle)，只考虑它们在语言构成的结构中的不同价值[①]。内在公设（postulat d'immanence）只把语言看作社会的、总是继承来的产物，看作符号的系统。

但逻辑学家们认为从指称出发对于真实性的思考表现出了关键性，迫于他们的压力，拒绝对指称进行语义思考首先做出了让步。自 1892 年起，弗雷格在他的奠基之作《函数和概念》(*Sinn und Bedeutung*) 中概述了符号的语义，符号的语义既承认了涵义也承认了指称。还有罗素在 1903 年发表的《数学原理》中，通过他的含义（meaning）理论和指谓（denoting）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意义的绝对指称概念[②]。班维尼斯特从语言学家的角度，从中得出了所有的结论，他认为除了联接构成符号的能指（signifiant）/所指（signifié）以外，还需考虑符号到事物的指称关系，并通过这种方式修正索绪尔对于符号的定义[③]。

对索绪尔第一个排除的质疑，也就是对“排除言语”的质疑，首先出现在了哲学家的著作中，接着出现在了分析普通言语活动的著作中。这些哲学家是皮尔斯（我们很晚才发现)、“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接着是奥斯汀。还有班维尼斯特，他提出了陈述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de L'énonciation)，陈述的语言

① Cf.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ntrod. chap. Ⅲ, & 1re partie, chap. 1. 必须补充上第三个方法论排除：排除文献学的系谱研究方法。索绪尔代之以结构研究方法、共时研究方法、历时研究方法。

② Cf.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 8—11, p. 54—75.

③ Cf.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 I, chap. IV:《La nature du signe linguistique》, p. 49—55.

学抛弃了对言语的排挤，开始研究语言的话语化[①]。我们应该遵从对话哲学和沟通理论。就这样，在20世纪中期语言学领域似乎最终完整了，既纳入了语义学也纳入了语用学。

但是，新的封闭类型的危险性是不能不考虑的。首先在语义学的层次上，逻辑分析最终被人们所接受，其形式化的能力和计算机植入的能力是值得称颂的。然而，逻辑工具却变成了特洛伊木马，被用来维护真实性的相符主义观点和言语活动的再现观点。我们已经谈过了（cf. *supra*，chap. Ⅳ），塞尔对于话语行为理论的理论化和形式化在这点上就特别得明显。接下来在语用学的层次上，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较高的层次上重现了索绪尔的内在论（immanentisme），他们信奉话语层次或沟通层次的自主性。在这里面，有对陈述语言学的狭义定义，它使得语用方面（被看作必要的补充）从属于语义核心；还有沟通的概念，它尽力在真实对话和它的退化形式之间做出区分，在导致一致同意的"沟通行动"和承受"策略"重力的无结果争论之间做出区分。因此产生了逻辑中间派（locentrisme），不再试图拯救语言的自主性，而是试图拯救话语的、对话的、沟通的自主性。

"行为转折点"（tournant actionnel）提供了纠正逻辑主义和逻辑中间主义这两个诱惑的方法。在继弗雷格之后（将断定力记入了逻辑话语的中心），在继"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之后（强烈否定了《逻辑哲学论》的作者[②]），在继奥斯汀之后（用研究言语活动的绝对陈述方法和命题方法揭露了"描述性幻觉"），我们开始把话语设想为一种行为形式。我们的意图是着重衡量这样的决裂，并从中得出理论的、哲学的结论。

我们尝试着给直觉（intuition）（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对于言语游戏所做的定义）加入技术内容，我们将言语互动或者对话体互动描述为一个开放的、不可预知的、创造性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联合活动的形式（cf. *supra*，chap. Ⅴ et Ⅷ）。但是，我们决没有意图否认沟通活动的特征性。在特征性方面，沟通活动强调了意义进程，从属于语义用法的初始约定，以及符号和话语行为的语用使用的初始约定。另外，它调动了控制对话体进程但不限定对话体进程的规则（例如发言顺序）和投射模式（cf. *supra*，chap. Ⅵ et Ⅷ）。

然而，为了拥有不可否认的特征性，言语互动就此没有了自主性。相反，

① Cf.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t. Ⅱ，chap. Ⅲ："这正涉及了解是否能够从符号到'言语'、怎样从符号到'言语'"和"语言的优先性在于同时包含符号的意义和陈述的意义"，p. 65.

② 译者注：《逻辑哲学论》（*Traci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实际为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著作，"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否定了他"前期的"观点。

从深层的“他律”（hétéronome）来看，互动只有扎根于交流进行的情形中才具有涵义和最终目的。互动游戏通过交流关键获得合法地位。“说”即是对他人的行动，或是和他人一起、为了他人或反对他人而对客观现实的行动。

在主体间的范畴内，交流首先被接受为建立信用条约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但是，不要认为（这再一次地重现了内在论的封闭性！）在对话中并通过对话建立起来的主体间化进程只涉及人的哲学和心理学范畴。我们已经谈过（cf. *supra*, chap. IV），信用条约需呈现在言语团体所构成的第三方（tiers）面前，人和用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地位、功能、角色等来描述的个体是不可分割的。主体间的交流借助于沟通互动而展开和阐明，它们不可避免地属于制度领域、社会领域。就此来说，不应该有这样的沟通的和解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纯理性的对话双方可以只通过逻辑论证的效力而互相说服。将“言语的理想情形”分离出来将导致唯心主义。

我们来看看交流的客观现实内范畴。这个范畴涉及了对话双方构建客观现实的进程，更一般地说，是团体成员们构建客观现实的进程。尽管认知语言学家不认同，但是涵义确实不是只存在于符号再现和符号操纵中，更是存在于既定团体在既定时刻所接纳的固有脚本、惯例、行为方案或行动处置的调动之中。同样，和逻辑工具所带来的相符主义相反[①]，从认识出发的真实性并不属于命题和事实之间、话语和实在性之间的相符，而是从属于真实（véridicité）的进程，根据暂时的定义，它来源于就确实性（certitude）达成的一致，确实性组成了客观现实的像（cf. *supra*, chap. IV）。我们所谈的、我们行动所针对的客观现实们（mondes）组成了互动和交流的社会构建的产物。除了如此的实在性，严格来说我们没什么别的可说的了[②]。

再来谈谈时间点，很有必要整理一下。我们指出，从历史来看，人们从语言推进到话语，从话语推进到行为，同样，语用学是在句法学和语义学之后才

---

① 然而，我们需要回忆一下，弗雷格是摒弃了相符主义的（cf. *supra*, chap. I），塔斯基对于真实性的定义明确地自称为“哲学上的中立”，cf.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 361：“事实上，对于真实性的语义定义不包含关于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例如‘雪是白的’这样的句子可以被断定——的任何内容。定义只包含：每当我们断定或拒绝这个句子时，我们应该准备好断定或拒绝句子‘雪是白的是真的’。”相符主义偏见的受害者不明白波普尔（Popper）为什么不容置疑地确定塔斯基平反了：“客观或绝对真实性的相符理论。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理论。事实上，塔斯基要求自由运用真实性的直觉概念，也就是要求和事实一致！”（*Conjectures et réfutations*, p. 331）

② Cf. Wittgenstein, *Tractatus*, 6. 44：“客观现实是怎样的并不神秘，它就是那样。”就此来说，既没有实在性的表现，也就更没有实在性的再现。因此，只有我们的客观现实们（nos mondes）才是可构建、可表达的。

形成的。从方法论来看，我们意图颠倒历史运动：由行为开始分析话语，并在语用的框架内重新阐释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我们试图在准确例子的基础上证实重新引导问题架构的方式可以开启富有生命力的研究前景，并描绘出有利于当前关于沟通现象和行为现象的各种研究进行跨学科合作的科研空间。

因此，我们远没有达到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完成了的顶峰，我们只是发现了可供后续探索的平台，各种各样的疑问仍然存在。首要的就是对于言语互动的复杂运转的疑问。我们尝试着勾勒出这类情形中的联合活动所具有的特征性。但是，为了详尽无疑地论述言语互动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丰富和创造力的强大，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然而，最关键的疑问也许就在于行为。我们强调了对行为进行定义的困难。行为没有客观标准，行为也不能够就自身、通过自身来获得涵义（cf. *supra*，chap. Ⅷ）。主要的问题在于交流关系制度化的方式，以及言语互动约定化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说的方式和行动的形式怎样链接起来。必须要探索这个盲点，为此，我们将交流涵义赋予了一些行为，同时又将互动意义授予给了另一些行为。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要解决行为这个核心问题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理论上的，要求构建人类行为学作为行动的一般方法论①。这涉及将意图、行为、计划、策略等的定义概念化、形式化。行为语用学旨在摆脱再现预设和相符主义预设的束缚，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再现预设和相符主义预设都是由对常见逻辑工具的无度运用所造成的，对于行为语用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分析和演算的形式工具。就这样，行为逻辑（logique actionnelle）兴起了，它支持了分析和形式化的要求。

第二个条件是固有哲学上的，这和第一个条件事实上是相关联的，要求深化对于话语和行为、互动和交流、约定化和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就像形式化工具一样，科学理论和科学概念不存在无关痛痒的、哲学上折中的用法。坚定的语用学必须摆脱再现主义、相符主义、独白主义和逻辑中间主义的预设。它不可避免地要对主体概念、意图概念、相信概念、符号化概念、指称概念、真实性概念和实在性概念进行重新评估。我们的论题是，与语用学关键（enjeux pragmatiques）相称的重新评估只能是实用主义的。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语用学产生于皮尔斯的实用哲学②。实用主义

① 在这里，我们和阿珀斯泰尔（Léo Apostel）的直觉不谋而合，cf. *Syntaxe*，*sémantique et pragmatique*，p. 295 & 308—310.

② 作为入门，cf. Claudine Tiercelin，*C. S. Peirce et le pragmatisme*.

(pragmatisme) 力求在哲学中应用实验方法，使学说的价值从属于它的效果。之所以莫里斯感觉到了就说话人以沟通为目的而运用言语活动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是因为他吸收了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用效果来衡量其理论）：如果一个关于言语活动的分析不能够解释言语活动的社会性运用的效果，那么这样的分析又有什么价值呢？因此，语用学就在于研究话语的沟通性使用的效果。

除了历史演变的偶然性之外，我们还将实用主义和语用学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哲学上的必然。在这里语用学所提的定义、所涉及的定义只有在吸取了实用主义的哲学框架内才有涵义，这个哲学框架结合了皮尔斯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论题。

我们举三个例子用以说明被这样理解了的语用学所具有的实用主义预设。

（1）我们将语用学变成对于言语互动的研究，就像皮尔斯最早做的那样，我们强调沟通交互中主体间的基本方面和社会性的基本方面。从这里得出了本质的关系研究方法（不再是肯定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将主体变成了符号产物和社会产物。人类是一种符号，思想是一种从自身到自身的对话——继承了主体间对话的内在化[①]。从中可以得出对话体视角（perspective dialogique），它在于将对话归入到规范了的社会性交流游戏中。

（2）我们否认语用学从属于语义学，这促使我们倒向皮尔斯和维特根斯坦对于涵义的批判。皮尔斯认为，涵义不是人们可以孤立出来的符号之外的某个既定事物：“想要分裂符号使其下降到涵义自身，就如同想要剥去洋葱皮使其下降到洋葱本身一样……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符号的生活。”[②] 自此，符号就不应该再根据想法和意义这些语义学标准来解释，简而言之就是不再根据我们掌握的“事物”及在思想中展开的“进程”来解释，而应该用行为习惯、行动处置等标准来解释。

维特根斯坦以差不多相似的方式认为：“命题的涵义存在于我们行为的最终目的之中。”

它根据确定目的的举止而从属于目的论的解释。它同时被解释为实践能力，为了行动而遵循某些规定的处置，以及来源于社会习得的习惯。涵义来源于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言语游戏来表达，而言语游戏则扎根于在社会性上和历史性上被确定了的生活形式之中。

追随着皮尔斯和维特根斯坦，我们将语言符号体系和近言语信号

① Cf. *Collected Papers*, 4. 6.

② Manuscrit de 1334, I, p. 43－44.

(signaux paraverbaux)、外言语信号（signaux épiverbaux）设想为同等数量的行为剪辑（montages actionnels）的指标和痕迹。

（3）最后一点，但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点，对于言语互动的分析不仅不是自主的，而且不能够通过任意一个先验的推断而接收绝对基础（fondement absolu）。更何况，语用学不能够提供在哲学上创立伦理学的手段，以及譬如阿佩尔就康德理论所提的内容[1]。皮尔斯和维特根斯特一样都不赞成原始的真实性。皮尔斯认为真实性是一种社会性获取，维特根斯坦只承认初始的确实性，它建立在历史上被确定了的客观现实的像之上。事实上，大部分语用表达方式（有时候表现为先验能力和一般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化上是被确定了的，例如明确谴责被设想为断定机能障碍的谎言（cf. *supra*，chap. IV）[2]。

归根结底，纯粹的行为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是唯一可以用来分析语言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它同时要求语用问题架构化和实用问题架构化。

---

① 关于语用创立伦理学这个企图的失败，cf. Jean-Marc Ferry，*Habermas*，*L'éthique de la communication*，chap. X，p. 483－508.

②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在将来发现人类特征的行为模式和构成整个社会活动的行为模式。但是，至少要警惕这样一种趋势：从过早被称为普遍的语用学出发，将从英语运用中或者从我们这个发达社会的生活形式中得出的经验类推到整个人类。

参考文献

虽然有些参考文献已经有了法文译本，但我们在这里还是列出原文文献。

Allen James F. et Perrault Raymond C.,《Analysing Intentions in Utteran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80, n⁰ 15, p. 143—179.

Amselek Paul,《Le locutoire et L'illocutoire dans les énonciations relatives aux normes juridiques》,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990, n⁰ 3, p. 385—413.

Apel Karl Otto, *Die logosauzeichnung der Menschlinchen Sprache*, trad. franç, par Marianne Charrière et Jean-Claude Cometti, *le Logos propre au langage humain*, Combat, Éd. de L'Éclat, 1994.

—《De Kant *à* Pierce : la transformation sémiotique de la logique transcendantale》,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1995, n⁰ 48, p. 49—70.

Apostel Léo,《Syntaxe, sémantique, et pragmatique》, in*Logique et 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 Jean Piaget (dir.), Paris,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1969, p. 290—311.

Aristote, *Rhétoriqu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91.

Armengaud Françoise, *la pragmatique*, Paris, PUF,《Que sais-je?》, 1985.

Austin John Langsham,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P, 1962, trad. franç. G. Lane, *Quand dire, c'est faire*, Paris, Seuil, 1970, rééd. avec une postface de F. Récanati, Paris, Seuil, coll.《Point》, 1991.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UP, 1961, trad, franç. L. Aubert et A. -L. Hacker, *Écrits philosophiques*, Paris, Seuil, 1994.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s*, trad. angl. de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de Fre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0.

Bally Charles,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t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Berne, Francke, 1994.

Bakhtine Mikhaïl, *Le principe dialogique*, trad. T. Todorov, Paris, Seuil, 1981.

Barthes Roland, *Système de la mode*, Paris, Seuil, 1967.

Benveniste Émil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t. 1, 1966; t. 2, 1974.

Bertoni N. et Trognon A., 《Structures communicationnelles de la situation thérapeutique》, in Q. Debray et B. Pachoud (éd.) *Le récit*, Paris, Masson, 1993.

Bilange Éric, *Le dialogue personne-machine*, Paris, Hermès, 1992.

Bilmes J., 《Misinformation and Ambiguity in Verbal Interaction: A Norther Thai Exemple》, *Linguistics*, 1975, n⁰ 164, p. 63—75.

Bloch I., 《An Introduction to Peirce's Theory of Speech Acts》, *Transaction of the Peirce Society*, 1981, XVII, n⁰ 4, p. 319—426.

Bonabeau Éric et Théraulaz Guy (éd.), *Intelligence collective*, Paris, Hermès, 1994.

Boole Georg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 (1854), New York, Dover, 1961.

Bourdieu Pierre,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Paris, Fayard, 1982.

Bouveresse Jacques, *La parole malheureuse*, Paris, Éd. de Minuit, 1971.

Bratman Michael E., *Intentions, Plans and Pratical Reas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7.

Brentano Franz,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LI et II, Leipzig, 1874, trad. franç. par M. de Gandillac, *Psychologie du point de vue empirique*, Paris, Aubier, 1944.

Brock Jarrett E., 《An Introduction to Peirce's Theory of Speech Acts》, *Transaction of the C. S. Peirce Society*, 1981, XVII, n⁰ 4, p. 319—326.

Brooks Rodney, 《Intelligence Without Rea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91, p. 1—27.

Buber Martin, *Ich und Du*, 1923, trad. franç. par G. Bianquis, *Je et Tu*, Paris, Aubier, 1969.

Buissière Évelyne, 《Idéal du dialogue ou idéal de la science? Un débat entre Ugo Spirito et Guido Calogero》, in D. Vernant (dir.), *Du dialogue*,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a langage》, Paris, Vrin, 1992, p.

31－68.

Caelen Jean,《Interaction homme-machine : théorie et pratique》, 4ᵉécole d'été de L'ARC-PRC CHM, juillet, 1993.

Calogero Guido, *Logo e Dialogo. Saggiv sullo Spirito Critico e la libertà di coscienza*, Milano, Edizioni di Comunità, 1950, trad. franç. par P. Van Bever, *Philosophie du dialogue. Essai sur L'esprit critique et la liberté de conscience*, Univ. de Bruxelles, 1973.

Carnap Rudolph,《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durch logische Analyse der Sprache》, *Erkenntnis*, II, 1932, p. 210－241,《Le dépassement de la métaphysique par L'analyse logique du langage》, in *Manifeste du cercle de Vienne et autres écrits*, A. Soulez, Paris, PUF, 1985.

—*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Londr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37.

—《On Some Concepts of Pragmatics》, 1955, rééd. in*Meaning and Necessity*, Chicago Press, 1947, nouv. éd., 1988, p. 248－250. tr. fr., Paris, Gallimard, 1997.

Carroll Lewis,《What the Tortoise said to Achilles》, *Mind*, NS vol. IV, décembre 1894, trad. franç.《Ce que se dirent Achille et la tortue》, in *Logique sans peine*, J. Gattegno et E. Coumet, Paris, Hermann, 1966, p. 242－246.

Chauviré Christiane,《Peirce, le langage et L'action, sur la théorie peircienne de L'assertion》,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n⁰ 1, 1979, p. 3－17.

—*Peirce et la signification*, *Introduction à la logique du vague*, Paris, PUF, 1995.

Cherniack Christopher, *Minimal Rational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Chisholm Roderick,《Sentences about Believing》,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56, n⁰ 56.

Church Alonzo,《Comparison of RusselL's Resolution of the Semantical Antinomies with that of Tarski》, *The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décembre 1976, vol. 41, n⁰ 4.

Clancey William J.,《Situated Action: A Neuropsychological Interprétation. Response to Vera and Simon》, *Cognitive Science*, vol. 17, n⁰ 1,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January－March 1993, p.

87—116.

Clark Herbert, *Using Language*, Cambridge UP, 1996.

Cohen P. R. et Perrault C. R., 《Elements of a Plan-Based Theory of Speech Acts》, *Cognitive Science*, 1979, n⁰ 3, p. 177—212.

Cohen P. R. et Levesque H. J., 《Intention is Choice with Commit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90, vol. 42, n⁰ 3.

Cohen P. R., Morgan J. et Pollack M. E. (éd.), *Intentions in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Dascal Marcelo, 《The Pragmatic Structure of Conversation》, in (*on*) *Searle on Conversation*, Searle *et al.*, J.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Dascal Marcelo et Tamar Katriel, 《Digressions: A Study in Conversational Coherence》, in *Journal for Descriptive Po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1979, n⁰ 4, p. 203—232.

Daval René, *Moore e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Paris, PUF, coll. 《Philosophies》, 1997.

De Cordemoy Géraud, *Discours physique de la parole*, Paris, Bibliothèque du Graphe, 1970.

De Saussure Ferdinand,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1968.

Dennett Daniel, *The Intentional Stance*, MIT Press, 1987, trad. franç. par Pascal Engel, *La stratégie de L'interprète*, Paris, Gallimard, 1990.

Descartes René,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aris, Vrin, 1966.

—*CEuvres et lettres*, Paris, Gallimard, La Pléiade, 1953.

Dreyfus Hubert, 《Les ordinateurs peuvent-ils être vraiment intelligents?》 in *Critique*, *Les philosophes anglo-saxons par eux-mêmes*, Paris, Éd. de Minuit, aoüt-septembre 1980, p. 730—742.

Falzon Pierre, *Ergonomie cognitive du dialogue*, PU Grenoble, 1989.

Ferber Jacques, *Les systèmes multi-agents*, vers *une intelligence collective*, Paris, InterEditions, 1995.

Ferry Jean-Marc, *Habermas*, *L'éthique de la communication*, PUF, 1987.

Fodor J. A.,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NY, Thomas Y. Crowell, 1975.

Foucault Michel,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

Frankfurt Harry G., 《The Problem of Acti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terly*, n⁰15, 1978, tard. 《Le problème de L' action》, in *Théorie de L'*

action, par Marc Neuberg, Liège, Mardaga, 1991, p. 241—251.

Frazer N. M. et Gilbert G. N. , 《Simulating Speech Systems》, *Computer, Speech and Language*, 1991, n^{0}5, p. 81—99.

Frege Gottlob, *Begriffsschrift*, L. Nebert, Halle, 1879, tard. angl. in *From Frege to Gödel*, éd. by Jean van Heijenoort, Harvard UP, 1967, p. 11 — 12; trad. franç. H. Sinaceur, in *Logique et Fondements des mathématiques*, Anthologie (1890—1914), F. Rivenc et Ph. de Rouilhan (éd.), Paris, Payot, 1992, p. 93—130.

— 《Über den Zweck der Begriffsschrift》, 1882 — 1883, trad. franç. par. Claude Imbert, 《Sur le but de L'idéographie》, *Écrits logiques et philosophiques*, Paris, Seuil, 1971, p. 70—79.

— 《Funktion und Begriff》, Jena, 1891, *Kleine Sc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I. Angelelli, G. Ohms, Hildesheim, 1967, trad. franç. par. Claude Imbert, 《Fonction et concept》, *Écrits logiques et philosophiques*, Paris, Seuil, 1971, p. 80—101.

— 《Sinn und Bedeutung》,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100, 1892, trad. franç. par. Claude Imbert, 《Sens et dénotation》, *Écrits logiques et philosophiques*, Paris, Seuil, 1971, p. 102—126.

— 《Die Verneinung》,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 n^0 3—4, 1918—1919, p. 143—157; trad. franç. par. Claude Imbert, 《La négation》, *Écrits logiques et philosophiques*, Paris, Seuil, 1971, p. 195—213.

— 《Der Gedanke》, *Beiträge zur Phil.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1, 2, 1918, p. 58 — 77, trad. Cl. Imbert, 《La pensée》, *Écrits logiques et philosophiques*, Paris, Seuil, 1971, p. 170—195.

Frege Gottlob, Lettre du 3 avril 1920 *à* Wittgenstein, trad. Jean-Maurice Monnoyer, in*Philosophie*, Paris, Éd. de Minuit, 1992, n^0 34, p. 11—14.

—*Nachgelassene Sc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hermes *et al.* Hambourg, Félix Meiner, 1969.

Freud Sigmund, *Die Traumdeutung*, 1900, trad. franç. *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 Paris, PUF, 1967.

— 《Die Verneinung》, *Imago*, 1925, n^0 11 (3), p. 217—221, trad. franç. 《La négation》, *Résultats, idées, problèmes*, II, Paris, PUF, 1985.

Gallo Maria-Caterina et Rouault Jacques, 《Schémas d'action et types de procès》, *Intallectica*, 1992, n⁰ 1/2, p. 105—127.

Gadamer Hans Georg,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60/1990, trad. franç. *Vérité et méthode*, Paris, Seuil, 1976/1996.

Gardies Jean-Louis, *Esquisse d'une grammaire pure*, Paris, Vrin, 1975.

Gantzen Gerhard,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logische Schließen》, *Mathematische Zeitschrift*, 1934, n⁰ 39.

Gentzen René, *Shakespeare les feux de L'envie*, Paris, Grasset, 1990.

Goffman E., *Façons de parler*, Paris, Minuit, 1987.

Goodman Nelson et Elgin Catherine, *Esthétique et connaissance*, trad. Roger Pouivet, Combas, Éd. de L'Éclat, 1990.

Goodman Nelson, *Ways of Worldmaking*, Hackette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trad. franç. par Marie-Dominique Popelard, *Manières de faire des mondes*, Nîmes, Éd. J. Chambon, 1992.

Greimas Algirdas Julien, *Du sens II*, Paris, Seuil, 1983.

Grice H. Paul,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Coles et Moeg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58, 1967, trad. franç. par Frédéric Berthetn et Michel Bozon, 《Logique et conversation》, *Communication*, Paris, Seuil, juin 1979, numéro spécial 30, p. 57—72.

Grillo Éric, 《La volonté de s'entendre: Dialogue et intentionnalité》, in D. Vernant (dir.), *Du dialogue*,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Paris, Vrin, 1992, n⁰ 14, p. 203—218.

Habermas Jürgen, *Theorie des kommunication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trad. franç. par J. -M. Ferry et J. -L. Schlegel, *Théorie de L'agir communicatonnel*, Paris. Fayard, 1987.

Hallen B. et Sodipo J. O., *Knowledge Belief and Witchcraft*, Londres, Ethnographica, 1986.

Hamann Georg, *Metakritik über den Purismus der Vernunft*, 1784, in *Hamanns Scriften*, éd. F. Roth, Berlin, G. Reimer, 1831—1843, Ⅶ.

Hansen C.,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Michigan UP, Ann Arbor, 1983.

Harel David, *First-Order Dynamic Logic*,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68,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79.

Harnad Stevan, 《Other Bodies, Other Minds: A Machine Incarnation of an Old Philosophical Problem》, *Minds and Machines*, 1,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 43—54.

Harris Z., *A Grammar of English 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New York, Wiley, 1982.

Harrison Harry et Minsky Marvin, *The Turing Option*, NY, Warner Books, 1992, trad. franç. par Bernard Sigaud, *Le problème de Turing*, Paris, R. Laffont, 1994.

Heinzmann Gerhard, 《La logique dialogique》, in D. Vernant (dir.), *Du dialogue*,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Paris, Vrin, 1992, n⁰ 14, p. 249—261.

Hermant Alex et Lesage Christian, *L'électricité atomosphérique et la foudre*, Paris, PUF, 1997.

Hilbert David, 《Axiomatisches Denken》, *Mathematische Annalen*, 78, 1918, p. 405—415.

Hodge Andrew, *Alan Turing: the Enigma of Intertelligence*, Burnett Books, 1983, trad. franç. par Nathalie Zimmermann, *Alan Turing ou L'énigme de L'intelligence*, Paris, Payot, 1988.

Jacques Francis, *Dialogiques. Recherches Logiques sur le dialogue*, Paris, PUF, 1979.

—*Différence et subjectivité*,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82.

— 《Du dialogisme à la forme dialoguée: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pproche pragmatique》, in*Dialogu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Dascal (é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gny, 1985, p. 27—56.

—*L'espace logique de L'interlocution*, Paris, PUF, 1985.

Jakobson Roma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rad. franç. Nicolas Ruwet, Paris, Éd. De Minuit, 1963.

Jaskowski Stanislaw, 《On the Rules of Supposition in Formal Logic》, *Studia Logica*, n⁰ 1, 1934, p. 5—32. rééd., in McCall (éd.), *Polish Logic* 1920—1939, Oxford, Clarendon UP, 1967, p. 232—258.

Jullien François, *Le détour et L'accès: Straté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èce*, Paris, Grasset, 1995.

Kant Emmanuel, *Anthropologie d'un point de vue pragmatique*, trad. franç.

Michel Foucault, Paris, Vrin, 1991.

—*D'un prétendu droit de mentir par humanté*, trad. franc. par Françoise Proust,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94.

—*Fondation de la métaphysique des moeurs I*, trad. Alain Renaut, Paris, Flammarion, 1994.

—*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trad. Tremesaygues et Pacaud, Paris, PUF, 1944.

Kerbrat-Orecchioni Catherine, 《Le texte littéraire : non-référence, autoréférence ou référence fictionnelle》, in*Texte*, 1982, n° 1, p. 27—49.

— 《Pour une approche pragmatique du dialogue théâtral》, in *Pratiques*, 1984, n° 41, p. 46—62.

— 《Variations culturelles et universaux dans le fonctionnement de la politesse linguistique》, *Le dialogique, sur les forme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linguistiques et cognitives du dialogue*, Berne, Peter Lang Éd. , coll. 《Scienc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1997.

Kleene Stephen Cole, 《Proof by Cases in Formal Logic》, *Ann. of Math.*, 2 s. , 1934. vol. 35, p. 529—544.

—*Mathematical Logic*, NY, J. Wiley & Sons, 1967, trad. franç. par Jean Largeault, *Logique mathématique*, Paris, A. Colin, 1971.

Koyré Alexandre, *Réflexions sur le mensonge*, Paris, Éd. Allia, 1996.

Kuhn Thomas S.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P, 1962, trad. franç. *La structure des révolutions scientifiques*, Paris, Flammarion, 1972.

Lacan Jacques,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Lalande André, *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Paries, PUF, 12^e^éd. , 1976.

Laërce Diogène, *Vies, doctrines et sentence des philosophes illustres*, vol. 1 et 2, trad. franç. par Robert Genaille,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5.

Lakoff R. , 《The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p*'s and *q*'s》, in *Papers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hicago, 1973, p. 292—305.

Lassègue Jean, 《Le test de Turing et L'énigme de la différence des sexes (Pour un dialogue entre cognitivisme et psychanalyse)》, in *Les contenants de*

pensée, D. Anzieu (dir.), Paris, Dunod, 1993, p. 145—196.

Laugier Sandra, 《Le dialogue et L'apprentissage du langage》, in D. Vernant (dir.), *Du dialogue*,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Paris, Vrin, 1992, n⁰ 14, p. 87—111.

Leibniz Gottfried W.,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 G. W. Leibniz*, Berlin, Éd. Gerhardt, 1875—1890.

Lesniewski Stanislaw, 《Grundzüge eines neuen Systems der Mathematik》, *Fundamenta Mathematicae*, 1929, 14, p. 1—81.

— 《O Podstawach matematyki》, *Przeglad filozoficzny* (1927 — 1931), trad. franç. par Georges Kalinowsk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mathématique*, PARIS, Hermès, 1989.

Lestel Dominique, 《Une multimodalité problématique : communications symboliques des primates non humains, tromperie tactique et socialité postulée》, *Quatrième école d'été de L'ARC : communication et multimodalité dans les systèmes naturels et artificiels*, Bonas, juillet 1993, p. 189—202.

Levi-Strauss Claude,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Plon, vol. 1, 1958 et vol. 2, 1973.

Luschei E. C., *The logical Systems of Lesniewsk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2.

Luzzati Daniel, *Recherches sur le dialogue Homme-Machine*: modèles *linguistiques et traitement automatiques*, thèse d'État, Paris Ⅲ, 1989.

— 《Un modèle dynamique pour le dialogue home-machine》, in D. Vernant (dir.), *Du dialogue*,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Paris, Vrin, 1992, n⁰ 14, p. 263—293.

—*Le dialogue verbal Homme-Machine*, *études de cas*, Paris, Masson, 1995.

Marienstras R., *Le proche et le lointain*, Paris, Éd. de Minuit, 1981.

McCulloch W. S., *Embodiements of Mind*, MIT Press, 1965.

McCulloch W. S. et Pitts W. H., 《A Logical Calculus of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1943, vol. 5, trad. franç., in A. Pellissier et A. Tête (éd.), *Sciences cognitives*, *texts fondateurs* (1943—1950), Paris, PUF, 1995.

Mersenne (R. P.), *Secondes Objections aux Méditations*, in 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aris, Éd. de la Pléiade, 1966.

Meyer Michel, *De la problématologie, philosophie, science et langage*, Bruxelles, Mardaga, 1986.

Miéville Denis et Vernant Denis (dir.), *Stanislaw Lesniewski aujours'hui*,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Paris, Vrin, 1995, n° 16.

Miéville Denis, *Un développement des systèmes logiques de Stanislaw Lesniewski, protothétique, ontologie, méréologie*, Berne, Peter Lang, 1984.

Moeschler Jacques, *Modélisation du dialogue, représentation de L'inférence argumentative*, Paris, Hermès, 1989.

Montague R., 《Pragmatics and Intensional Logic》, in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D. Davidson et G. Harmann (éd.), Dordrecht, Netherlands, Reidel, 1972.

Moore G. E.,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Moore*, P. A. Schilpp (éd.), Open Court, 1942, p. 542—543.

Morris Charles W.,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y of Unified Sciences*, 1938, Neurath, Carnap & Morris, Chicago UP, p. 77—138, trad. des trois premiers paragraphes, in *Langages*, septembre 1974, n° 35, p. 15—21.

Muller Robert, *Les mégariques*, Fragments & témoignages, Paris, Vrin, 1985.

Neuberg Marc, *Théorie de L'action, textes majeurs de la philosophie de L'action*, Bruxelles, Mardaga, 1991.

Newell A., 《Physical Symbol Systems》, *Cognitive Science*, 1980, n° 4, p. 135—183.

Newell A., Show J. -C. et Simon H. -A., 《Programming the Logic Theory Machine》, *Western Joint Computer Conference*, 1957.

Nietzsche Friedrich, *Das Philosophenbuch, Theoretische Studien*, 1872—1875, trad. franç. par Angèle K. Marietti, *Le livre du philosophe*, Paris, Bilingue Aubier-Flammarion, 1969.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1886, *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 Paris, UGE, 1973.

Ozkan Nadine, *Analyses communicationnelles de dialogue finalisé*, thèse, INPG, ICP, Grenoble, 1994.

Parret Herman (dir.), *La communauté en paroles, communications,*

consensus, *ruptures*, Bruxelles, Mardaga, 1991.

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C. Hartshorne et P. Weiss (é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vol. I—VI, 1933—1935, vol. Ⅶ—Ⅷ, 1958, rééd. 1960.

—*Écrits sur le signe*, rassemblés et traduits par Gérard Deledalle, Paris, Seuil, 1978.

Piaget Jean, *Biologie et connaissance*, Paris, Gallimard, 1967.

Pierrel Jean-Marie, *Dialogue oral Homme-Machine*, Paris, Hermès, 1987.

Platon, *Théétète*, trad. franç. par Émile Chambry,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n⁰ 163, 1967.

—*Premiers dialogues*, trad. franç. par Émile Chambry,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n⁰ 129, 1967.

—*Apologie de Socrate*, *Criton*, *Phédon*, trad. franç. par Émile Chambry,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n⁰ 75, 1965.

Polanyi Michael, *Person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

Popper Karl, *Conjectures et réfutation*, Paris, Payot, 1985.

Post Emil Leon, 《Introduction to a General Theory of Elementary Propo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43, 163—185, 1921, trad. franç. 《Introduction à une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propositions élémentaires》, in *Logique mathématique*, par Jean Largeault, Paris, A. Colin, 1972, p. 29—53.

Potte-Bonneville Mathieu, 《La violence dans le débat philosophique》, in D. Vernant (dir.), *Du dialogue*,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Paris, Vrin, 1992, p. 219—248.

Putnam Hilary,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MIT, 1988. trad. par Cl. Engel-Tiercelin, *Représentation et réalité*, Paris, Gallimard, 《NRF-Essais》, 1990.

Proudhon Pierre-Joseph,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Paris, Marcel Rivière, 1840.

Ridley M. R. (éd.), *The Arden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Harw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Rorty Richard (éd.),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UP, 1967.

Rossi Pio, *Un vocabulario per a menzogna*, 1639, trad. Par M. Gallot, *Dictionnaire du mensonge*, *Paris*, Éditions Allia, 1996.

Russell Bertrand,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Londres, Allen &Unwin, 1903, 2e éd. , 1938.

— 《Meinong's Theory of Complexes and Assomptions》, I, Ⅱ et Ⅲ, *Mind*, 1904, NS 13.

— 《The Theory of Impl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1906, XXⅧ, p. 159—202.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Oxford UP, 1912, trad. franç. par François Rivenc, *Problèmes de philosophie*, Paris, Payot, 1989.

Russell Bertrand et Whitehead Alfred N. , *Principia Mathematica*, 1re éd. , vol. Ⅰ, 1910; vol. Ⅱ, 1912; vol. Ⅲ, 1913; 2e éd. , vol. Ⅰ, 1925; vol. Ⅱ et Ⅲ, 1927, cité ici d'après Paperback Edition to * 56, Cambridge UP, 1973.

Sabah Gérard,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le langage*, *représentation des connaissances*, Paris, Hermès, vol. 1, 1988; vol. Ⅱ, 1989.

Schank R. C. et Abelson R. P. ,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 Hillsdale, New Jersey, L. Erlbaum Associates, 1977.

Searle John R. , et Vanderveken Daniel, *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ary Logic*, NY, Cambridge UP, 1985.

Searle John R. , 《Austin on Locutionary and Illocutionary Act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8, 77, n0 4, p. 405—424.

—*Speech Acts*, Cambridge UP, 1969. trad. Franç. par H, Pauchard, *Les acts de langage*, *essai de philosophie du langage*, Paris, Hermann, 1970.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ambridge UP, 1975, trad. franç. par Joëlle Proust, *Sens et expression*, Paris, Éd. de Minuit, 1982.

—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UP, 1983, trad. franç. par Claude Pichevin, *L'intentionalité* [sic], *essai de philosophie des états mentaux*, Paris, Éd. de Minuit, 1985.

—*Minds*, *Brains and Science*, 1984, trad. franç. par Catherine Chaleyssin, *Du cerveau au savoir*, Paris, Hermann, 1985.

—《L'Intentionnalité collective》, trad. par Carmela Spagnoleti, in *La communauté en paroles, communication, consensus, ruptures*, Herman Parret (éd.), Liège, Mardaga, 1991, p. 227—243.

—《Conversation》, in (*On*) *Searle on Conversation*, Searle *et al.*, Parret H. et Verschuren J. (éd.), J.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trad. franç. par Claudine Tiercelin, *La redécouverte de L'esprit*, Paris, Gallimard, 1995.

Simon Herbert-A.,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Cambridge, États-Unis, MIT, 1969, trad. par Jean-Louis Le Moigne, *Sciences des systèmes, sciences de L'artificiel*, Paris, Dunod, 1991.

Smolensky Paul, 《IA connexionniste, IA symbolique et cerveau》, in Daniel Andler (dir.), *Introduction aux sciences cognitives*, Paris, Gallimard, 1992.

Sperber Dan, 《The Epidemiology of Beliefs》, in C. Fraser et G. Gaskell (éd.),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Widespread Belief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Spitz René A., *The First Year of Lif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5. trad. par Liliane Flournoy, *De la naissance à la parole, la première année de la vie*, Paris, PUF, 1968.

Stanislavski C., *Othello de Shakespeare* (trad. de F. -V Hugo refondue par C. et R. Lalou) *avec la mise en scène et les commentaires de C. Stanislavski*, trad. de N. Gourfinkel, Paris, Seuil, 1948.

Stroud Barry, 《The Background of Thought》, in E. Lepore et R. Van Gulick (éd.),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p. 245—258.

Suchman Lucy, *Plans and Situated Action: The Problem of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arski Alfred, 《Le concept de vérité dans les langages formalisés》, in*Logique, sémantique, métamathématique*, 1923—1944, t. 1, éd. G. G. Granger, Paris, A. Colin, 1972, chap. Ⅷ, p. 160—269.

Tarski Alfred,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hilosophy and Phenmenological Research*, n⁰ 4, 1944, p. 341—375.

Tiercelin Claudine, *La pensée-signe*, Nîmes, Éd. J. Chambon, 1993.

—*C. S. Peirce et le pragmatisme*, Paris, PUF, coll. 《Philosophies》, 1993.

Tasso Torquato (Le Tasse), *DelL'arte del Dialogo*, 1586, trad. franç. par Florence Vuilleumier, *Discours sur le dialogu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92.

Trognon Alain et Brassac Christian, 《Enchaînement conversationnel》,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n⁰ 13, Théorie des actes de langage et analyse des conversations, Univ. de Genève, 1992, p. 76—107.

Trognon Alain et Larrue Janine, *Pragmatique du discours politique*, Paris, Colin, 1994.

Turing Alan,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1950, vol. LIX, n⁰ 236, *in* Alan Ross Anderson (éd.), *Minds and Machine*, Prentice-Hall, 1964; trad. franç. par Patrice Blanchard, 《Les ordinateurs et L'intelligence》, in *Pensée et machine*, Seyssel, Champ Vallon, coll. 《Milieux》, 1983, p. 38—67.

— 《Intelligent Machinery》, Executive Committee NPL, 1948, p. 1—20, HMSO Publications, Londres, réimpr., in B. Melzer et D. Michie (éd.), *Machine Intelligence*, 1969, n⁰5, p. 3—23.

Vanderveken Daniel, *Les actes de discours*, Bruxelles, Mardaga, 1988.

— 《On the Unif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and Formal Semantics》, in*Intentions in Communication*, P. R. Cohen, J. Morgan et M. E. Pollack (éd.), chap. 11, 1990, p. 195—219.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vol. 1: *Principles of Language Use*, vol. 2: *Formal Semantics of success and Satisfaction*, Cambridge UP, 1990, 1991.

— 《Non-Literal Speech Acts and Conversational Maxims》, in*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p. 371—384.

— 《La théorie des actes de discours et L'analyse de la conversatio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Théorie des actes de langage et analyse des conversations, Univ. De Genève, 1992, n⁰3.

—*Principles of Speech Act Theory*, manuscrit communiqué par L'auteur, 1993.

Varela F., Thompson E. et Rosch E., *L'inscription corporelle de L'esprit. Sciences cognitives et* expérience *humaine*, Paris, Seuil, 1993.

Vera Alonso H. et Simon Herbert-A., 《Situated Action: A Symbolic

Interprétation》, *Cognitive Science*, vol. 17, n⁰1,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January-March 1933, p. 7—48.

Vernant Denis,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 Bruxelles, Mardaga, 1986.

— 《Stratégies de représentation des connaissances en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nseignement philosophique*, novembre-décembre 1989, n⁰ 2, p. 41—59.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Paris, Vrin, 1993.

— 《Le statut de la vérité dans le calcul implicationnel de Russell en 1903》,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2/1997, n⁰ 200, p. 221—229

—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mathématique de S. Lesniewski》, *Revue de métaphisique et de morale*, Paris, à paraître.

Weizenbaum Joseph,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 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 San Francisco, W. H. Freemen, 1976.

Wiener N. et Rosenblueth A. , 《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1943, trad. franç. in *Études philosophiques*, 1961, n⁰2.

Winograd Terry, *Understanding Natural Langua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2.

Wittgenstein Ludwig, 《Logische-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 Leipzig, 1921, trad. angl. par L. K. Ogden et F. P. Ramsey et introd. par B. Russel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res, 1922; trad. franç. Gilles Gaston Granger, Paris, Gallimard, 1993.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Oxford, Blackwell, 1953, trad. franç. par Pierre Klossowski,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iques*, Paris, Gallimard, 《Tel》, 1989.

—*The Blue and the Brown Books*, notes du cours de 1933—1934, Blackwell, Oxford, 1958, trad. franç. par Guy Durand, *Le cahier bleu et le cahier brun*, Paris, Gallimard, coll. 《Tel》, 1965.

—*Über Gewissheit*, Oxford, Blackwell, 1969, trad. franç. par Jacques Fauve, *De la certitude*, Paris, Gallimard, coll. 《Tel》, 1976.

术语译名表

acte de discours 话语行为
  acte de discours contractuel 签约话语行为
  classification des actes de discours 话语行为的分类
action（acte）动作（行为）
  puissance actionnelle 行为力
  action de signification 意义行为
  proaction 前馈
  rétroaction 反馈
  action collective 集体行为
  action commune 共同行为
  action conjointe 联合行为
  action particulière 个体行为
  action plurielle 多个行为
  action singulière 单个行为
activité située 情形中的活动
affirmation 肯定
agent 施动者
  co-agent 共同施动者
arrière-plan 背景
assertif 断言、断定的
  force assertive 断定力
assertion 断定、断言
autonomie opérationnelle 操作上的自主性
autrui 他人

certitude 确实性

citatif 引用类

cogito 我思

cognitivisme 认知主义

cohérence discursive 话语一致

collaboration/compétition 协作/竞争

communication animale 动物沟通

comportatif 行为类

condition 条件

  de satisfaction 满意条件

  de sincérité 真诚条件

  de succès 成功条件

  préparatoire 准备条件

  sur le contenu propositionnel 关于命题内容的条件

connexionnisme 联结主义

conscience 意识

considération (assomption) 推理（假定）

consistance pragmatique 语用稳定

constatif 表述类、陈述功能

conventionnalisation 约定化

convergence/divergence 趋同/趋异

coopération 合作

  principe de coopération 合作原则

corps (incarnation) 身体性（人性化）

croyance 相信

déclaration 宣告类

déduction 推断

définition 定义

demandeur 请求者

descriptif 描述类

dialectique 辩证法、问答艺术

dialogal 对话的

dialogique 对话体

fonction dialogique 对话体功能
processus dialogique 对话体过程
rôle dialogique 对话体角色
stratégie dialogique 对话体策略
dialogue 对话
dialogue informatif 信息性对话
modèle projectif du dialogue 对话的投射模式
dialogue personne-machine 人机对话
directif 指令类
direction d'ajustement 适从方向
disposition *à* agir 行动处置
dissuasion 威慑
dit/dire 所说/说

exactitude 准确性
écho 回声
engageant 担保类
engagement 担保
erreur 错误
état mental 精神状态
éthique 道德的、伦理学
ethos 精神特质
expositif 阐述类
expressif 表达类
extensionnalité 外延性、广延

factif 变格类
fondement 基础
forme de vie 生活形式

illocutoire 言外行为
force illocutoire 言外之力
degré de puissance de la force illocutoire 言外之力的力度

but illocutoire 言外目的
mode d'accomplissement du but illocutoire 言外目的的完成模式
illusion descriptive 描述性幻觉
implication 蕴涵
insinuation 暗示
institutionnalisation 制度化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人工智能
intensionnalité 内在性
intentionnalité 意向性
intentionnalité collective 集体意向性
intentionnalité pragmatique 语用意向性
intentionnalité sémantique 语义意向性
interacte 互动行为
interaction 互动
signification interactionnelle 互动意义
intralocutif 言内

jeu de langage 言语游戏
jugement 判断

langagier 语言活动的
linguistique 语言学
locuteur 说话人
locutoire 言内行为
logique 逻辑、逻辑学

machine 机器
Magicien d'Oz 奥兹国的魔法师
manipulation 操纵
maxime de qualité 质量准则
mensonge 谎言
échec du mensonge 谎言失败
métadiscursif 元话语

mise en cause 质疑
mise en question 疑问
modèle de la tâche 任务模式
modèle du dialogue 对话模式
modus ponens 取式推理
monde 客观现实
  image du monde 客观现实的像
  monde intérieur 内在的客观现实
monologisme 独白主义

négation 否定

offre/requête d'information 提供/呈请信息
omission 隐瞒
oral/écrit 口头/笔头

pacte fiduciaire 信用条约
paradigme 范式
pensée 思想
performatif 施为句
perlocutoire 言后行为
  objet/suite perlocutoire 言后目标/言后结果
personne 人
philosophie 哲学
planification 计划化
politesse 礼貌
postulat d'immanence 内在公设
pragmatique 语用学，符用学
pragmatisme 实用主义
praxéologie 人类行为学
présentation 表现
promissif 承诺类
proposition 命题

contenu propositionnel 命题内容

question（requête，demande）提问（呈请、请求）
question indirecte 间接问题

rationalité 理性
réalité 实在性
référence 指称
présupposition de référence 指称预设
réflexivité 反身性，自反性
répétition 重复
réplique 接话
répondant 回答者
réponse 回答
représentation 再现、表征
robot 机器人

scénario 剧本
sciences cognitives 认知科学
sciences humaines 人类科学
sexe 性别
simulation 模拟
situation 情形
solipsisme 唯我论
statif 状态类
stratégie 策略
subsymbolique 亚符号
sujet 主体

téléologie 目的论
test de Turing 图灵测试
thèse/hypothèse 论题/假设
tiers 第三方

transaction 交流
  transaction intersubjective 主体间的交流
  transaction intramondaine 客观现实内的交流
sens transactionnel 交流涵义

utilisation 使用

véracité 诚实
véridicité 真实
vérité 真实性
vérité-correspondance 真实性相符